

---

# 苏轼研究

2021年第2期（总第65期）

（季刊）

## 卷首语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  
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孤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  
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江城子·别徐州》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  
临别之际，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等友人依依送  
别；徐州百姓更是捧花献酒、夹道欢送。面对如此  
深情厚谊，苏轼感慨万千，作此词答谢。

两年时光匆匆而过，与徐州吏民共抗洪水、同  
历生死，与好友在湍急的百步洪尽兴放舟，石潭谢  
雨途中参加迎神赛会……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而今  
却到了分别的时刻。暮春三月，春水融融，残红将  
谢，即使春还在，我又能与谁共赏；归鸿返乡，我  
却要远离，回望彭城，不见水道与湖州相通，我将  
怎样把相思的泪水寄去楚江之东！

苏轼为徐州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和珍贵的  
回忆，苏轼与徐州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在  
本期的《苏轼研究》中我们选取了一组有关“苏轼  
与徐州”的文章，相信会为您带来新的启发。

---

# 蘇軾

2021年第2期（总第65期）  
(季刊)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周裕锴
- 副 主 编：潘殊闲 方永江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mailto: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  
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 研究 SUSHI YANJIU



## 目 录

### □特 稿

- 第 24 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周裕锴/04
- 第 24 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闭幕致辞 潘殊闲/05
- 第 24 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总结 魏新建/06

### □苏学论坛

- 从《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到《记承天夜游》  
——论苏轼审美心灵的转化 黄惠菁/09
- 徐州：苏轼文人画思想的发源地
- 以墨竹为中心 仇春霞/16
- 由“黄楼”谈苏轼徐州诗文创作的指向性 宋定坤/23
- 论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周方/30
- 陈师道与秦观徐州集会交游考 龙飞宇 杨媛/34

□顾问：慕新海 胡元坤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张志烈 苏 灿 邱俊鹏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王启鹏 刘川眉 刘小川  
刘清泉 孙开中 朱 刚 陈才智  
**冷成金** 李景新 宋明刚 杨胜宽  
杨常沙 张海鸥 张 鸣 张忠全  
张国文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袁 丁 康 震 韩国强 喻世华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

苏轼《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刻的历史沉浮

□苏学专家

李援朝/41

王尚絅“左苏右程”观考辨

王维玉/47

关于冷成金老师的一些回忆

张逸文/67

念师恩

司 聰/73

□诗文鉴赏

《龙川略志第四》赏析

胡先酉/50

□景苏札记

方永江/74

□新书序评

《苏诗补注》前言(下)

王友胜/58

三百个故事讲透苏东坡(一)

刘小川/76

□研究史话

第一章 “经纶不究于生前”(四) 曾枣庄/64

□苏学动态

苏坟山上祭三苏，清明节前拜先贤 唐雅兰/79

《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捐赠仪式 有 愚/79

重温东坡经典，弘扬东坡精神 有 愚/80

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召开 有 愚/80

# 第 24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周裕锴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第二十四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徐州正式开幕，我谨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衷心感谢徐州市人民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感谢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为承办此次盛会作出的精心筹备安排，感谢筹办方领导和会务组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所作的大量工作，并感谢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去年的徐州会议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而临时取消，因此，今天会议的举行，实际上是徐州主办方第二次认真筹备的结果，其间付出的辛勤劳动，可想而知。对此，我谨代表参会的全体苏轼学会会员再次向主办方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徐州是一座光荣的历史文化名城，苏轼在此地留下的政绩和诗文词，更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众所周知，苏轼在知徐州期间，遇到黄河泛滥，他亲自在第一线领导军民抗洪，不顾身家性命，日夜驻守城墙上，最终保住了徐州古城和百姓，受到神宗皇帝的奖谕。苏轼还曾派人勘探开发白土镇的石炭，即煤矿，解决了徐州人民冬日取暖的问题。我猜测中国矿业大学选址于徐州，或许冥冥之中正是为了继承苏轼开发石炭而为民的精神，只是矿业大学更把这种精神推广到祖国四面八方的矿业勘探开采。作为地方官，苏轼还遵循古俗为徐州人民祈雨谢雨。在谢雨途中，他感受到自己熟悉而亲切的农村生活，“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而农村的醉叟顽童，特别是“旋抹红妆看使君”的村姑，都非常喜欢这个无半点官架子的太守。当苏轼罢徐州任时，父老相送，依依不舍，表示“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感谢他率领抗洪挽救了徐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徐州公务之余，苏轼为纪念抗洪胜利而筑黄楼，邀兄弟朋友作赋作铭，为黄楼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黄楼已然成为苏轼在徐期间的文化地标，由此铸就的“遗爱”于民的黄楼精神更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苏轼在徐期间还访云龙山张山人放鹤亭而为之作记，夜宿燕子楼梦盼盼而

倚声填词，百步洪放舟体悟人生哲理而作长诗，并与朋友评诗论画，留下不少经典名言和传世之作。时至今日，黄楼、云龙山、放鹤亭、百步洪、燕子楼等等，仍是徐州最吸引人的城市名片。

我们今天在徐州纪念苏轼，就是要弘扬他“遗爱”于民的黄楼精神，学习他执政为民的做官理念，铁肩担道义的大智大勇，亲民爱民的平等态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研讨他的豁达的人生观、高尚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流俗的艺术观念。总之，有不少的智慧和思想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讨、继承和发扬，为当下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资源。

十多年来，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普及工作，主办《放鹤亭》杂志，编写了《苏轼在徐州》、《苏轼知徐州札记》、《苏学概论》等研究著作，是中国苏轼研究的一支生力军。2011 年中国矿业大学在全国高校首创成立了苏轼研究院，至今已走过 10 年的发展历程，先后出版了《苏轼徐州诗文辑注》、《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苏轼徐州诗文名篇赏析》等研究著作，还招收培养了多名研究苏轼文化的研究生，为苏轼研究的后备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年会是继 1999 年第 11 届、2009 年第 16 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以来，今年是徐州第三次主办全国会议，可以说徐州同仁们为中国的苏轼研究做出持久的重要贡献，在此我谨代表全体学会会员对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今天是我们在常州分别两年之后的重新聚首，新冠前新冠后，恍若隔世。学会的副会长冷成金教授今年三月不幸魂归道山，令人唏嘘扼腕，我无由前去北京告别，谨在此与参会的苏轼学会全体同仁们对冷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并发扬其坚忍不拔的精神，把苏轼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周裕锴，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 第24届苏轼学术研讨会闭幕致辞

潘殊闲

各位代表：

944年前的初夏，苏轼来徐州履职。不久，徐州就遇上了特大的洪水。苏轼面临为官以来最大的执政考验。徐州城岌岌可危，一城老小惊恐万状。苏轼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徐州军民奋战七十余天，终于让洪水退去，彭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然而，苏轼并未就此满足，而是从长计议，立即着手徐州城郭的增固，以防后患。

徐州抗洪是苏轼为官生涯中的精彩华章，也是中国古代抗洪史上的宝贵文化遗产。当然，苏轼在徐州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远不止抗洪，只不过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项。

今年是苏轼逝世920周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24届年会选择苏轼留下众多宝贵遗产的徐州，有特殊的意义。徐州是苏轼人生仕履中的重要一站，也是宋代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前苏轼完整履一地的最后一站。徐州之后的湖州，苏轼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打击，跌入深渊，甚至命悬一线。当时苏轼离开徐州，徐州百姓扶老携幼为其送行：“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苏轼甚为感动，谦虚地说：“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又说：“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悲恼缘爱结”，因为这里凝结着苏轼的“爱”——对徐州人民的爱，对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爱，所以，苏轼对徐州是有深厚情感的，这种真挚的情感，可以通过他的《江城子·别徐州》让我们感受到：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  
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  
背归鸿。去吴中。回望彭城，清泗与淮通。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从“天涯流落思无穷”到“欲寄相思千点泪”，从折残红到背归鸿，足以见出苏轼是一位颇重感情的人，足以见出徐州在苏轼心中的分量。

这次年会的承办方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和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也是带着

一份对苏轼的感激之情为本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仅研讨会的论文集就做了厚厚的三卷册，与会每一位代表还获赠11部苏学大作、三大袋会议资料，沉甸甸的，真正体现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目的，展示了徐州苏学研究的实力，也体现了徐州朋友办会之良苦用心。这一点，我们还从相关精心安排的会务工作中得到了切身的体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对本次研讨会的承办方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和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提议，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我们对他们的诚挚谢意！

苏轼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旷世奇才，是一位人见人爱、令万世景仰的伟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名人，苏东坡堪称第一人。也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每次有关苏东坡的学术会议都人气爆棚，苏东坡生前到过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他作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受到拥戴，这也再一次地印证了陆游当年对苏轼“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的绝佳评论。其实，岂止是“忠臣烈士所当取法”，现在坊间流传着“为什么你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读苏东坡”的调侃。

应该说，这不是调侃，而是大实话。难道不是吗？

各位代表，我们因为苏轼而结缘，也因为苏轼而相聚。感谢大家百忙中会聚苏轼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彭城，一同追念、探析那位被秦观“惟愿一识”而“不愿万户侯”的“苏徐州”；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支持，期待我们第25届苏轼年会再见！

祝各位与会代表明天文化考察愉快，返程一路平安！

谢谢大家！

潘殊闲，西华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 第 24 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总结

魏新建

第 24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进行了一天的学术交流，有主旨演讲，有学术讨论，会议紧张活跃，紧凑有序。刚才，几位组长汇报了各组的交流讨论情况，诸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纷纷就自己的论文与在座同行进行分享、切磋。从文献考证、精神探究、传世影响、现实意义等多个方向、多种层次表述了各自的学术观点。综合上述情况，本届研讨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规模大，论文多，规格高

本届会议参会的外地专家、学者 114 人，特邀苏轼后裔、世界苏氏宗亲会代表 9 人，中国矿业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及徐州本地专家、学者 60 人，共 180 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此外还有 6 名台湾及海外的学者因疫情未能出席，只能书面参会，可谓盛况空前。大会收录论文 132 篇，编辑为 3 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论文涉猎范围广泛，涉及苏轼与徐州的论文 43 篇，研究苏轼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 44 篇，研究苏轼诗文书画的论文 45 篇，共约 100 余万字。令人可喜的是 18 位作者来自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由此可见苏轼文化的研究后继有人。

## 二、苏轼研究和徐州地域文化紧密结合

徐州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苏轼文化在徐州地域文化中的地位。苏轼在徐州留下了众多遗迹、365 篇诗词文赋和许多故事传说，可称之为徐州的一部“史诗”。苏轼在徐州所表现出来的人品、文品、官品中，折射出苏轼思想、苏轼精神、苏轼人格，多维一体，可以

统称之为黄楼精神，这是徐州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本次研讨会有 43 篇论文涉及这一问题。蔡世华教授的《光明的使者——苏轼徐州煤炭开发的历史价值再探析》，认为徐州煤炭的发现和利用始自苏轼，发现权和开发权属于苏轼，这是苏轼在徐州任内的重要事件，对于研究中国煤炭史具有重要意义。刘清泉先生的《徐州苏轼符号》，论证了林语堂先生为什么把苏轼知徐州时期称为黄楼时期，认为徐州苏轼符号的生成、提炼，源于苏轼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危机应对的果断精神和凝心聚力的协商精神，以及传承以民为本、勤政为民精神的文化自觉。彭林泉先生《苏轼徐州社会治理之道》从法治的角度对苏轼在徐州治理匪盗、保一方平安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展示了苏轼出众的行政才能和治理能力。庆振轩教授的《苏辙〈黄楼赋〉的个性特色与文学价值》，以苏辙的《黄楼赋》作为研究苏轼与徐州的切入点，探讨了苏辙《黄楼赋》与黄楼之会的文化内涵。管仁福教授的《苏轼徐州时期的黄楼精神及当代意义》、孙晓东先生的《从清同治〈徐州府志〉看苏轼的治水贡献》、陆明德先生的《传承苏轼山水情怀，创建生态城市大美徐州》、周方教授的《论苏轼〈徐州上皇帝书〉》、杨胜宽先生的《苏轼在徐州诗文交往与其主盟文坛的关系》、乔云峰先生的《论苏轼密、徐时期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江惜美教授的《苏轼徐州诗词之多元思维》等多篇论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苏轼与徐州文化，让苏轼在徐州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加丰富，让黄楼精神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今天我们研究苏东坡的黄楼精神，正是为了使整个社会具有更高品味、更高格调的文明追求。苏轼知徐州两年，徐州因苏轼而山川生辉，苏轼因

徐州而丰富多彩。

### 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得益彰

在本次研讨会所征集的论文中，“苏轼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是一个重要论题，紧紧围绕这一论题所提交的论文有 44 篇，为此，我们把此类文章编入了思想文化卷。徐新民先生的《构建苏学体系是当代苏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历史使命》提出，从 1980 年至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24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还有不定期的东坡论坛，名人、专家荟萃，研究成果斐然，苏轼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苏学”一词应运而生，构建苏学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苏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历史使命。方永江先生的《苏轼精神及时代价值》认为，有必要厘清苏轼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度，挖掘其时代价值，以期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汪倩博士的《从苏轼勤政爱民角度看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认为，苏轼勤政爱民、以人民为中心等思想元素，对于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牢记党的宗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现实启示意义。常民强教授的《苏轼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颐》提出，苏轼一生坚持贯彻了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的准则。在反腐倡廉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可以从苏轼的廉政思想中汲取智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斗，有为当下，泽被后代。张馨欣博士、庆振轩教授的《欧苏自觉师承理念对于当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启示》认为，欧、苏都具有自觉的师承意识，绝少师门之见，视赏拔人才、汲引后进为己任，从而促使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全面成功。在当下高校强调师德师风建设的背景下，总结宋代文坛欧苏自觉师承理念，对于立德树人、校风学风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孙艳红教授的《东坡文化现象的现代启示》提出，东坡文化的精神内核，安慰着、激励着、成就着一个又一个处于困境中的求索者，并为他们保驾护航，也给现代人的生存提供了新的目标和方向。谢仿贤先生的《苏轼税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苏轼“轻徭薄赋、安商利商、培植税基、公平税负、节用以廉取”的税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契合度，对当今税收工作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兰文阁先生的《论苏轼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优势及策略》，对新时代发挥新媒体优势传播苏轼文化的重要性和规律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并提出了可行性策略。

任正先生的《文化产业视域下徐州苏轼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与开发路径研究》，刘继增、张建功先生的《“世遗”视域下苏轼遗址遗迹地专有名词语文化——以苏轼长眠地专名“郏”为中心的考察》，明智先生和明媚女士的《欧苏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使命——以颍州为例》，胡燕教授的《简论东坡文化与黄州旅游》等文章，则从不同的地域角度探讨了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

学术研究只有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发挥现实意义，促进社会功能完善，助推人类文明进程，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内在的活力和价值。2017年11月23日，18个城市发表的《东坡文化传承与当代城市发展·眉山宣言》曾提出：“让东坡文化‘传下来’，走入当代；让东坡文化‘融进来’，走进心灵；让东坡文化‘活起来’，走进民间；让东坡文化‘火起来’，走向世界！”可以说，本届会议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价值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宣言。

### 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相辅相成

本届会议在苏轼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新的拓展。诗文书画是苏轼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所在，论文集共收入相关论文 45 篇，其中不乏苦心孤诣之作。例如张仲谋教授的《谈东坡诗的创作个性》，彭文良教授的《苏诗对王安石变法的正面回应》，宋定坤博士与闫续瑞教授的《论苏轼、黄庭坚诗歌用典中的文学思想》，由兴波教授的《论苏轼“自成一家”的文艺思想》，潘浩教授的《论苏轼制诰的情感因素与表达维度》，张翠爱教授的《论苏轼对婉约词的继承与开拓》，沈广斌教授的《论苏轼诗歌的写物之功》，蓝士英教授的《苏轼“岛瘦”论摭谈》，张培婧女士的《苏轼词中的时间意识与词境拓展》，高云鹏先生的《诗歌范式与生命格调的确立》，乔璐璐女士的《苏轼“记”、“赋”体文的艺术特色比较论》等论文，从文艺学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剖析细密，探幽发微，时有创见。而陈才智教授的《走进苏海》，李景新教授的《东坡六题》，徐鸿教

## 特 稿

授、王宗楚女士的《苏轼“赤壁诗文”的“三我”精神结构探析》，万燚教授的《美国汉学界论苏诗中的自我》，庆振轩教授的《苏轼诗文与敦煌佛影》，张建伟教授与南雅琼女士的《东坡词与魏晋风度》，喻世华教授的《苏轼与润州相关的几则尺牍辨证》，李登年先生的《苏东坡诗词中的海州味道》等论文则是以更广的视觉、新颖的角度关照苏轼的文学艺术作品，眼界开阔，旁征博引，在研究的地缘上实现了较大的跨越。

特别在对苏轼思想文化的探讨上，本届会议则显得更加深广。台湾学者李常生先生的《十二年追随苏轼一生，探索苏轼人品与学识》，叙说了自己历经千山万水，饱受艰难曲折，终于完成《苏轼行迹考》的感人事迹，充满了设身处地的生命感悟和实践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徐新民先生的《民本学说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系统论述了苏轼民本思想的渊源、继承、发展和带给我们的启示，提出苏轼的伟大成就不仅仅表现在词章上，更反映在他继承和发展民本理论及其实践上。谈祖应先生的《演道 弘道 践道》还原了苏轼在宋代儒学传承中不可低估的建树与文化史意义。杨松冀教授的《苏轼哲学思想北宋接受简论》提出，宋学为宋代文化的精神内核，苏轼是宋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哲学思想是宋学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宋明刚先生的《浅谈苏轼美学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及启示》从苏轼绘画渊源、苏轼论画经典、苏轼绘画实践等几个层面思考与研析，论述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与启迪，进一步确立了他文人画理论奠基者的地位。涂普生先生的《且说苏东坡的“人生三狂”》认为狂想、狂放、狂傲在苏东坡人生中举足轻重，对其立志，对其博学，对其成为豪放派的鼻祖，对其载歌载舞的一生具有重要影响。潘殊闲教授的《我欲醉眠芳草——苏轼与酒的不了情》从酒文化的视域，论述了苏轼热爱生活的真性情，苏轼饮酒、酿酒，他的酒文学、酒哲学，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酒文化遗产。郭杏芳教授的《苏东坡的“功业”内涵探析》认为，他所指的“功业”应该是始于黄州、完成于儋州的三部书传及其思想内涵。此外，许多学者还在苏轼的佛道思想、廉政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隐逸情怀、生活美学、交游原则，以及以苏轼为中心的延伸研究等方面进

行了颇有见地的探讨，可谓满目珠玑。

一些学者在新的领域，进行了大胆开拓。夏爱民先生和赵艳娟女士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的法治思想浅析》，洋洋洒洒5万字，系统论述了苏轼法治思想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邓静教授和马小明先生的《苏轼古谱诗词演唱研究——以《醉翁操琴曲》为例》对苏轼古谱诗词歌曲的艺术风格和演唱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把无声的文字和乐谱变成有声的音响，便于传唱和推广，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叶升平教授等人的《从苏轼〈石炭〉到东坡〈佛福寿图〉铸雕实践与文创作品》则在苏轼文创产品制作上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今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苏轼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文化研究既需要深度也需要广度，更需要转化和创新。如果能把深度开拓成广度，即在众多的领域都具有深度，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苏轼文化研究将会呈现出更加繁荣昌盛的局面！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同仁，本届会议的举办是我市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是我市苏轼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本届会议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将对徐州市的文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参考作用，将在徐州文化史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本届会议能够成功举办，离不开徐州市政府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正确领导和悉心指导，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承办方对所有为会议付处心血和汗水的领导、专家、同志们、同学们表示最为诚挚的感谢！当然，由于我们办会水平有限，落实能力不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为期两天的盛会即将结束了，“黄楼高丈，下建五张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徐州的青山绿水有幸您的这次驾临，更期待您的再次访苏之行和长期关爱！

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归途平安！

魏新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从《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到《记承天夜游》

## ——论苏轼审美心灵的转化

黄惠菁

**内容提要** 苏轼的随笔小品文大都作于贬居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不仅富含文学艺术性，而且思想深刻，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记承天夜游》更是其中之名篇，苏轼以审美眼光凝视世界，构筑天地之大美。在此之前，作者即在徐州写下《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中刻画月下之场景，与黄州记游几无二致，唯心境有别。两篇诗文皆反映了作者对外在美好景物的关注与摄取，在审美注意的角度上，极为近似，但审美心灵终因际遇的不同而有了转化。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排除世事干扰后，心境澄明，因游心于物之初，具备了更高的审美心灵层次，所以才能真正得到所谓的“至美至乐”。

**关键词** 苏轼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记承天夜游》

### 一、前言

苏轼的随笔小品文大都作于贬居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不仅富含文学艺术性，而且思想深刻，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中《记承天夜游》更是广为人知，作者信手拈来，几无藻饰，层次分明，自然成文。

在《记承天夜游》一文中，作者以闲人自居而得闲情。他以审美眼光凝视世界，发现自己身边最普通的事物，最不经意的影像，卒可构筑天地之大美。记游当时，正是其人生境遇偃蹇之际，此时，作者不但未作愁苦语，反而以一种豁达超旷的襟怀，直面世界，展现出一个忘却功利，不计贫穷得失的士大夫形象。这等自然清新的小品文，适反映作者最真实纯粹的人格特质。

其实，早在贬谪黄州之前，苏轼在徐州就写了一篇与《记承天夜游》仿佛情境的诗歌——《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中刻画月下之场景，与黄州记游几无二致，唯心境有别。徐州之作，因缘朋友

来聚，苏轼取月夜美景，与客饮酒杏花丛下，诗人感物而起情，即景会心，景生情，情寓景，对眼前景物的内在审美本质有深刻的把握，其艺术直觉具有神奇的透视能力，所以信手拈来，不免令人有历历在目的生动感受。

考察两篇作品写作背景，适以乌台诗案发生为界，诗案之前，甫成《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一诗，当时的苏轼乃知徐州任，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积极入世，一心实践仁德；诗案之后，苏轼以谪臣身份寓居黄州，纵有入世之志，亦难能施为，在逐步调整心情，深自检点后，而有《记承天夜游》之作。诗文中皆反映了作者对外在美好景物的关注与摄取，在审美注意的角度上，两篇极为近似，但审美心灵终因际遇的不同而有了转化：因缘黄州的困顿、觉醒，使得苏轼在心游万物之时，灵府更为澄明，从而具备更高的审美心灵层次，得到真正的“至美至乐”（《田子方》）<sup>[1]187</sup>。

### 二、《月夜与客饮杏花下》的创作背景

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四月到任，从此展开两年的徐州知府生活，直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罢徐州，苏轼才改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身份，知“湖州军州事”。<sup>[2]663、917</sup>

在徐州期间，苏轼面临最大的治事考验，莫过于水患问题。甫到任未久，当年七月十七日，黄河于澶州曹村埽决堤。九月九日，水穿城下，水深凡二丈八尺九寸。<sup>[3]868</sup> 苏轼为全力治洪，几乎是不眠不休：

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屢杖策，亲入卫武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

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九日黄楼作》）<sup>[4]1413</sup>

做为地方长官，苏轼眼见洪水骤至，城将败而富民争相出城避水，恐引发全城紧张，于是特下禁令，阻止富民出城，免除民心浮动；又为使下属共体时艰，全心投入治水，他甚至住在城上，过家不入。这等情怀，身先士卒，感动全城，终于使黄河复回故道，水患卒除。

苏轼知徐期间所作诗歌，几达二百首，其中多首涉及水患经过，《答吕梁仲屯田》一首，可谓完整地纪录了其面对洪水来袭，防治之经过，是诗人反映现实精神的主要诗歌之一：

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村。  
居民萧条杂麋鹿，小市冷落无鸡豚。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  
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  
吕梁自古喉吻地，万顷一抹何由吞。  
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  
计穷路断欲安适，吟诗破屋愁鸢蹲。  
岁寒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  
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酬空瓶盆。  
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  
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  
宣房未筑淮泗满，故道堙灭疮痍存。  
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鲸髡。  
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  
高城如铁洪口快，谈笑却扫看崩奔。  
农夫掉臂免狼顾，秋谷布野如云屯。  
还须更置软脚酒，为君击鼓行金樽。<sup>[2]774</sup>

这首诗是苏轼在水患防治后，特别到吕梁悬水村巡视，回答仲伯达的诗作，其目的是委请仲伯达必须留心筑城固堤之重任。全诗叙及个人在初到徐州时，徐州本是黄河边一个萧落城市，未料洪水肆虐，结果“吏民走尽余王尊”，诗人自比为汉元帝时任东郡太守的王尊，面对洪水，百姓尽逃，他却独宿堤上，号召百姓，与城共存亡。待洪水退后，官民欢欣鼓舞。为了未雨绸缪，免除百姓遭受水患之苦，诗人更是想尽办法，奏请朝廷高筑城堤，以绝后患。<sup>[5]1465~1466</sup>

苏轼在徐州任内，除了防洪有功外，也十分关

心民生疾苦，故此期诗歌，屡屡有反映现实之作，也展现了个人的政治作为，例如旱祈雨雪。元丰元年三月，徐州春旱，面对徐州“久旱千里赤”，苏轼乃祷雨城东石潭，作青词：

河失故道，遗惠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田庐漂荡，父子流离。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于犴狱。人穷计迫，理极词危。望二麦之一登，救饥民于垂死。而天未悔祸，岁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隣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徐州祈雨青词》）<sup>[6]1903</sup>

文中点明百姓生活全赖庄稼，然而“冬无雪而春不雨”，草木亦不生，稻禾至今无法播种，明年又该如何收获？倘若百姓生活困顿，饥寒起盗心，届时必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州里动摇，国之不幸，所以，苏轼才会“稽首告哀，吁天请命”。幸因上天垂怜，不久，雨降彭城，所以诗人乃复石潭谢雨，留下《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名作凡五首。<sup>[7]211</sup>

除了旱祈雨雪、防治洪水外，知徐州任上，苏轼还陆续写下其它攸关民生之作品，如《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登望谼亭》、《起伏龙行并叙》、《河复并叙》、《石炭并引》等等，再再显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注。

徐州两年，不仅展现了苏轼的治理长才，也是他与文士交往互动极其频繁的重要时期。熙宁十年冬，苏轼防洪告一段落，适陈师仲、陈师道兄弟特来拜见。<sup>[8]490</sup>元丰元年二月，国子监教授黄庭坚特寄书并古诗二首，寄意苏轼，愿投其门下。而苏轼则于同年七月复黄庭坚书，盛赞其诗，并寄次韵庭坚《古风》二首。<sup>[6]1531</sup>同年五月，秦观入京应举，过徐州，首次面见苏轼，特呈诗，苏轼坦目为杰士。<sup>[8]826</sup>另外，像张天骥、王巩、颜复、王迥、李常、梁交、舒焕与刘泾等等，均与苏轼往来频频。王适、王遹兄弟亦闻声来学，苏轼以为两人“皆贤之”。<sup>[10]1401</sup>元丰元年（1078）八月，苏轼所建黄楼落成，自此，

更时与宾客宴集黄楼。而诸人与苏轼交，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因具共同志趣和文学爱好，故翰墨往来不辍、交游酬唱，遂留下大量的诗文。

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与王适（子立）、王遹兄弟及张师厚饮杏花下，兴起而为诗，诗意幽远，别有一番清韵：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薄酒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月夜与客饮杏花下》）<sup>[2]926</sup>

诗中在场者，与苏轼或师或友。其中张师厚乃苏轼同乡，亦为蜀人。<sup>[1]</sup>而王氏兄弟两人与苏轼关系更是匪浅，王适后来成为苏辙女婿，惜于元祐五年病歿于奉高。<sup>[4]1400</sup>本诗写作背景，据宋人王十朋的批注：“按先生《诗话》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月夜与客饮杏花下》）<sup>[2]926</sup>诗中初写花、月与作者的邂逅。花落春归，随风散余香，飘进作者房舍；明月冉冉，也入户找寻未眠之人。此诗中，明月做主，诗人为客，明月多情，访寻知音。作者正是在花影、余香及娟月下，与客人对月赏花，喝起酒来。其中“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萍”两句逸趣横生，“褰衣步月踏花影”颇有熙宁年间《水调歌头》“起舞弄清影”的自得怡然之味。诗人揽衣举足，在月光底下，踏着花影漫步，仿佛间，整个人都轻盈起来。而眼前清亮的世界，月光似水，照拂大地，杏花随风飘散，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青萍荡漾。流动的月光、摇曳的杏花及荡漾的青萍，使清柔的夜色更为美好，沉浸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天地早已无别，浑融为一矣。两句诗刻画了一个清明、空灵且缥缈的忘我境界。而接下来“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则进一步叙写花与酒的情韵，有了赏花的审美心情，也逗引出喝酒的勃勃兴味，花间置酒本是文人钟爱雅事，花香混着酒香，情韵更加生动。花与酒的互相映发，把意欲珍惜眼前美好的心思表露无遗。“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又回到诗的主体“月”，写借月待客。山城偏僻，酒虽薄，情却浓；薄酒虽是不堪饮，但杯中月影却深情如海。就在客人的箫声清引下，月光流转，已入三更，声断明月，月落杯空，月夜将尽，一切将又回到静谧，诗人“惜月”

之情，一览无遗。最后两句则转写杏花，想象明朝春风无情，吹落花红，触目凋零，怕是只剩点点残红，充满着月落的哀愁及对花红的怜惜。通篇围绕在花、月、酒上，人在其中，既享有其中的美好，也感叹美好的不长久。全诗因景生情，由情生景，情景交融，可谓妙趣横生。

### 三、《记承天夜游》的书写历程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神宗皇帝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离京师赴黄州，途中过光山，遂游净居寺，流连光景之余，诗人感叹宦海波澜，遂写下了《游净居寺》：“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不悟俗缘在，失身陷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sup>[2]1024</sup>面对自然山水，本该愉悦，但此际苏轼却有不堪回首的感慨。思及早年夙愿“自制山中衣”“携手老翠微”，如今却“失身陷危机”，恐怕“永与云山违”，不禁教诗人感到嗟悔无极：如果自己早悟禅机，也不会坐困愁城，忧患性命。现在只能稽首世尊，希望悟得佛法真谛，“一洗千劫非”！全诗既有感慨，又有迷惑，更有对前途茫茫的不安与惊恐。

初到黄州，诗人不免郁郁寡欢，《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就清楚地描绘个人当时的心情：意兴萧索暗淡，精神不济，教人“昏昏觉还卧”。<sup>[12]1040</sup>贬谪初始，他几乎闭门不出。这种萧瑟心情，多出现在第一年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因为心灰意冷，作者每每在结尾处，辄作以下数语：“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答李端叔书》）<sup>[6]1433</sup>、“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答开元明座主九首》五）<sup>[6]1894</sup>、“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与李公择书十七首》十一）<sup>[6]1500</sup>畏谗恐祸，溢于言表。

事实上，真实生活中打击诗人的，除了最难消受的精神折磨外，雪上加霜的还有物质的困顿。言下之意，一个人过此艰困生活也罢，能够“随僧蔬食”，已是无可挑剔，但之后家眷抵达，如何应付，才教人费心。（《与章子厚参政二首》一）<sup>[6]1412</sup>除上，在给王定国的书信中，他又再次承认自己“平生不营生计”，忧心“贱累即至，何所仰给。”（《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五）<sup>[6]1515</sup>

身心的双重打压，确实令初到黄州的诗人，喘不过气来。虽杜门简出，深自检讨，但转念间，不免怀疑起自我存在的价值，而感到无所适从。初寓定惠院时，诗人心情之苦闷，所谓“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一）

[6]1513、“罪废屏居，交游皆断绝”（《与陈朝请二首》

一）[6]1709，并非言过之辞。未迁居临皋亭前<sup>[13]481、482</sup>，情绪索然，或以孤鸿、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处处可见作者孤高影像的自我塑写，如：“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sup>[7]249</sup>、“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sup>[2]1033</sup>、“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sup>[2]1037</sup>等。这等形象与过去煌煌论国事，昂扬无所畏的苏轼，大不相同。昔日再政治上，他积极进取，议论卓荦，以君子自期。因此，此际被诬指“鼓动流俗”、“谤讪朝政”时，百口莫辩、无法自解，痛苦可以想象。影响所及，对自我存在的认同起疑：时而愧缩，想要韬晦深藏，时而负才使气，义愤填膺。这段身处两端的心路纠结，直到转向佛老，透过释道哲理感悟生活，学会安时处顺后，觉悟人生，才逐渐摆脱贬谪的阴影！

苏轼逐渐摆脱身心困境，觉悟生活，超越生活，是来到黄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元丰四年（1081）。初到黄州第一年，苏轼精神的苦闷不言而喻，纵使可以放浪山水，和渔樵杂处，得其自在，但心结未解，自适便无门。面对生活困境，苏轼试图突出重围，寻找出路。《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十五中，他自言：

“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经藏记》皆迦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sup>[6]1480</sup>祸从“字”出的前车之鉴，让他的创作，变得格外谨慎。若此，文章不如少写，“惟佛经以遗日”<sup>[6]1412</sup>，可以让他安然自得。确实，身安必先求心，困缚于世俗功利的诗人，亦自觉地想挣脱这些枷锁。归向禅林、南华，实则是诗人经过深刻反省后的慎重选择。佛道思想为苏轼的束羁困顿找到了自由的出口。他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为的是洗去客尘妄想，洗去心中羁梏。

《安国寺浴》就曾记载他在浸浴身体的时候，冥想到的是，如何才能洗涤心灵的“净秽”与“荣辱”：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

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

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

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

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

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sup>[2]1034</sup>

人世一切烦恼都是由“有自有他”而产生，从二元对立中，产生一切痛苦。唯有看破执迷，无自无他，才能得其自在。所以“安国寺”之“浴”，重在“治心”，而非“浴身”。这种“净心”譬喻，佛经中多有记载，如《维摩诘经》：“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离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sup>[15]52</sup>、“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

[16]132 诗人藉由洗浴隐寓清净意蕴的，同期还有《如梦令》一词：“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sup>[17]495</sup>这种觉悟，让苏轼经过将近五年的修行，终于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地。

贬谪黄州期间，透过思想的理解与转换，苏轼确实感悟到生命的本质，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态度。苏轼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心灵困境，面对生活，享受自然，体现禅风，与当时思想靠拢释、道，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元丰四年（1081）后的作品，往往可以嗅觉到作者努力追求心胸的坦易与自得。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sup>[6]2260</sup>

《记承天夜游》表达的感情是丰富而微妙的，怡然赏月，悠闲漫步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贬谪的悲凉，但是作者却未一任低沉情绪的缠绕，反而以坦然自在解缚，表现出心胸的旷放。作者“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如诗、如画。月光撩拨了作者的情意，使其“欣然起行”，走到户外。可惜，如此之美，无人可共赏，无人可分享，一念及此，忽想起也是贬谪黄州，寄宿在承天寺的张怀民，遂一路寻去。此情此景，但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况怀民与自己遭遇相当，情怀相似，同感共应，最是自然。果然！如己所料，怀民未寝，两人乃悠然漫步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从仰观天上皎洁的月光，转为地面倒影的俯视。天上月光洒遍地面，仿如一潭池水，无处不光鉴皎洁。一池静谧，竟见水草摇曳，藻荇交横，原来是松柏倒影。水月无别，迷离荡漾，“仿佛”与“分明”间，难以辨识。作者联想翻飞，想象辐辏，合成最美境界。这个清明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作者澄澈而透明襟怀的映照！作者随缘自适，自我与大自然同和，所谓“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若是无“闲”亦无“感”，月又如何，竹柏又如何。闲适之人，才能发现天地之大美，才能体悟人生之悠然。苏轼是在宦海浮沉中，了悟悠闲之美。虽然贬谪黄州之初不免仍有无助、怀疑及悲凉之感，但也因人生的大落，令他觉悟“生存”的意义。

#### 四、苏轼审美心灵的转化

元丰三年（1080），作者被贬黄州，但每逢月夜偶出，总会想起去年的“对月酣歌美清夜”：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公自注：去年徐州花下对月，与张师厚、王子立兄弟饮酒，作“苹”字韵诗。）  
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  
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忆昔扁舟溯巴峡，落帆樊口（公自注：樊口，在黄州南岸）高桅亚。  
长江衮衮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  
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  
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  
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  
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次韵前篇》）<sup>[2]1033</sup>

繁华过去，不过一年，苏轼已是罪臣身份，谪居黄州，人事俱非，不由感慨“万事如花不可期”！即使多年后，诗人仍难忘情于当日。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王适（子立）过世。（《王子立墓志铭》）<sup>[6]466</sup>不久，苏轼便作《记黄州对月诗》，再次追忆往日情怀：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生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居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

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sup>[6]2166</sup>

子立十月过世，推估苏轼作此篇，计当元祐四年（1089）岁末，除了感伤王适、张师厚之逝，亦是对曾经生发的美好情景的追想。此际，距乌台诗案整整十年，从元丰二年（1079）至今元祐四年（1089），诗人几度宦海浮沉，身不由己，乌台诗案可谓其人生分水岭。元丰二年（1079）作《月夜与客饮杏花下》的苏轼，仍是那“奋厉有当世志”（《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sup>[4]1411</sup>，“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沁园春》孤馆灯青）<sup>[7]125</sup>、怀想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sup>[18]25</sup>的诗人、士大夫；但经诗案一事之后，《记承天夜游》再写月夜，再抒人情，纵使审美视角依旧，然感慨系之矣，情思早已不同！

元丰二年（1079）春天，苏轼在徐州对大自然的观察，对月夜的美好把握，在四年后元丰六年（1083）的秋天，又再一次感受。一样的月光，相同的照拂，类似的情景，又再次浮现：一个是“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一个是“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前者是诗，后者是文；在同样的审美主体的眼中，世界仍然是可观，天地依旧有大美。不论是散文的铺叙，抑是诗歌的精炼，都将月夜之美，点染无遗。起自月亮的圆转，入户照无眠，再到起身寻月见影，步影摇曳；上下天光，清凉如水，月河流动，萍藻交横。一幅水墨，荡开在天地间。《记承天夜游》散文仿似诗歌的画面，而《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一诗则有如散文的铺陈，以诗证文，以文补诗，更能理解苏轼诗文的审美体验。然两篇诗文毕竟非一时一地之作，审美眼光未变，但审美的心灵却有了差异，因为，从元丰二年（1079）春到元丰六年（1083）秋，在短短的四年半中，作者人生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人间到地狱：从生存的掌控到濒临死亡的威胁！因此，想象一样美好，画面仿佛有了迭现，但心境却有了分别。

徐州的苏轼，本持儒家积极用世，面对水患，毫无退缩之意，他亲荷畚锸，布衣草履，结庐城上，过家不入，甚至抱定以身填堤的精神坐镇指挥。水患既除，乃请求蠲免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建黄楼；又祈雨、劝农，抗旱；医病囚，改弊政等等，牵挂的，仍是经世济民之业、功利进退之思。因此，

徐州观月、赏花和饮酒，虽为美好，但仍不免有花落无情，惜春残红，再聚杳杳无期的遗憾。至于四年后，但因“闲人”而得“闲情”，所以有了承天寺之游，然此游却心向自然，早已放下俗世干扰，不计贫穷得失，了无功利想望，循此而获得了最大的审美愉悦，颇得道家逍遥之旨。《庄子·知北游》曾写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sup>[1]195</sup>

苏轼夜游承天寺时，其对天地“大美”的发现，其实也就是庄子笔下之“观”，既观天地之美，也观“道”，而“道”是一种决定整个宇宙人生的绝对精神，它主宰着万事万物。庄子认为，“最高层次的美并不在现象界，而在‘道’之中”（《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sup>[19]140</sup>，正因为当时苏轼能够排除世事干扰，心境澄明，游心于物之初，所以才能得到“至美至乐”（《田子方》）<sup>[1]187</sup>，才能具备更高的审美心灵层次。

东坡对“美好事物”的发现，从来就没缺少过，因为他一直拥有审美的眼光，能够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到周遭事物存在。徐州的揽月，黄州的赏月，都是出之以审美的心灵。只不过，徐州的春月、春风与春花，让苏轼与众人一样，往往对逝去的美好，表现强烈不舍，存有留住一切美好的眷想。而黄州的秋月，却让经历生死离别的苏轼只想要把握当下的美好，不作他想。这是因为黄州之行，对其人生特具意义，承天寺的美夜、好月，是作者经过苦难后对世界的觉察，是人生境界的自我提升。因此，同样的月景，同样的想象，在人生境遇转折的前后，自然会有迥然异趣的心境与感受。

### 五、结语

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知徐州时所作诗歌《月夜与客饮杏花下》，勾描了一个天地间幽远清发的画面，有美景，有妙思：“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萍”。诗人揽衣举足，在月光底下，踏着花影漫步。眼前清亮的世界，月光似水，照拂大地，杏花随风飘散，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青萍荡漾。流动的月光、摇曳的杏花及荡漾的青萍，使清柔的夜色更为美好，沉浸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天地早已无别，浑融为一，塑造了一个清明、空灵且缥缈的忘我境界。

取元丰六年（1083）秋，作者贬谪黄州时所作《记承天夜游》参看，此乃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作品。作者贬谪之时，透过思想的理解与转换，感悟到人生的本质，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态度，展现出生命坦易与自得。全文传达的感情是丰富而微妙的，怡然赏月，悠闲漫步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贬谪的悲凉，但是作者却未一任低沉情绪的缠绕，反而以坦然自在解缚，表现出心胸的旷放。在八十三个字的简洁文笔中，苏轼把叙事、写景、抒情紧密结合，勾勒出一幅优美的夜游图。“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天上月光洒遍地面，仿如一潭池水，无处不光鉴皎洁。一池静谧，竟以为水草摇曳，细思原来是松柏倒影。水月无别，迷离荡漾，“仿佛”与“分明”间，难以辨识。作者联想翻飞，想象辐辏，合成最美境界。

苏轼在徐州对大自然的观察，对月夜的美好把握，在四年的秋天，又再一次感受。一样的月光，相同的照拂，类似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前者是诗，后者是文；在同样的审美主体的眼中，世界仍然是可观，天地依旧有大美。不论是散文的铺叙，抑是诗歌的精炼，都将月夜之美，点染无遗。《记承天夜游》散文仿似诗歌的画面，而《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一诗则有如散文的铺陈，以诗证文，以文补诗，对苏轼诗文的审美体验，将更为丰富而完整。然两篇诗文毕竟非一时一地之作，审美眼光未变，但审美的心灵却有了差异，因为，从元丰二年（1079）春到元丰六年（1083）秋，在短短的四年半中，作者人生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儒家的一心进取，到道家的随意自然，心境已然转换。因此，审美眼光依旧，想象仍然美好，画面仿佛有了迭现，但审美心灵已然有了转化，心境不同，其所呈现的人生境界，自是有异。

由《月夜与客饮杏花下》与《记承天夜游》的对看，读者对苏轼的文学人生将有更深层的体识，更印证了不论身在何处，旷达的苏轼对“美好事物”的发现，从来就没缺少过，因为他一直拥有审美的眼光，能够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到周遭事物存在，故“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sup>[20]693</sup>。然而一诗一文，同样的月景，同样的想象，在人生境遇转折的前后，难免有迥然异趣的心境与感受。显然，徐州杏花中的苏轼，与黄州明月下的苏轼，面对相同的“天地之大美”，审美心灵早已因缘个人遭遇而有了更深沉的转化。

### 注释

- [1] (战国)庄子著、(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版。
- [2] (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3] 苏轼元丰元年作《九日黄楼作》,尝写道:“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7,知“水穿城下”乃熙宁十年事。
- [4]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5] 苏轼《与刘贡父七首》之四:“去岁,曾擘画作石岸,用钱二万九千五百余贯,夫一万五百余人,粮七千八百余硕。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乃可干办。……以此知前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可知苏轼最初向朝廷奏请求作石岸,未获同意。直到元丰元年二月,苏轼再请筑木岸,求刘攽、刘攽侄刘奉世力言于朝,才奉准修筑:“今别相度,裁减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粮四千三百余硕,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岁月,待河流之复道也。”见(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6]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7]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8] 《答陈师仲主簿书》载:“囊在徐州,得一再见。”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49。而苏辙亦《答徐州陈师仲》亦曾记该事:“去年辙从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来见,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见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9] 《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6。苏轼此诗之作,即是次秦观《别子瞻》韵。另外,陈师道在《秦少游字序》中,亦曾述及苏、秦两人在徐州会面情形:“扬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其时余病卧里中,闻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论说伟辩,坐者属客,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为杰士。”见(宋)陈师道著《后山集》卷11,“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钦定四库全书》<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97&page=78>
- [10] 苏辙《王子立秀才文集引》载:“君弟邇昔与君客徐,始识予兄子瞻,子瞻皆贤之。”见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栾城后集》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11] 今人王水照编选《苏轼选集》时,以为张师厚即苏轼《放鹤亭记》中隐居云龙山之张天骥,此说未见依据,按苏轼于《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后,又作《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二尝写道:“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8,页927。王水照可能将内容前两句误植为张师厚之形象,故有张师厚即张天骥之说法,然(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138页,亦不以为然,有些许说法可参考之。
- [12] 诗云:“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声来不断,睡味清且熟。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行,孤梦
- 犹可续。泥深竹鸡语,村暗鸠妇哭。明朝看此诗,睡语应难读。”见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0,中华书局1982年版。
- [13] 据孔凡礼先生考证,元丰三年(1080)四月前,苏轼寓居定惠院,四月中至五月初,入夏,迁居临皋亭。加以五月末,弟辙来,妻王闰之等家小同来,零落心情始稍得宽解。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 [14] 《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15] 《弟子品第三》,见(姚秦)鸠摩罗什译、赖永海主编《维摩诘经》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
- [16] 《佛道品第八》,见《维摩诘经》卷中。“八解”,指八解脱:一、内观色解脱;二、外观色解脱;三、净处解脱;四、无边处解脱;五、识无边处解脱;六、无所有处解脱;七、非想处解脱;八、究竟寂灭处解脱;“七净华”乃戒净、心净、见净、度疑净、道非道知见净、行知见净、断知见净。
- [17] 《如梦令·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阙。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18] (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1,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
- [19] 《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见童庆炳撰《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4年版。
- [20]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台北学海出版社1988年版。

黄惠菁,台湾屏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 徐州：苏轼文人画思想的发源地 ——以墨竹为中心

仇春霞

**内容提要** 苏轼的文人画思想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影响较大，但这个影响很多时候仅限于传抄他的观点，这无论是对真正的绘画理论建设，还是具体的创作，实际意义还是有限的。基于此，本文以墨竹绘画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以具体的史料为依据，对苏轼的墨竹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徐州以前，苏轼的文人画思想受文同影响较大，但缺乏实践。在徐州，苏轼开始画墨竹，理论有了实践的支撑，苏轼的文人画思想有了质的提升。但由于还缺乏生活体验，所以他的文人画思想还不完备，这个要等他经历了黄州，甚至是南贬生活以后，才能真正达到“物之相物，我尔一也”的境界。

**关键词** 苏轼 文人画 文同 徐州

苏轼的题画诗和画跋，数量比较多，时间跨度大。较早的有 25 岁时写的《王维吴道子画》，27 岁时写的《题凤翔东院王维画壁》，28 岁时写的《跋〈醉道士图〉》，32 岁时写的《〈九马图〉赞》等等。最晚可查的有去世那年写的《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王进叔所藏画跋尾五首》等等。而散见于各种文体中的只字片语，数量更是巨大。其内容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等诸多画科。这些与绘画有关的诗文，从总体上体现了苏轼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绘画观，被后世广泛引用。

但是，由于苏轼的绘画实践主要是在枯木竹石上，所以他最有价值的文人画思想还是集中于枯木竹石，尤其以墨竹为主。

关于墨竹画，苏轼较早的评论有 33 岁时写的《净因院画记》《跋文与可墨竹李通叔篆》，34 岁时的《题赵屼屏风与可竹》。此后至 42 时有一部分。文同去世之后有 42 岁时写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43 岁时写的《文与可飞白赞》，在黄州时期写的《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49 岁时写的《题文与可墨竹》《临筼筜图并题》，50 岁后写的《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跋与可紵竹》《文与可画赞》等等。

苏轼的墨竹理论也被广泛引用，但是引用时是需要甄别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苏轼引用别人的观点，苏轼的原创观点。

其二，从嘴巴里出来的理论，从实践得出来的理论。

其三，苏轼的实践主要是竹子和石头，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最有价值。

其四，徐州是发源地，黄州以后的观点比之前更有代表性。

如何能更好地甄别以上几点，一个较可靠的方法是梳理苏轼文人画理论的形成过程。因为诸多史料证明会给以上几点一个明确的解答。本文想要分析的是，徐州为何成为苏轼文人画思想非常重要的发源地。

## 一、机缘：文同回京述职、苏轼“彭门无事”

熙宁十年（1077），40 岁的苏轼从密州出发，准备回京述职。未曾料到，临近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驿时，他接到皇帝诏书：改知徐州，不得入国门。心怀抑郁的苏轼于四月到达徐州，他并不知道，这里会是他的文人画思想形成的重要地方。

苏轼在赴徐州途中给远在陕西洋州的老表哥文同写了一封信：

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挈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今日沿汴赴任，与舍弟同行。闻与可与之议姻，极为喜幸。从来交契如此，又复结此无穷之欢，美事！美事！但寒门不称，计与可必不见鄙也。临行冗甚，奉书殊不谨。俟到任，别上问次。（《与文与可十一首》二）[1]2442

文同（1018~1079），号笑笑先生或笑笑居士，苏轼多称“与可”，梓州永泰人（今四川绵阳三台县），是苏轼的远房表兄，比苏轼年长 18 岁。苏轼与文同私交非常好，他们第一

次相见是在治平四年（1064），那时32岁的东坡正即将结束在陕西凤翔的任职，46岁的文同则正在四川知普州，他在去京城述职的路上绕道看望了传说中的苏轼。这一见就定下了他们终身的友谊。后来东坡的弟弟由的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儿子，两人更是亲上加亲。

文同在文学上的天赋，以及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高贵而忧伤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他。苏轼在信中告之下一任工作地，私下觉得徐州比密州要平安些，因为密州已经接近边境了，宋辽战事随时可能波及密州，这个地方盗匪也多，比别处要乱。弟弟苏辙陪同苏轼前往徐州，苏辙向哥哥透露了一个消息：文同向他提亲了，想聘他的女儿为儿媳妇。苏轼很高兴，因为两家本来是世交，如今再结为亲家，就亲上加亲了。

文同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因为朝中无人，他在西南地区当了一辈子小官。此时他正在洋州，年底将结束洋州工作回京城述职。但此时的文同心灰意懒，上一次述职时他根本就没有回京。如今他马上满60岁了，基本没什么升迁的可能。他给苏轼回了一封信，表达了仕进无望，想要辞去公职、归隐乡下的打算。苏轼比较冷静地给他回了封信，他劝文同：

与可抱才不试，遁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彭门无事，甚可乐。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频得书，甚安。示谕秋冬过亲，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计安胜，为学想皆成就矣。（《与文与可三首》一）<sup>[1]1511</sup>

大意是说：您那么有才，却这么久没被重用，大家都在替您表示不平。但是谁又会在朝堂上为您说几句公道话呢？虽然您并不计较得失，但辞官有代价，没了生活来源，也是麻烦事。我刚到徐州，这儿公事不多，就不知道夏天会不会涨洪水。听弟弟苏辙说秋冬时节要办亲事，真是大好之事。您几位儿子都还好吧？学业应该挺不错的。

苏轼的这两封信本来是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将它们放在苏轼的文人画思想发展轨道上来看，就不一样了。

先是第一封信，也许是苏轼的安慰和劝告起了作用，文同变得积极了一点，他于十月份

回到京城，希望下一轮任职能换个好一点的地方。文同从洋州回到京城，在客观上加速了与苏轼的书信往来，因为洋州与密州一样，都是边境地区，通信不方便。而汴京到徐州无论陆路还是水路，都很便利，往返两京的邮差和朋友们都很多，这为他们后来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便利。

第二封信中的“彭门无事，甚可乐”，非常重要，因为无事，才可以“游于艺”。但是，彭门并非真无事。七月黄河决堤，八月二十一日，洪峰抵达徐州，苏轼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都在抗洪，他嘲弄自己差点成为一条鱼了。等到公事忙毕，他有时间坐在书房给朋友们写信时，文同也已经从洋州回到京城了。

于是，历史的拐点出现了：苏轼的文人画理论进入了孵化阶段。

## 二、孵化器：文同的墨竹理论与文学创作

文同的墨竹画创作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苏轼的文人画思想是嫁接于文同的墨竹创作和理论之上的。但是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初期甚至是比较隔膜的。

熙宁三年，53岁的文同与35岁的苏轼十分难得地都在京城任职。苏轼为文同的一幅墨竹题了一段跋文：

昔时，与可墨竹，见精缣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己，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观之，与可之病，亦未得为已也，独不容有不发乎？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彼方以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是吾亦病也。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sup>[1]2209</sup>（《跋文与可墨竹》）

这段跋文中的“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经常被后人引用，以作为苏轼的文人画观点。实际上，这篇带有小小说文体特征的跋文明确表示这是文同说的话。不是苏轼的话。所以我们应当从文同的角度来理解“病”与墨竹的关系。

文同的“病”，是士大夫不得重用的通病。这个病时好时坏，在京城时，多半会好一点，在地方上时，会严重一点。文同此时在京城，自然病就轻一点，或者没病了。

文同“重病”时，一般是在偏远而战事频发的西南地区，或者即将回到西南地区。这个时候，他那天生带有绘画细胞的神经中枢就不由自主地指挥他画画，他的身份也自动切换到画家。

但是，文同不允许自己是一位画家，因为宋代的画家与武将一样，是没有地位的，宋代宫廷画工的身份与杂役近似。不过，好在文同是一位天然的艺术家，而不是普通画工。因为他是一位艺术全才，诗文辞赋、书法、绘画、古琴等等，无不精通。在艺术创作上的自如表达，以及对艺术本质的通透理解，使得文同在绘画时会想到书法，想到文学，当然，归根结底是想到他自己。所以他画的墨竹一定是既有文同个人特色，又能寄托了失意士大夫普遍感情的“情绪竹”。于是，他的画名盖过了他的其他艺术，墨竹也越来越受欢迎。

苏轼能完全理解文同的生病就画，不生病就不画的原则吗？此时的他不能完全理解，他还在开文同的玩笑，希望他发病，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他画的墨竹。当然，他认为他这么想也是“有病”。

苏轼对文同的“隔膜”还表现在他写的《文与可字说》<sup>[1]333</sup>上。

熙宁八年，文同 56 岁，这是他在陕西兴元（今汉中）工作的第三年，按理他应当回京述职，经过考核后由朝廷安排下一个职务。但是他没有回京，而是在原地请求去陕西的洋州工作，请求被批准，他于这年十月十三日到达洋州。

按理说，官员回京述职意味着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工作和晋升机会，而文同却主动放弃了，这说明背后有难言之隐。他请苏轼为他写一篇《字说》，希望借苏轼之笔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心志。

所谓“字说”，就是剖析一个人的字所表达的道德或价值取向。《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同的字是“与可”，苏轼的《文与可字说》就是阐释文同的“与”和“可”两个字所包涵的道德与价值取向含义。在阐释“与”字时，举了子夏的例子，子夏与人交往的原则是：可以交的就交往，不可以交的就不交往。在阐释“可”字时，举了子张的例子，子张认为：大贤之人没什么东西是容不下的，我自己都不够贤达，别人就可能不与我交往，我又凭什么容不下别人呢？苏轼在前面做完大段铺叙后，认为文同

赞同子张的观点，并对文同的品德做了高度评价：

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文与可字说》）<sup>[1]334</sup>

苏轼给文同写字说时，正在密州捕盗捕蝗虫。不到 40 岁的他还体会不到长年屈居西南地区的老表哥的苦闷心情，所以他的《字说》还在大段“搬弄”《论语》。文同接到文章后似乎也没什么表示，以至三年以后苏轼在徐州时还跟他讨要一幅墨竹作润笔费。

苏轼与文同在艺术思想方面发生质的交流当始于熙宁七年，即苏轼在密州、文同在洋州的时候。其关键原因在于，此时文同在文学创作上更上一个台阶，代表作是《洋州三十首》以及《超然台赋》等作品。苏轼热情唱和了文同的《和文与可洋州园地三十首·筼筜谷》，其中“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sup>[2]676</sup>，文同读此诗时正与夫人吃笋，被逗喷了一地。苏轼对文同的《超然台赋》有更高的评价：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sup>[1]2060</sup>

苏轼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可以说是傲视古今，唯独称臣于屈原。苏轼将文同的赋比称于屈原，算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文同与苏轼在才情上相互吸引，这必须会使他们在徐州水灾后的清闲空档期有更密切和深入的艺术交流。

### 三、尖锋时刻：元丰元年

元丰元年，苏轼享受着“彭门无事”的清闲，文同也乐得京城无大事。这对亲家翁从前一年年底就开始了高频率的书信互动，主打内容是诗文和墨竹，附带问候身体状况。

元丰元年前后，苏轼给文同送了一只药玉船：

离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药玉船两只，献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颇多，致之不难，当续营之，但恐得后不肯将盛作见借也。（《与文与可三首》二）<sup>[1]1512</sup>

药玉船是当时杭州文人喝酒雅玩之物，此信末尾一句的意思是：我在杭州的老朋友比较

多，以后再寄点杭州的土产给你，就只怕你收到东西后，就不肯将你的大作借给我了。此处

“盛作”之意，联系后来信件，当是指书画作品，因为这件礼物后来与文同的墨竹搭上关系了。起因是苏轼发现不少朋友都有文同的墨竹，他有点坐不住了，给文同写了一封信：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与文与可三首》三）  
[1]1512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我最近呀，在好几个朋友那里看到你新画的墨竹，我却只有一幅，还只有一竿竹子。我给你写过《字说》，你也没有送我一幅作润笔费。你家的伙夫估计都比我得到的墨竹多。我现在专门派人去找你要竹子，你最好别拖延太久。否则，我就到处乱画，上面题字：文与可笔。或者就按你赠给我的诗里所说的，给我二百五十匹绢，呵呵！

这个二百五十匹绢的典故，发生在苏轼这次去信之前。文同写信给苏轼说：“我最近跟士大夫们说，我这一派的墨竹在徐州（苏轼为官的地方），你们想要墨竹，就到那儿去求吧。那这些做袜子的材料就都会聚到你那儿去咯。”做袜子的材料就是指画墨竹用的绢。文同还在后面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稍万尺长”（《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1]365

东坡回信给文同说：“要画万尺长的竹子，那得用绢二百五十匹啊。我知道你不想画了，你把那绢给我吧。”文同无言以对，就说“我说错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东坡又去了一首诗：“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文同回信说：“老弟你虽然善辩，要真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就要买田归老咯。”

这封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苏轼已经在跟文同画墨竹了，要不然，文同也不会说他那派墨竹已经转移到徐州去了。

苏轼此番“出击”，得到了文同的一幅《筼筜谷偃竹》。他很高兴，于正月二十八日给文同回了一封信：

轼启：郡人还，叠辱书教。承尊候微违和，寻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书云：尊貌颇清削。伏料道气久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忧悬。惟谨择医药，痛

加调练，莫须燃艾否？轼近来亦自多病，老年使然，无足怪者。

蒙寄惠偃竹，真可为古今之冠，谨当缀黄素其后，作十许句赞。盖多年火下，不可无言也。呵呵。闻幼安父子共得卅余轴。谨援此例，不敢过望。所示，当作歌诗题之。轼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愿而不得者。今后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吓之术，一何疏哉。想当一大噱。别后亦有拙诗百余首，方令人编录，以求斤斧，后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见少，当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长进。此其为赐，又非颂惠墨竹之比也。冗中奉启，不尽言。

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正月廿八日。  
[3]298

这就是苏轼传世书帖《偃竹帖》，此信提到了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文同的身体反复无常，苏轼建议他看大夫、吃药、调练。

二是苏轼评价文同的《偃竹》为“古今之冠”，表示要在后面写赞语。

三是苏轼所藏文同的墨竹非常少，苏轼几年前之后的大亲家石康伯（字幼安）有三十多幅。他跟文同开玩笑说：“你就按这个数给我吧，我也不求多的”。还开玩笑说：我送你一只药玉船，你就回赠我一幅竹子，你这是吓唬我吧？

四是是他很少看到文同的墨竹，他希望能借文同的墨竹，以便好好学习。苏轼说：“你要是愿意这么做，真是比送我墨竹更有价值”。

上面这封信，对了解苏轼收藏和学习文同墨竹绘画的情况十分重要。但是苏轼对这《偃竹》的文人意象要过一年才悟读出来。

针对苏轼在信中提到的养身、求墨竹等内容，文同似乎一一作了回复，因为苏轼的传世书帖《墨竹草圣帖》与此有密切关系：

寄示墨竹草圣，皆极妙，所谓亹亹逼人。并示长生匱法，仆亦传得此方久矣，但未暇养练。常有从理入口之忧，所谓面上桑叶气，非所患也。松滋王令，邂逅一见，好学佳士也，辄托附书。适值数亲客，冗迫，未暇详悉，续附递次，不一一，轼顿首。

墨竹与石，近又变格，别觅便，寄去次。  
[3]337

这封信应该与上一封信对照着读，它们的意思是前后衔接的：

一是文同真的应苏轼的请求，给他寄了墨

竹和草书：

二是文同回应苏轼对他身体的关心，表示自己在练外丹功法。苏轼表示他了解文同的这个练功法，自己也有练过，但没有坚持；

三是苏轼告诉文同，他最近画的墨竹和石头有了新面貌，他打算另外再找方便的机会寄给他看。

这封信的信息同样十分重要，它透露了如下重点关键点：

一是文同的确是教苏轼画墨竹，而这个画法里，草书是基础。

二是苏轼不只是画墨竹，还有画石头。

这两点这意味着对墨竹的认识将进入到艺术本质的深度。

不久，文同给苏轼寄来了一首和文彦博的六言诗。苏轼在三月二十六日回复了这封信，评价说是“甚精奇”，表示也准备来几首，但是谦虚地说写得不如老表哥好。这就是苏轼的传世手札《平复帖》：

轼启：叠辱来教，承起居佳。适闻中  
间复微恙，且喜寻已平复。轼比来亦多病，  
渐老不耐，小放意辄成疾，不可不加意慎  
护也。水后弥年劳役，今复闻决口未可塞，  
纷纷何时定乎？寄示和潞老诗甚精奇。稍  
间当亦继作六言诗，殆难继也。未缘会遇，  
万万以时自珍。谨奉手启，上问不宣。轼  
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三月二十六  
日。  
[3]151

这封信再次证明文同的身体不是很好，实际上，不止是阳春三月，可能一整年都不好。他在夏天曾在一幅墨竹后跋了一段文字：

伏暑不能退，须在假将理。今仅能饮  
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资、简，生  
事窘薄，俯首碌碌，为窃禄人，渐悚。

素所嗜好，都自撤去，惟画竹、吟诗，  
有子骏、子瞻为真赏，故断之迟迟。  
[4]1172

看样子他饮食很不好，已经瘦得不行了，他希望下一任是去襄州、汝州，或者离老家近一点的资州、简州。他俸禄微薄，一生不重用，从“为窃禄人”可以看出他的无奈。他已经心灰意冷，余生所好，唯画竹和吟诗，子骏和苏轼是他的知音，他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精神安慰。而这一点对于苏轼的墨竹艺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契机。

### 四、重要事件：黄楼屏风

元丰元年八月，苏轼在江苏徐州修建的黄

楼落成，他向朋友圈发出诗文辞赋征集令，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文学雅集。在这次颇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活动背后，还有一件事是苏轼十分关注，但是不容易为人所留意的，那就是苏轼很希望在黄楼上安置一道屏风，作为“镇宅”雅物。

为新修的楼阁添置一副屏风，这在宋代是一种时尚，很多士大夫或富人家都会摆上形制和功能不一的屏风，所以苏轼的愿望是很大的。但是屏风的非物质性功能，以及由谁来画屏风，在苏轼这位大才子眼里，可能就变得“别有用心”了。

苏轼决定请文同来完成这项任务。那么，苏轼为何选择的是文同，而不是王诜（1048～1104年以后）、李公麟（1049～）、米芾（1051～）等等在后来名气更大的画家。

关于这个问题，先要排除掉李公麟和米芾，因为当苏轼在徐州时，他与这两位大咖正处于时空不交轨的状态。李公麟比苏轼小11岁，他在22岁中进士时，33岁的苏轼虽然正在朝中任监官告院。一个是新晋进士，一个易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两人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好朋友。后来李公麟就去了江苏泗州，负责官员的档案文书，以及弹劾工作。苏轼则在第二年去了杭州任通判，接着就是在密州、徐州工作，这样的人生轨迹与默默无闻的李公麟并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苏轼与李公麟的深度交往是在修完黄楼10年之后，即元祐年间两人都回到权力中枢以后。

米芾比苏轼小14岁，苏轼为黄楼设计屏风时，27岁的米芾还是长沙一名小小的办事员。他第一次被苏轼所知道是在黄楼修完后的3年之后，当时苏轼正待在黄冈贬所，米芾带着朝拜的心情从长沙跑到黄冈去见他的偶像。

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画家，如郭熙、崔白、赵令穰等，虽然与苏轼都是同一个时代，但交情不够。比如非常有名的山水画家郭熙（约1023～1085），他比苏轼年长，在熙宁元年召入画院，后任翰林侍诏直长。当时一些名人手上都有郭熙的画，比如文彦博就收藏过郭熙的《秋山平远图》，还为这幅画题过跋，苏轼专门为这幅画题过诗。著名的花鸟画家崔白也是苏轼同时代人，他曾于熙宁初为宫廷做过画。苏轼见过皇室成员赵令晏藏崔白的三丈巨幅花鸟画，陈列于墙壁上。与赵令晏同辈的另一皇室成员赵令穰及其弟赵令松也都与苏轼同时代。他们画过很多卷轴画，也画过很多壁

画。但都不是苏轼凭一封信就可以得到一幅画的。

所以，从时间、交情、艺术醇熟度上来看，文同都是苏轼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时间与交情并不是苏轼选择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文同的人品与才华得到苏轼的高度认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使文同成为在最合适的一位。

为了使文同更清晰地了解黄楼及其周围的情况，他先是托石康伯带口信给文同，说出所求，并请石康伯为文同口头介绍黄楼情况。然后他专门修书一封，郑重邀请，这就是苏轼传世书帖《黄楼帖》：

轼辄有少恩，托幼安干闻。为近于守居之东作黄楼，甚宏壮，非复超然之比。曾告公作《黄楼赋》，当以拙翰刻石其上。其临观景物，可令幼安道其详，告为多纪江山之胜，仍不用过有褒誉。（若过誉，仆即难亲写耳，切告。）又有少事，甚是不识好恶，辄附绢四幅去，告为作竹木、怪石少许，置楼上为屏风，以为彭门无穷之奇观，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画，必相继修葺，则黄楼永远不坏，而不肖因得挂名，公其忍拒此意乎？见已作记上石，旦夕寄本去。正月中遣人至淮上咨询，幸少留意，不罪，幸甚。轼惶恐。<sup>[3]291</sup>

看样子，苏轼除了求竹石屏风画，还向文同求了一篇《黄楼赋》，他准备把文同所写的《黄楼赋》书刻于石头上，以永垂不朽。

苏轼给文同寄了4幅绢，这说明苏轼预先就设计好了屏风的尺寸，并且不希望文同破费买画材，文同只需要作画。在内容上，他提出的要求是竹石，这是他喜欢画的题材，也是文同最拿手的画种。由于苏轼是寄了绢过去的，信里就不需要提画幅尺寸，所以后人无从得知画心的具体尺寸。不过，4幅绢，说明屏风是4折。

4折屏风和1篇辞赋，对于身体已经非常不好、饮食难进的60岁老人来说，不是随时就可以一气呵成的。第二年正月，文同去世，两个时间点相距不过几个月。总之，在黄楼落成后举办的重阳节大庆典上，文同的赋还没有寄到。十月中旬，苏轼再次去信相催：

轼启。稍不驰问，不审入冬尊体何如？想旧疾尽去，眠食益佳矣。见秋试，知八郎已捷，不胜欣慰。惟十一郎偶失，甚为怅然。然一跌岂废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语古妙，非世俗所能仿佛。

长句偈尤奇，非独文字甘降，便当北面参问也。近有一僧名道潜，字参寥，杭人也。特来相见。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有一诗与之，录呈，为一笑也。未由展奉，万万以时自重，不一不一。轼再拜，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十月十六日。

《黄楼赋》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留意。

这封信即是苏轼传世手札《入冬帖》<sup>[3]87</sup>。在苏轼稍后写给文同的信里可知，屏风仍然还没有画成：

轼启。近承书诲，喜闻尊候益康胜，见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与明。若得与兄联棹南行，一段异事也。中前桑榆之词，极为工妙，寻曾有书道此，却是此书不达耶？老兄诗笔，当今少俪，惟劣弟或可以仿佛。墨竹即未敢云尔，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来索，大好禅机，何处学得来？大轴挥洒必已了，专令人候请。切告。乌丝栏两卷，稍暇便写去。近见子由作《墨竹赋》，意思萧散，不复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老笔也。亦欲写在绢卷上，如何？如何？乍凉，万万珍重。（《与文与可十一首》九）<sup>[1]2445</sup>

这封信的第一条信息是值得细读的，文同申请去浙江，苏轼申请去宣州或明州，两处都可能与文同很近，如果两人能一路同行，切磋艺术，真是妙不可言。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后的交流更便捷了。另外三点信息都与墨竹有关，即：

一是苏轼认为他能写出与文同一样好的诗文，但画不出比文同好的墨竹。

二是文同还没有完成屏风一个大任务。

三是文同向苏轼索要书法，苏轼决定将弟弟苏辙的《墨竹赋》抄了送给他，这样会很配他画的墨竹。

这封信还有两条潜在信息值得深读：一是苏轼后来发现，苏辙的《墨竹赋》并没有悟到文同墨竹的奥妙之处；二是如果文同后来交付了画作，这也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幅大作。

## 五、发源地为何止于徐州

自从苏轼在徐州开始学墨竹，文同就戏称他那派墨竹已经迁往彭城了。但是苏轼在徐州时间并不长，有些东西还未能展开和深入下

去。

苏轼离开徐州的信息已经于元丰元年冬天就放出来了，只是下一处任所在何处，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文同的很快出来了，牧守地是湖州，苏轼得知消息后立即去信祝贺：

轼启。冗迫，稍疏上问。伏想尊履佳胜。承书，领吴兴。众议谓公当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为左右贺也。吴兴山水清远，公雅量洪度，在王、谢间，此授殆天意耳。轼欲乞宣城，若幸得之，当与公为邻国，真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难遂，从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艰涩，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鄆济过我于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无冰，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筹之。余惟万万以时自重。笔冻，奉启殊不谨。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清官使。此语可记。  
（《与文与可十一首》十一）<sup>[1]2446</sup>

看来文同的最高目标是留在京城，苏轼却祝贺他得到湖州，因为他一直觉得湖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王、谢遗风，很适合文同。为此苏轼就想谋划宣城，因为宣城离湖州很近，他们可经常通书信。他甚至提前开始规划两人的赴任路线，期待美好的旅行。

可是很不幸，文同病重。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他前往湖州的途中，在离京城 160 公里左右的陈州病逝。东坡于二月初五得知讣告，悲痛不已。

文同去世，打乱了之前所有计划。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接了文同的空缺。但是在湖州的时间非常短（任期 107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28 日），接着就发生了“乌台诗案”而被抓离湖州。

从文同去世到苏轼离开湖州，虽然只有半年多，但苏轼对文同的墨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表现在他所写的两篇文章上，一是《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sup>[1]613</sup>，其中的赞词是：

先生闲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天然而笑。

文同的号是笑笑先生，苏轼从文同的墨竹里看见了文同精神与气质，“物之相物，我尔一也”。苏轼曾认为生命的延续有两种方式：一是儿子，二是文字。文同的墨竹，何尝不是第三种方式呢？

另一篇是《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这篇文章的出现，标志着苏轼在墨竹绘画上迈开

质变的一步，其关键原因在他自己所说的那句话：

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sup>[1]365</sup>

这是针对前文提到的苏辙为文同所写的《墨竹赋》而作的评论，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苏轼正是通过绘画实践发现了文同墨竹的非凡之处，他在这篇文章里不再写过多空洞的赞语，而是记录下了文同教给他的方法：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1]365

这段话曾无数次地被后人转载，许多人都将之归为苏轼之语，其实他已经很明白地说明这是文同教他画竹时的心法。他是通过不断画竹才明白文同所说的意思，但是由于他练得少，所以不能心手相一。

苏轼这个宝贵的发现没能在实践中继续下去，因为他写完这篇文章二十多天后，他就被抓走了，直到大年夜的前一天才被放出来。

所以严格来说，苏轼对文人画的理解，发源地是徐州，而湖州是在徐州基础上的进一步巩固。但无论是在徐州，还是在湖州，苏轼的拓展还止于墨竹技法。而要将技法与画意合二为一，做到“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必须是在苏轼进监狱、贬黄州以后，只有对生活的感悟越深，苏轼才越能理解文同的墨竹，并形成属于自己的艺术思想。

###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3] 水赉佑编《苏轼书法史料集》，上海画报出版社 2017 年版。

[4] （宋）文同著，胡问涛、罗琴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下册，巴蜀书社出版社 1999 年版。

仇春霞，美术学博士，北京画院副研究员。

# 由“黃樓”談蘇軾徐州詩文創作的指向性

宋定坤

**内容提要** 苏轼在知徐州的一年零十一个月里抗洪救旱、兴修水利、开采煤矿，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都属少见。黃樓作为苏轼在抗洪成功一年之后建成的标志性建筑，既有着巩固城防的政治军事作用，也因在落成之时所举行的黃樓集会而成为了苏轼在徐州的主要文学活动场所，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地位，被视作他在徐州的象征，苏轼的诗文创作也因此具备了双重的指向性。围绕着黃樓和黃樓集会，苏轼主动承担了文坛领袖的责任，提携后进、注重诗赋创作，创作了一批具有徐州特色的诗文。在这些作品中，苏轼借黃樓畅快抒发内心所想，展露出了在抗洪成功之后的感慨、对徐州军民的关心、对后辈的提携、对政治现状的讽喻、对徐州山水的喜爱等独特创作心态。

**关键词** 苏轼 徐州 诗文 指向性

黃樓是徐州市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本是苏轼抗洪胜利之后率众在城东门之上“大筑其门，护以砖石”（《书子由黃樓賦后》）<sup>[1]7394</sup>

修建的用以防洪、抗洪的建筑，后因年久失修，再加上河水改道，黃樓已不再承担防洪的任务，在清代迁到了城东北隅重新修建，逐渐演变成了带有浓重苏轼元素和徐州色彩的文化遗存。因宋代官制所限，地方官员很难在一地任职太长时间，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徐州上任，并于元丰二年（1079）二月下旬或三月初离开，为期一年又十一个月，是他在地方任知州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时期。苏轼在徐州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本着“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徐州谢上表》）<sup>[1]2659</sup>的态度扎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抗洪救旱、发掘煤田、兴修水利，取得了卓

著的政绩。作为衔接密州和黃州时期的中间点，徐州时期的苏轼依然有着前期的意气风发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自信，这些都可以在诗文之中管窥一二。

如今黃樓单纯被视为苏轼在徐州的象征，在当时却既是保护“当水之冲、府库在焉”的城东门要地的缓冲建筑，又是抗洪胜利的纪念，它的落成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元丰八年八月，黃樓建成；九月，苏轼举行了“大合乐”的仪式来庆祝这件盛事，同时邀请了诸如王巩、陈师道等人到徐州来参加，苏辙、秦观等人也寄来了自己围绕黃樓进行想象和发挥的作品，黃樓集会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成为了宋代文人墨客集会的代表，确立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黃樓”一词也因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而成为了一则典故和意象，逐渐演变为苏轼在徐州的象征，苏轼借此赋诗作文抒发了抗洪成功的喜悦、回忆抗洪时的感慨和对徐州军民的关怀等复杂情感，展现了独特的创作心态。

## 一、苏轼徐州诗文创作具有双重的指向性

苏轼的一生可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线，共在八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徐州是第二站。他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到徐州上任，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口，八月便逼近徐州城下，“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直到十月才“澶州大风终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复故道。”（《河复并序》）<sup>[2]1583</sup>之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蠲免其赋调，又饮食其饥寒”，以助徐州人民休养生息，同时又“敢不躬亲畚筑，益修今岁之防；安集流亡，尽复平时之业”（《徐州谢奖谕表》）<sup>[1]2571</sup>，带领百姓修筑城防、安

抚流民，恢复生产的同时也防止洪水再次肆虐。然而洪水刚刚退去，元丰元年（1078）徐州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徐州祈雨青词》）<sup>[1]6831</sup>，苏轼又多次来往徐州小石潭、雾猪泉等地求雨，同时赴萧县杏花村劝农，并于同年十二月发现了煤炭，“始遣人访获取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既解决了徐州百姓冬天取暖的燃料问题，也保证了徐州利国监冶铁制瓷的燃料供应，“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石炭并引》）<sup>[2]1886</sup>。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二月下旬或三月初离开徐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七月二十八日便被押往汴京御史台问审，知湖州仅九十八日，因此徐州作为衔接苏轼人生前期和中期的时间点，他在此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和国计民生，政务十分繁重。此时的他还未经“乌台诗案”的迫害，文学作品较之其它时期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依然表现出前期的意气风发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自信。还未曾因言获罪的苏轼许多诗文的用语十分直白犀利，直指当时政务的弊端，这些也都成为了日后被攻击的证据。

“指向性是指文学艺术形成之初艺术形式所必备的具体指向、特殊目的和功能意蕴等多种非文学功能，它寄予着表现主体对其指向对象的现实期望和理想意愿；通过这种具体指向，客观地构成主体与对象两者间的沟通交流关系”。<sup>[3]</sup>苏轼在徐州的诗文创作具有相当独特的双重指向性。北宋初期的文学继承晚唐五代遗风，一方面在诗歌上更加讲究法度，词则作为“诗余”和“小道”依然不受重视，另一方面则在散文上侧重于创作展现才力的骈文，形成了绮靡晦涩的不正文风。苏轼之前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兴起了“古文运动”，他们极力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主张文道统一，秉持着“道先于文”的观点，创作了大量平易自然、血肉丰满的散文，一扫北宋初期绮靡晦涩之风，确立了北宋散文平易通达、旨在反映现实的风格。北宋的“古文运动”与前代不同，它是完全由士大夫群体兴起的一次变革，葛晓音在《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便写道：“古文运动”不只是文体上的一场革新，也是“儒道自身由礼乐转向道

德、由雅颂转为讽喻，由章句转向义理的一次革新”<sup>[4]</sup>。

由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提高、经济空前发达，诸多文化形式迎来了大繁荣，文学也开始融入其它文化形式的元素而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苏轼读书极多，又重视借鉴前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因而他的眼界较之前代文人更加开阔。他在徐州作为知州，既有着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又肩负着行政长官的政治责任，因此他在徐州的文学活动代表着宋代士大夫群体性质转变的矛盾性，即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取舍，有着很独特的指向性。黄楼集会作为苏轼在徐州政绩的象征和文学活动的高峰，突出地凝聚了这种指向性。对外来说，苏轼此时借由抗洪成功、黄楼建成的契机组织了集会，实际上是确立了他文坛领袖的地位的。对内来看，苏轼的诗文浸润着他作为士大夫文人的气质修养、秉性风度，展现出他独特的生活品味和丰富精神面貌。他在徐州作为知州虽然创作了许多与其政务相关的文学作品，但就其精神本质而言，仍是蕴含了苏轼政治理想和抱负、展现了其文才和学识的士大夫之文。此时的苏轼仍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政治上得到了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并也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这样的背景和创作心境在整个生涯中都属少见。

## 二、黄楼集会确立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

徐州城东门是当时府库所在之地，不容有失，但城东同样也是最容易受到洪水冲击的地方。苏轼在《放鹤亭记》中描述徐州的地形地势为“隐然如大环”（《放鹤亭记》）<sup>[1]1136</sup>，准确而形象地描述出徐州城区四周山丘连绵、而城中低洼的情景。处在盆地之中的徐州极易积水，加上汴水与泗水汇于城东北角，河道却因之后需途径吕梁山区而变得狭窄，平日里水流便十分湍急“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其一）》）<sup>[2]1858</sup>。因此徐州城每逢大雨便容易排水不畅，历史上频繁受到洪水侵扰，城东更是“当水之冲”。鉴于城东门重要

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作用，同时结合“然地狭不可以为瓮城”的现实因素，苏轼决定“大筑其门，护以砖石”，（《书子由黄楼赋后》）<sup>[1]7394</sup>同时拆除了一间据传为项羽所筑的废厅作为材料“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垩以黄土，曰：

‘土实胜水’”，（《黄楼赋并序》）<sup>[5]</sup>用“土实胜水”的寓意取名“黄楼”来保护东门，同时也作为抗洪成功的象征。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日（1078年8月20日）黄楼建成，九月庚辰日（9月9日）正值重阳佳节，苏轼举行了盛大的典礼来庆祝，并主持了一次著名的诗文酬唱，邀请了苏辙、秦观、陈师道、王巩、舒焕等人来参加，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苏辙、秦观的《黄楼赋》及陈师道的《黄楼铭》，《木笔杂抄》中称其“同时三文而皆卓伟可以传不朽”。

黄楼集会之所以能确立苏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地位，首先得益于北宋初期“文坛”概念的成熟。朱刚在《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中指出，“文坛”是出于对“人同此心”——即人类在情感和审美意识上的共通性的信任基础上确认的一种公共性文学价值，并以此价值为维度确认的一个公共领域。<sup>[6]</sup>由于北宋文官地位得到提升，兼之科举入仕成为文人当官最主要的途径，由此形成了一批因科举而聚集的、十分有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他们或是同年，或是同乡，或是同门，因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诉求团结在一起，吸收同类、排斥异己，对政治和文化发出集体的声音成为他们最显著的标志，这种具有明显公共性的政治团体便是北宋著名的“朋党”。从宋真宗时期的“君子小人”之争开始，历经宋仁宗时期“庆历士大夫”群体对前辈保守官僚的挑战，再发展到宋神宗时期及以后一直延绵至南宋初的“新旧党争”，宋代的政治核心由唐代的世家贵族团体转换为士大夫官僚群体，凡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僚士大夫都可以找到愿意接纳自己的政治团体来建言践行，进一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群体基础。而政治上公共性的加强也会映射到文学上，文人士大夫因文入仕，寻求政治上的认同终究会落脚在寻求文学上的认同，他们为了使带有更多自身色彩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和认同，不

得不对此加以改造使其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和普遍性，这便是“立言”。因而跨地域的文学集会成为文人之间寻找共同性的重要途径，苏轼所主持的黄楼集会便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

文人集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唱和”，即两位文人围绕特定的题目进行的诗文的往来。由于文学创作与政治建设不同，具有更大的个人主观性和私密性，“唱和”的参与者规模一旦扩大，所作出的文学作品容易超出原定的主旨而进行主观发挥，由此形成的文学认同会更加稳固。中国文人很早就有集会创作的传统，早期的文人集会由于交通和媒介的发展情况所限制，多发生在同一地点之内，例如建安时期的邺下宴集、王羲之参与的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等。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集会作品。唐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巩固统治，需要更为便利的信息传递系统，因此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邮驿传递系统，随之方便了文人通过书信进行诗文的往来，促进了文人异地集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如收录白居易、元稹和崔玄亮三人作品的《三州唱和集》，记录的便是他们分别在杭州、越州和湖州任职时借助邮驿系统多次相互酬唱的诗文。

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邮驿传递系统，加上宋朝的疆域不如前代广阔，文人的诗文唱和更加便利，这种异地同题写作的集会形式更加普遍，黄楼集会便是其中的代表。黄楼建成之时，苏轼所邀请的文人并不都在徐州，当时苏辙在应天府任职，秦观闲居在家乡高邮，王巩、陈师道、顿起与舒焕等人与苏轼则同在徐州，苏轼有《九日黄楼作》，顿起有诗《记黄楼本末》，今亦佚失。苏轼还曾邀请文同和黄庭坚二人作《黄楼赋》，当时文同正在从洋州转任湖州的路上，黄庭坚则在大名府任国子监教授，也都未曾亲临，今二人文集中均已不存《黄楼赋》，并不能知晓是否有诗文参加集会。

黄楼集会之所以能确立苏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地位，还要得益于苏轼本人的自觉担当。在之前的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知州时便主持修建了超然台，并组织了一次文学集会。当时苏轼在诸城修葺自己居所的园子，看到建在城墙上的一座台子已经废弃，便“稍

葺而新之”。苏辙当时在济南，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文意命名为“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sup>[1] 1106</sup>以超然台的修建为契机，苏轼邀请了苏辙、文同、张耒、鲜于侁等人进行异地唱和，纷纷表达了对“超然”的态度。当时北宋新旧党争已经逐渐恶化，苏轼、苏辙等人被视作旧党已经遭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苏轼举行这两次集会既是为了纪念新建筑物的落成，也是为了团结友人、提携后辈，借群体的表达来增进相互间的认同，同时也是为了借诗文展露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作为知州，苏轼修建黄楼一是为了巩固城防、纪念抗洪成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黄楼赋并序》）<sup>[5]</sup>，举行集会也是为了记录这一事迹，同时回想抗洪的坎坷经历以团结军民共同发展。作为前辈，苏轼组织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等当时名声依然不显的后辈来参加集会，也是对他们的一次鼓励和提携。如秦观此时已经三十岁却仍未科举入仕，闲居在家乡高邮，正准备去参加科考。苏轼邀请秦观为此作《黄楼赋》并高度地称赏其“中有屈、宋姿”，同时积极地为之募工刻石，扩大了这篇文章的影响，这对秦观本人也是一种激励和培养。作为文人，鉴于当时王安石的科举新政正在实施，经义和策论取代了传统的诗赋成为考试项目，苏轼此刻邀友人多做诗赋，既是对传统散文体裁的继承和保护，也是对新党新政的抨击与反抗。

到了北宋中期，由于交流媒介的快速发展和“唱和”传统的革新，文人集会的形式由同时同地演变为异时异地，苏轼在举行黄楼集会的时候也承担了发起人、主持人和领袖的责任。之后以苏轼为中心、由苏轼组织的文学性集会逐渐演变为以“苏门六君子”为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面临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他们在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各遭贬谪和迫害，再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的元祐年间曾短暂地得到提升和重用并在汴京聚集，相聚之中也不免再次集会进行写作，但再难有黄楼集会的规模和积极心境。不久之后，随着新党的反攻和重新执政，他们被迫再次流落各地，团体成员间的距离和交流的线路

被迫拉长。然而也正因为它们分散全国各地，所以其影响和思想也随之扩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团体，最终收获到同时代文人的普遍关注，苏轼的文坛领袖地位才愈发稳固。

### 三、借“黄楼”抒怀：苏轼徐州时期创作心境浅析

用典，是中国古代诗文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钟嵘在《诗品》中称为“用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卷八则称为“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sup>[7]</sup>他认为用典是引用事例或者古人的言辞来解释当下的情境。在苏轼修建黄楼成功以后，黄楼便具有了不同的文化意义，成为了苏轼在徐州的代表和证明，也因此变为了一则典故和意象，后人多借“黄楼”来表示对苏轼的尊崇和喜爱。如贺铸的《登黄楼有怀眉山》、萨杜刺《黄楼》、归有光《黄楼行》、钱谦益《徐州杂体五绝句》等作品。实际上苏轼本人也并未将黄楼简单的看作一座建筑，他在其中倾注的心血和感情使得他对黄楼的观感十分复杂，仅在徐州便有十七篇与之相关的作品。这些作品围绕黄楼和黄楼集会，展现出了苏轼丰富的创作心态，结合苏轼徐州时期的其他作品，可以展现出苏轼在徐州的情感历程和心态变化。

黄楼作为苏轼在徐州的文化象征，凝聚着苏轼许多的感情和心血。经历过“下者为污泽，上者为沮洳；民为鱼鳖，郡县无所”的险恶洪灾之后，苏轼在黄楼建成之日发出了“今夫安于乐者，不知乐之为乐也，必涉于害者而后知之”的感慨，认为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之后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乐”的内涵。登临黄楼，面对着“览天宇之宏大，缭青山以为城，引长河而为带，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的壮观景象，苏轼却突然有了“故吾将与子吊古之人既逝，闵河决于畴昔，知变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终日”（《黄楼赋并序》）<sup>[5]</sup>的忧患意识。这种恍如隔世的奇妙心态在《九日黄楼作》<sup>[2] 1805</sup>中展露的更为直观：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黃花白酒无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袜。  
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事鍬鋤。  
黃樓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殺。  
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刹。  
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轧。  
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澆腸氣先壓。  
烟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巒巒。  
詩人猛士雜龍虎，楚舞吳歌亂鵝鴨。  
一杯相屬君勿辭，此景何殊泛清雪。

黃樓落成，賓朋滿座，舉城齊樂，蘇軾却不免回想起去年今日“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的情景，不免有物是人非的感慨。當時蘇軾剛來徐州任職不久，面臨着洪災傾覆的危險，抱着“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sup>[8]</sup>的決心，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是“水大至而民不潰”，<sup>[5]</sup>保全了徐州城和百姓。蘇軾在《九日黃樓作》中詳細地描述了當時抗洪的艰辛和危險。既有徐州城內化作澤國的“南城夜半千汎發”，也有忙於抗洪朝出晚歸的“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袜”。對比當時“豈知還復有今年”的悲壯心境，此時的歡樂和從容顯得更加不易，於是蘇軾“把盞對花容一呷”，笑談即使環境仍是“莫嫌酒薄紅粉陋”般艱苦，但畢竟有樂可享，“終勝泥中事鍬鋤。”黃樓建成之後已是深秋，眼看着“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刹”的美麗景色，座中又是“詩人猛士雜龍虎”的名人賢士，蘇軾心中也充滿了“一杯相屬君勿辭，此景何殊泛清雪”的豪邁之感。

蘇軾此時已經成功克服洪災旱災，内心充斥着感慨和自豪的感情。然而對比蘇軾初來徐州時所作的一些詩歌，不難發現出其中的消極和感傷，由此可見蘇軾在徐州的心態经历了相當大的轉變。如《過云龍山人張天驥》<sup>[2]1540</sup>：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  
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  
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  
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  
西風高正厉，落叶紛可扫。  
孤童卧斜日，病馬放秋草。  
墟里通有无，垣牆任摧倒。  
君家本冠蓋，絲竹鬧鄰保。

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  
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  
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媼。  
饥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芼。  
慈孝董邵南，鸡狗相乳抱。  
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  
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  
從君學種秫，斗酒時相勞。

云龍山位於徐州老城城南，命名原因眾說紛紛，《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其因“山出云氣，蜿蜒如龍”<sup>[9]</sup>而得名。蘇軾從密州離任本是應去河中府任職，却在熙寧十年（1077）二月在赴任的途中得到旨意改知徐州。按宋代官制要求蘇軾應去汴京述職並等待任命的文書，但卻因當時是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執政而刻意刁難不得進入國門，只能在京都外的朋友莊園里住了一個多月，最終也未曾能進去都城，無奈在四月至徐州上任。剛來徐州的便經歷了嚴酷的政治形勢和迫害，深感政治斗争无情的蘇軾萌生了一些消極的想法，內心充滿了憤懣和不平。他于八月去雲龍山游玩兼拜訪雲龍山人張天驥，寫下了這首詩，裏面表現了對張山人“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的高尚品格的贊美和嚮往，同時借“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一句表現自己已經有隱退的想法。

蘇軾展露類似消極心態的作品還有《徐州送交代仲達少卿》<sup>[2] 1486</sup>：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  
旧尹未嫌衰廢久，清樽猶許再三開。  
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  
歸去青雲還記否，交游勝絕古城隈。

這首是蘇軾到徐州所作的第一首詩，本是在到任交接完工作之後送別前任江仲達的應酬之作，蘇軾却也在其中使用了“此身無用”、“不才”等詞語，既是送別時的自謙之語，也是抒發自己內心的不平之氣。當然蘇軾的這種消極情緒並沒有持續多久，同年八月蘇軾拜訪雲龍山人不久，洪水便逼近徐州城，蘇軾開始了自己繁忙的抗洪救災任務，自然再也無心感概己身的得失。蘇軾本人性格豁達開朗，並不是那種沉浸在自己內心的消極情緒中長久不得自拔的人，再加上蘇軾赴任不久便面臨着重大的洪災，蘇軾在經歷了考驗和磨難之後整個

人的愤懑化作了对徐州人民的关怀，下令建造黄楼也是有着与民同乐的想法的。如《黄楼致语口号》中便有“谁凭阑干赏风月，使君留意在斯民”<sup>[2]5433</sup> 的诗句来表示苏轼修建黄楼并不仅为赏风弄月，更多的还是心系民众。

黄楼集会以后，苏轼经常带着友人登临游玩，同年十二月道潜来徐苏轼便与之同登黄楼，他们于其上极目远眺、作文抒怀。黄楼从一开始的城防建筑演变为了徐州的“文化地标”，苏轼在徐州许多的文学活动都围绕着黄楼所进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还属“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所办的“鹿鸣宴”。(《徐州鹿鸣宴赋诗序》)<sup>[1]1003</sup> “鹿鸣宴”起源于唐朝，宋朝沿袭了下来，是地方一级考试放榜后州县的长官们宴请上榜考生、学政和考官所摆的一场宴席，主要庆贺举子上榜取得佳绩，同时歌颂地方长官的治理，取《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之意。宋代注重科举入仕，因此考生的成绩是官员教化的重要政绩之一，与官员的品德声望有密切关系。王安石变法之后，诗赋不再是科举的题目，苏轼却仍在这场庆典中赋《鹿鸣宴》<sup>[2]1846</sup> 一诗：

连骑思思画鼓喧，喜君新夺锦标还。  
金罍浮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待入关。  
他日曾陪控禹穴，白头重见赋《南山》。  
何时共乐升平事，风月笙箫坐夜闲。

科举是改变当地学子一生的大事，苏轼作为知州自然也十分重视。鹿鸣宴既是一场庆功宴，同样也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文化意味，可以表现苏轼对徐州考生的重视和对教育工作的支持。苏轼还曾写《徐州鹿鸣宴赋诗序》来描述鹿鸣宴赋诗的盛况：“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觞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苏轼在赋中不住强调此举是“修旧事也”，并用扬雄和钟仪的事迹来说明作诗赋的重要性，借此来展现自己对王安石新政的讽刺不满和对诗赋的支持：“扬雄虽侮于少作，钟仪敢废于南音？贻诸故人，必不我诮也。”(《徐州鹿鸣宴赋诗序》)<sup>[1]1004</sup>

苏轼组织黄楼集会时主动承担了文坛领袖的责任，他不仅赋诗作文来纪念这件盛事，还主动提携后辈的秦观、陈师道等人，邀请他

们一同作已不被科举重视的诗赋，并找工匠刻石以记录这些文章。因此黄楼不仅成为苏轼在徐州的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成为了苏轼与友人往来的象征。苏辙当时在应天府做签判，离兄长并不远，虽然不能亲自到场参加集会，也及时地将自己所作的《黄楼赋》送到了徐州。苏轼看到后十分满意，本来“始余之为记”，因为苏辙的赋“尽其略矣”，于是便“乃刻诸石”。(《书子由黄楼赋后》)<sup>[1]7394</sup> 陈师道本是徐州人，当时没有官职，只得“以民事太守”，苏轼却经常与他“间见如客”，同时邀请他参加黄楼集会并作《黄楼铭》。秦观于元丰元年（1078）四月自徐州赴汴京应举，苏轼当时便有作《次韵秦观秀才见赠》一诗作为鼓励，并用“故人座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次韵秦观秀才见赠……》)<sup>[1]1726</sup> 的诗句对秦观进行了高度的赞扬。黄楼集会之时苏轼亦邀请秦观作《黄楼赋》，秦观此赋带有明显的模仿屈原《离骚》、王粲《登楼赋》等作品的影子，苏轼作《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一诗作为回应，并在其中形容其“中有屈宋姿”。(《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sup>[1]1808</sup> 同年十二月秦观乡试不中，苏轼又作了三首《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用“秦郎文字固超然”等诗句称赞他的文才，同时还用“回看世上无伯乐”(《次韵参寥师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sup>[1]1889</sup> 的话语来劝慰秦观不要气馁，只需安心等待赏识之人的到来。

黄楼集会之后，苏轼将一众好友的诗赋、书法、绘画等作品装饰其中，使得其更具文化气息。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有记载一件趣事：“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学公书，得其仿佛。公尝书《黄楼赋》未毕，盼窃效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也。今碑中四字盼之书也。”<sup>[10]</sup> 正是由于苏轼对黄楼投入了许多的感情，黄楼也变成了他在徐州的文化休闲娱乐场地，他在《百步洪二首并序》(其二)一诗中便有“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纤女初斜河”<sup>[2]1864</sup> 的诗句，用以描述自己高居黄楼之上赏月的情景。苏轼对于徐州的山水景色十分喜爱，他在其中游览之时既有“冈头醉倒石作

床，仰看白云天茫茫”（《登云龙山》）<sup>[2]1826</sup>的豪迈之姿，也目睹了“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放鹤亭记》）<sup>[1]1136</sup>的千奇变换。黄楼高居城门之上，登临便可俯览徐州城的全貌，远眺更可将徐州四周环绕的山水尽收眼底，如其在《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sup>[2]1854</sup>一诗中所描述的一样：

中秋天气未应殊，不用红纱照座隅。  
山下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图。  
未成短棹还三峡，已约轻舟泛五湖。  
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其中知密州两年，知徐州一年零十一个月，知湖州仅九十八天。宋朝为防止类似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而任用文臣做地方官，州级行政单位的具体事务由朝廷另外派遣的京官带原衔权且代理，称为“权知某州”，简称“知某州事”或“知州”。这种任命属于临时差遣，官员在地方待的时间不会很长，因此苏轼在徐州任知州的一年零十一个月已经属于比较长的任期。苏轼在机缘巧合之下到徐州任职，本来是心有不满的，上任之后不久又恰逢洪水和旱灾，他的公务较之人生中其他时期更为繁重，所取得的政绩也更为显赫，再加上苏轼还未因言获罪，他的一些诗文带有极强的政治讽喻色彩，这些便是苏轼此时文学作品中的“徐州特色”。黄楼是苏轼在徐州所修建的代表性建筑物，围绕着黄楼苏轼主持了著名的黄楼集会，并在之后经常游览，创作了一批有关黄楼的诗文作品，展露出他此刻所具有的抗洪成功之后的感慨、对徐州军民的关心、对后辈的提携、对政治现状的讽喻、对徐州山水的喜爱等独特创作心态。

苏轼在徐州度过了人生前期里最为繁忙的一年零十一月，他在这里抗洪救旱、开采煤炭、兴修水利，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绩，其中犹以抵抗洪水、修建黄楼最为显著。洪水退去的一年之后黄楼建成，同年九月庚辰正值重阳佳节，此时的苏轼刚刚年过四十，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上升期和文学成就的积累期，还未曾经历“乌台诗案”迫害的他注视着在其治理下重焕生机的徐州城欣慰异常，主动承担起了文坛领袖的责任，组织了著名的黄楼集会，邀请苏

辙、秦观、陈师道、王巩、舒焕等人赋诗作文，并将其作品装饰在黄楼四周，使得黄楼成为了徐州著名的文化景观和苏轼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在黄楼集会和之后一些文学活动中，苏轼既有登高赏月的休闲之作，也有鹿鸣宴之上的应酬之作，还有呼朋唤友的娱乐之作，这些作品大多都围绕着黄楼进行，表现出了苏轼此时独特的创作心态。正如苏辙《黄楼赋》里面记载的那样，苏轼在经历了洪灾和旱灾之后，再次登临黄楼远眺徐州大好河山，引起了苏轼对抗洪时的艰辛处境的无限追忆，表现出人生如梦、沧海桑田的感慨。同时作为徐州的地方行政长官及当时的文坛领袖，苏轼在这些诗文中还流露出对徐州百姓的关怀以及对后生晚辈的提携，还有借诗赋的体裁对王安石的新政表达了不满，这些心态都在苏轼因言获罪之后很难见到。

### 注释

- [1]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3] 梅琼林《论屈赋文学的指向性功能及其生成的潜在文化背景》，《江汉论坛》1998年第3期。
- [4] 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 [5]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6] 朱刚著《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7]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
- [8] 脱脱等《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 [9]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82年版。
- [10] 张邦基《墨庄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宋定坤，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 论苏轼《徐州上皇帝书》

周 方

**内容提要**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以治盗之策为主题展开议论，擘画了治盗策略，精于理，适于用，体现了苏轼本于人情的治政思想。文章气势纵横，结构参差，诵说古今，笔意深入高远。

**关键词** 苏轼 《徐州上皇帝书》 治盗

在苏轼的 170 余篇奏议中，有 4 篇上皇帝书。分别是作于治平元年的上英宗书，作于熙宁四年的两上神宗皇帝书，作于元丰元年的徐州上皇帝书。三篇上神宗皇帝书中，熙宁四年前后两篇是总论治国之道以及对新法的认识，作于徐州的上皇帝书则是以“治盗”为主题的。此篇紧承熙宁七年十一月在密州所作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两篇相缀，既阐明了治盗的具体做法，也表述了为政思想。细读奏章，从苏轼的治盗方略看进去，可感知到苏轼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

## 一、治盗之策：守备、化解、拔擢

盗贼问题是北宋朝廷内政的大患，盗贼一起，往往迅速成群，聚啸山林，扰民生业，甚至攻打官府，形成规模后，有起事之危，直接威胁到最高统治。欧阳修曾在奏议《再论王伦事宜札子》中说：“臣谓夷狄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sup>[1]</sup>可知庆历年间就对盗贼问题有足够重视了。为了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打压盗贼，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开始，在开封府实施“盗贼重法”，英宗、神宗、哲宗朝，盗贼重法实施地域扩大，处罚逐渐加重，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重法不仅对犯重罪的人加重处罚，还圈画了重法地。

《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记载：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充、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

重法，郡县浸亦广矣。<sup>[2]4978</sup>

从盗贼重法的确立我们看到北宋朝廷对武力的恐惧，盗贼重法所规定一人为盗举家发配等措施，以连坐手段试图制止盗贼的产生及危害，这不仅是极不合理的，也是为效甚微的，并未有效遏制多年来的盗贼之祸。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熙宁十年四月)丙申，命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安焘体量京东河北官吏不职事以闻，其官司行遣盗贼违法事，一面施行，如事体稍重，即奏取旨。以两路盗贼颇多，虑州县不能逐捕及施行违法故也。<sup>[3]6892</sup>

五月，安焘根据河北京东等路盗贼情况提出了四条办法<sup>[4]6902</sup>，朝廷依从，而这些办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可能导致变本加厉。朝廷一面想办法安抚民众，一面派官员捕捉盗贼，一面更强调实施重法。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辛未，遣左藏库副使彭孙募胆勇人捕杀廖恩<sup>[5]</sup>……又批：“近日福建路强劫盗贼火数不少，未知窃发作过因依，可速下提刑、转运司火急体量，具析奏闻。如缘缺食，即检详前后救饥条例，一面擘画施行，不使别致结集人众，久为民患。”<sup>[3]6917~6918</sup>

癸未……诏：“南京，郓、兗、曹、徐、齐、濮……洺州之鸡泽、平恩、肥乡县，盗贼并用重法。”<sup>[3]6922</sup>

廖恩被捕获后，元丰元年又有岳州詹遇为祸，直至十一月被全火杀获。事实表明，想用严刑峻法尽快解决盗贼问题并不奏效。在这种情势下，苏轼先是在密州任就上奏《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接着转任重法地徐州长官，心系时政，忧国忧民，细思密虑，写下了上皇帝书，阐述了治盗之策。在前一篇《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苏轼从地理位置的重要起笔，强调了防盗涉及京城安危，然后列举了目前一些议者防盗的态度及办法，“皆未见其益也”<sup>[6]754</sup>，提出了希望实现的政治样态，列举了三条具体

做法。

一是乞免夏税。如果实在不能免税，也只令三等以上人户，以各自方便的方式缴纳，四等以下先暂停。这样做的原因是今岁秋旱，地里种麦不得，如果不免税，人户只能逃移，千里无麦，良民也只能被迫为盗。免夏税的益处就是不致使良民受饿而流离失所，避免了良民为盗。

二是乞特赦两路三百斤以下贩盐小客权免收税，具体规定到处张贴，并明确表示出自圣意，使民众感动。这样做的原因是盐课日增，刑法日峻，告捕日繁，小民愈难兴贩。五六年来，课利越增，盗贼越众。赦免的益处是贫民奔走于重新贩盐，没有机会做盗贼。“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sup>[6]756</sup>

三是乞今后经考问承认贼赃的盗贼不能以初审的结果减等。命令所在地长官估量情势轻重，情况严重的依法定罪。这样做的好处是“凶民稍有畏忌，良民敢于捕告。”<sup>[6]756</sup>

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苏轼提到了在密州时“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sup>[6]758</sup>并详细分析了徐州的地形、民俗、现状并引用史事，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治盗方略。

一是征治户以自卫。具体为每治各选择忠诚可靠有力气的十人，把他们的名字录在官府，给他们发放武器，教给他们击斗方法，每个月在盐官的庭院训练两次，把武器放在官府，等待盗贼侵犯使用，平时不可以取用，违犯命令的要处罚。这样做的效果是治户出人自卫，民众感到心安也欢喜，奸滑的人不敢动谋财的念头。

二是移南京守军于徐，募石工以筑城。具体为把南京新招的两支骑射队伍移到徐州，阐明地理位置很方便转移，将士原来也都是徐州人。再把奉化厢军里的缺员招募足，用来采石加固城墙，几年之后，城墙就会十分坚固。

三是严明军政使逃者减少。具体为储存费用给配送犯人的军士，不许这些有押送任务的军士贷钱。严明军政，禁止喝酒赌博，保证士兵吃饱穿暖，练熟技艺，不思逃窜，避免为盗。

四是慎择守臣使善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以便于使人捕盗。具体为多盗贼之地的守臣要谨慎选派，一旦选任要给以一定的权利，可以在律条之外判断具体情势处置强盗。多赐钱以招人用人来捕盗，如果不能多赐钱，可以每年发一二百千，让当地酿酒，额外给予捕盗者酒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五是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具体为给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的英雄豪杰一条与治声律、谈经义不同的仕进之路。可以选当地人补充一些小职位，选取一些智力胆识都比较强却不能参加科举的人材，依法令他们的上级官员推荐，让其中一些有作为的人可以像任子一样有出仕的机会。

从苏轼的治盗策略和具体做法来看，苏轼并不是简单地从暴力捕获和剪除盗贼本身去思考问题，而是分析盗贼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发展方向，从源头上解决盗贼滋炽的状况。苏轼的诸多做法，不仅堵了贫民为盗之路，又进一步开发了人才仕进之途，使人才不至于把才能用在反面。对可能为盗者化解，对盗贼产生的地界守备，对重法地有才华的人拔擢。思虑周全，做法精细，比起盗贼重法以及安焘提的诸条措施，又易行又合乎人性，体现了苏轼为政重人情的人本主义观念。

## 二、治政之要：本于人情，谈诸事理，谋于深远，行于精微

苏轼的治盗方略以及在徐州的作为及政绩，体现了苏轼的治政思想，要为本乎人情，谈诸事理，谋于高远，行于精微。

苏轼从小读经阅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倡导仁政。他在参加省试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褒赞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的仁政，刑赏之间，见其忠厚。苏轼推崇的仁不是虚妄的表面，而是以人情为重的实际。《刘愬丁鸿孰贤论》开头就指出：

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sup>[6]4~45</sup>

这段话表明苏轼认为的善不是只满足于自己需求的，而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以是否成全别人为善为出发点的，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重“人”是苏轼的主要思想，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又说：

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

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sup>[6]49</sup>

在《魏武帝论》中说：

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sup>[6]82</sup>

因为重“人”，所以苏轼强调为政要想致治必须结人心。在熙宁四年的《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提出三条总论即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sup>[6]729</sup> 结人心放在第一位。在《策略五》中，也谈到“莫若深结天下之心。”<sup>[6]237</sup>

一个处在政治中的人，尤其是封建政体下，他对待广大民众的态度固然可见其是否以民为本，而他对于民众中之为害者，朝廷视为大敌之盗贼的治理方式则更见其人情人性所在。在以人情为本的思想下，推衍事理。谈及盗贼的产生，苏轼认为：

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续欧阳子朋党论》）<sup>[6]129</sup>

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称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sup>[6]134~135</sup>

苏轼认为盗不是生而为盗，这与他对人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扬雄论》中，苏轼总结了孟子、荀子、扬子、韩愈对人性的认识，而概括为“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sup>[6]111</sup>

民众能不能向善而不为恶，政府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怎么治理国家，怎么管理人民，这是北宋每一位士大夫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不过由于政治见解不同导致政治策略、政治手段也不同。即如治盗，在庆历年间富弼、欧阳修都曾上奏提出办法，富弼建议备兵马于要害数州，慎选官吏，多方察访人心等。欧阳修强调盗贼之事可忧可惧，希望尽快定御盗办法颁行天下。时盗贼重法还未确立，大臣们预感到情势不妙，积极建言。熙宁年间，朝廷已将治盗作为重要事项，选派官员考察重法地治盗情况，委命官员捕盗。所命官员提出的办法更容

易制造和激化矛盾。只有元祐六年礼部侍郎范祖禹上哲宗乞除去盗贼重法，建议选好的官吏养民而不是以民为敌。<sup>[7]</sup>

苏轼治盗有术，但术是手段，不是根本。术是在总体设计之下所必须的。苏轼提出：“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而“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然后从事。”（《思治论》）<sup>[6]116</sup>也就是先谋划，而且要使众人达成共识。谋划者，要从事物发生的根源处、从解决问题的高远处着眼，把治政当作一个系统，系统内的人与事是相互关联而非各自为政的。有了总体设计之后，不可以无术。

苏轼的治盗之术由于着眼细致精微而甚为可行。徐州的利国监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苏轼就提出简明具体的自卫防范方案，再加以军队守护，然后采石砌城。外围安稳了，内修军政，禁酒博除息钱。内外都先修正之后，再谈到守臣的选择，以及向朝廷要优惠。最后高屋建瓴，谈到用人问题。因为涉及到宋朝的国策，所以谨慎出言，不便详述。宋朝以士大夫治政，非考试非荐举非任子是很少能入仕为官的，而苏轼却出此建议，这与其父思想有一致性，苏洵在《广士》篇中讲到“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sup>[8]157</sup>而苏轼又提出了操作方法，确实是选人用人思路的大胆开拓。

苏轼在密州、徐州之际，做了很多实事，徐州治水与民同战而胜，而治盗之事也令轼劳心，上奏之外，在其书信中也有提及。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提到“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特好强劲，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变敛迹。”<sup>[6]1398</sup>被贬黄州后，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中还讲述徐州捕盗的事情，并托章惇帮助完成捕盗之未尽事宜。

所以念念不忘，盖因其忧国忧民之情怀，本于人情治理政务之识见。

### 三、治文之法：以史事为经，以地况为纬，纵横论议

苏轼贬黄州前在神宗朝所上奏议共七篇。与元祐年间渐登高位因职责所在参与政务之必须上奏议事相比，熙宁年间的奏议是本着爱国爱民忠君治世的政治热情上奏论政的。从写

法来看，均侧重于议论，即便是《乞医疗病囚状》这样具体解决问题的申请，也是将来龙去脉叙述清楚，用笔铺排，从对律条的指析到提出解决办法，气脉流畅。总观这七篇奏议，可知是一个政治上还未受到打击，对朝政还抱有十足热情与自信的士大夫所具有的状态。因此，即便是以治盗之术为主要内容的《徐州上皇帝书》，也是纵横论议，拈引前朝史事，分析地域民情，文末虽有“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sup>[6]762</sup>之语，仍不妨碍整篇奏议所表露的流畅之气与自信之情。

历代文章家有不少评论此篇奏议的，仅录几则如下：

明茅坤“此等文字，识见笔力，并入西汉。”<sup>[9]2996</sup>

南宋楼昉“思虑精密，利害周尽，肝胆呈露而笔力亦随之。决江河而注之海，未足以喻其势也。”<sup>[9]2976</sup>

清浦起龙“弭盜是一篇大旨。地势民风，通盘会算。文凡四转关，前见近虑，后见远略，周密而宏大。苏家文大抵多纵横习气，独此朴老坚实。茅氏称其识力入西京，不诬也。”<sup>[9]2997</sup>

评论都提到了此奏的文势、笔力，颇有政论文的特点。苏轼受其父影响，从小关心时事，读史议政。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sup>[10]1421</sup>

此文首先从地理位置谈起，从地形地势、城外护城河、城内屯兵的视角，谋划了战守之策。然后从地理谈到民情，并举出历史人物以表达对此地此民易于起事发乱的担忧。沿着地图到了州东北利国监，这是盗贼窥视的地方，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可是护卫很少，如不严防，就有可能重复历史，此处又举出历史人物来证实。地势民情之危险尽述之后，回到时事，治户因河北禁入利国监铁北行，治户有失业之忧，多次告官诉说，作为一州长官，必须治州安民，建立人防、巩固城防使利国监摆脱危险，保证徐州安全，解除京东之忧。论及此，忽然荡开一笔，写到沂州地势，也是徐州盗贼一大屏障，且沂州徐州可成呼应之势，苏轼自荐三年守徐并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并谋划了治军政的策略。至此，真觉得是一位领兵作战的将军在依地据形部署军事。

宋朝重文治，抑制武力也抑制武将，因此文人治军领兵并不鲜见也多有成效。苏轼贵在

不仅可以文论兵，更能在实践中证明其策略方法的行之有效。防盗是一端，在地方时，治水、赈灾，在定州任上开弓箭社训民兵都是强有力的事实。文章接下来以汉相王嘉之言提及郡守之威权日渐衰微，希望陛下稍稍加重一些地方长官的权限，当然前提是在重法地要谨慎选择守臣，最好能额外赏赐些钱用来捕盗。

以上论述，层层递进，越论所触及的话题越深，结构的精心编排为的是内容的合理展开。话题逐渐深入，从地势、民情、部署、守臣到用人，并举出多位古人为证，希望当朝效法前朝用人之法。最后，举出晋武年间事，阐明自己上奏议论的原因，“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徐州上皇帝书》）<sup>[6]762</sup>表达了一个士子文臣忧国思政的忠君之心。

文章经纬交织，文势纵横，议论剀切，行文层次清晰，表达逐级深入。多用史事，例举古人，把一篇论治盗之术的奏议写得充实有料，文气流畅，于宏大处见精致，这与苏轼一贯采用的为文之法是吻合的。苏轼崇尚为文的自然之势，在与《与谢民师推官书》中就提到作文须“文理自然，姿态横生”<sup>[6]1418</sup>，而在奏议中能运用此法的仅有几篇，应得之于苏轼未被陷受贬之前，心里还存着从政的热情与希望，笔下便流动出治政的信心与决心。

## 注释

- [1] 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九  
九《奏议集》卷二，巴蜀书社2017年版。
- [2]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 [3]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 [4] 四事为：一、强盜虽杀人，为首者能捕斩死罪两人、为从者捕斩一人以上，并原罪给赏；二、告获强盜，各依重法地酬赏外，第加一等；三、大名府，滨、棣、德州贼盜，如被告获，依重法处断，不用格改法；四、强盜如不自陈首，遇将来郊赦，未得原免，并具情理奏裁。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
- [5] 廖恩：福建路盜贼。
- [6]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7] 《宋朝诸臣奏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8] 舒大刚、曾枣庄主编《三苏全书》第6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 [9]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周方，太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陈师道与秦观徐州集会交游考

龙飞宇 杨 媛

**内容提要**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记载了他与秦观元丰年间的三次交游，但因文字含糊不明，使在徐州时两人交游与否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本文以苏辙行迹为材料，认定徐州交游发生于元丰元年，郑蹇先生“熙宁十年说”因含混熙宁十年陈师道兄弟与苏轼兄弟，以及元丰元年秦观与苏轼两次交游而致误。据考，后山外集《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系元丰元年作，这成为两人在徐州时确有交游的直接证据，傅尧俞识交后山事件也为此提供佐证。陈师道与秦观在徐州的交游成为他们在元丰间一系列交游的序曲与渊源。

**关键词** 陈师道 秦观 徐州 交游

宋刻本《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六中录有《秦少游字序》，该文记载了陈师道与秦观元丰年间在徐州、广陵与东都三次或有可能的交游经历，往往被认为是佐证陈、秦交游经历的不刊之论。但是，陈师道《秦少游字序》中关于徐州集会时两人交游的文字表述并不清楚，且后山当时诗作也因焚毁而于今难辨，致使后人产生“此段语意，含糊不明”<sup>[1]47</sup>的疑惑，徐州集会事件因此成为一桩悬案，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合理解答。

若重新审视这桩悬置已久的历史公案，通过后山外集《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系年的重订与傅尧俞借秦观识交陈师道事件的反思等，两人的徐州交游或可重新检讨，现谨将这些不成熟的看法付诸笔墨，不揣谫陋，以就教于方家。

## 一、徐州集会时陈师道与秦观参与时间考

实

为了直观地展露问题及后文述说的方便，兹节录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如下：

熙宁元丰之间，眉山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扬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其时余病卧里中，闻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论说伟辩，坐者属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为杰士。是后数岁，从吴归，见于广陵逆旅之家，夜半语未卒，别去，余亦以谓当建侯万里外也。元丰之末，余客东都，秦子从东来，别数岁矣，其容充然，其口隐然。<sup>[2] 5页 A—B面</sup>

根据“见于广陵逆旅之家”与“其容充然，其口隐然”之说，陈师道与秦观的广陵交游与东都交游，都有非常明确的会面、交谈记录。与之相较，有关徐州交游的言语显得甚为模糊，近人郑蹇先生首先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此段语意，含糊不明，似曾晤秦于东坡座上，又似以病卧之故，仅闻其名而未曾相见；后山文字每犯此病，含糊不明，乃过求简古之故”<sup>[1]47</sup>，这样复杂的情况让郑氏最终也无法有所定夺，只好结合陈兆鼎先生“识交秦观”之说<sup>[3]3342</sup>，下以“细阅仍以会晤可能性为多”<sup>[1]47</sup>之设想。

郑氏之后，许多陈师道研究的学者都参与到此一问题的讨论中，范月娇先生《陈师道及其诗研究》继郑氏之后倡明此见，将两人徐州交游的时间确定在熙宁十年并声称两人确有交游<sup>[4]</sup>；马东瑶先生《苏门六君子研究》等研究将二者与苏轼明确分开来谈<sup>[5]207~208</sup>，曾

枣庄先生《陈师道师承关系辩》等研究完全指明了“如师弟子”是秦观与苏轼之间的关系<sup>[6]69~75</sup>，他们虽多不置确论，但在我看来，几位先生即使不偏向于陈师道与秦观在徐州时未曾交游，也应当是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将此问题彻底解决；近几年来，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大胆地为陈、秦徐州未曾交游之说张目<sup>[7]</sup>。这种众说纷纭的态势持续了接近三十年，徐州集会时陈师道与秦观到底是否有过交游，前人学者们依旧各执一词。若想真正探知徐州集会时陈师道与秦观的交游状况，有理由从文献切入，推究其终始原由。

关于徐州集会事件发生的时间，学界已有多说。范月娇先生倡明熙宁十年说，指出“师道始识秦观是在熙宁十年，这年师道在徐州守制家居，轼自密州移知徐州，辙亦来徐，师道三兄弟相协往谒二苏，适秦观与释道潜亦来徐谒苏，师道遂与秦观相识”<sup>[4]</sup>，其实是参正郑騫先生《陈后山年谱》后推导出的结论，杨晓乐先生称“秦观同陈师道相识在熙宁十年”<sup>[8]</sup>，就直接沿袭了范氏与《郑谱》之说，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足见“熙宁十年说”拥趸颇多，影响极大。

然而细推可知，陈、秦交游熙宁十年说实则并不成立。在此，首先需要对徐州集会的时间作出辨证。按《三苏年谱简编》：“十年四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留百余日”、“元丰二年三月以苏轼知湖州”<sup>[9]70~71</sup>；《东坡纪年录》：“十年十二月，移知徐州，五月，到徐州”、“元丰二年二月，移知湖州，别徐州”<sup>[3]2832~2835</sup>。据此可知，苏轼就任徐州应在熙宁十年四五月间，离开徐州当在元丰二年二三月间，因为徐州文人集会本身是由苏轼知徐而引发的当时文人群体自发形成的一次大规模集会活动，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以苏轼、黄庭坚为中心的元祐文人大规模建交的序曲。所以，广义的徐州交游集会时间应当于苏轼熙宁十年四五月间来知徐州起，至元丰二年二三月间苏轼移湖离徐为终，总时长接近两年。而狭义的徐州交游集会，必然是指苏轼、陈师道与秦观三人同处徐州并相互交往的较短的一段时间。因此，尚需考察陈师道与秦观的行迹。

据今所见材料，陈师道在徐州文人集会的

参与程度并不算高，他明确参与的只有黄楼集会一次。但若究其行年，则熙宁九年陈师道父卒，他扶柩归徐并在随后三年内守制家居<sup>[1]47~55</sup>，按理推知，徐州文人集会期间陈师道应当全程身居徐州，而他并没有很积极地融入徐州集会中，或因其父初丧不易燕游玩乐，也或是其自言“其时余病卧里中”的身体状况所致。

这样，秦观的行迹就成为了关键。而在前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两种观点：其一正是前文所提范氏与《郑谱》之见，主张熙宁十年秦观已至徐州并在该年与参寥同见苏轼，且与陈师道结识；其二则是徐培均先生主张的秦观抵达徐州为元丰元年四月，没有多做停留便“至云龙山访张天骥”<sup>[10]</sup>。这两种观点的论争主要在陈师道《送参寥序》所称：“元符之冬，去鲁还吴，道徐而来见余，与之别余二十年，复见于此”<sup>[2]13页A面</sup>。郑騫先生认为“自元符元年上溯至熙宁十年为二十一年，故云‘余二十年’，若相识始于元丰元年，则仅二十年，不得云‘余’”<sup>[1]47~51</sup>，这一论断虽无从驳斥，但参寥本集诗的系年与《苏诗总案》对参寥来徐的判断同样确凿，徐培均先生因此将其定在元丰元年。

若要审视陈师道“余二十年”的说法，其实同《秦少游自序》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一次后山文字“含糊不明，乃过求简古之故”所引起的难解之惑。所谓“余二十年”，虽可如郑氏之见断言为二十多年，然而也难排除后山本人想要表达距今（即元符元年）已经“余下”二十年的意味，“余”不作“多余”解，那么二十年后则正是元丰元年。参寥本集诗与《苏诗总案》的材料相对确凿，但亦不能凭此孤证断下结论。或许需为秦观来徐的具体时间再寻佐证，苏辙的行迹恰好成为了一则绝佳的论据。

遍考与秦观过徐相关的诸多文献，《秦观年谱》称：“夏四月，将入京应举，途中访苏轼于徐州”<sup>[10]1647</sup>；《秦少游字序》称：“眉山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扬秦子过焉，丰醴备乐，如师弟子”<sup>[2]5~6</sup>；《次韵秦观秀才携李公择书相访》诗自注称：“秦君与家兄子瞻约秋后再游彭城”<sup>[11]177~178</sup>。这些

材料都明确提及，此次秦观过徐，与他相交的只是“苏公”本人，并无任何另外的人参涉其中。但范月娇先生却声称：“轼自密州移知徐州，辙亦来徐，师道三兄弟相协往谒二苏，适秦观与释道潜亦来徐谒苏，师道遂与秦观相识”，范氏认定，苏轼与秦观寥及苏轼与师道三兄弟的会面是同一次会面，根据师道三兄弟来谒见苏轼明确可考在熙宁十年而推论，那么秦观与陈师道相会自然是熙宁十年。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苏轼与苏辙初负声名时，已经出现了时人并称两人为“二苏公”的现象，《后山集》中就有《赠二苏公》诗，《南涧甲乙稿》中也有“与眉山二苏公为文字交”的说法。然而上述文献中，皆称与秦观的相交相识的是“苏公”而非“二苏公”，是“苏轼”而非“苏轼兄弟”，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疑点。并且，苏辙《答徐州陈师仲书》称：“去年，辙从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来见”<sup>[11]490</sup>，也并未提及当时“以客来见”者包括秦观参寥在内。根据《苏辙年谱》可知，苏辙四月抵达徐州后，随苏轼在当地游览名胜，直到该年八九月间才别赴南京<sup>[12]48~49</sup>，倘若秦观是时已身在徐州，两人的交游必不会止于一次三方的会面那么简单，因为在随后的经历中，已经明确可以看到：元丰三年苏辙秦观在高邮相逢，按秦观之说不过“相从二日”<sup>[10]1011</sup>，但已有“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污交朋”<sup>[11]215</sup>这样难舍难断的深厚情谊，苏辙期间所作《扬州五咏》<sup>[11]214~216</sup>，秦观《淮海集》中均有和诗<sup>[10]329~335</sup>，倘若两人真在徐州曾经有过会面，则二人无任何交游迹象，甚至在书信中都只言未提对方，如此大的反差实在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因此，有理由推断：苏辙与秦观在徐州并未相见。苏辙送苏轼前往徐州赴任后“留百余日”后“赴南京签判任”<sup>[9]70</sup>，这段时间内秦观并没有抵达徐州，而陈师道三兄弟前来谒见二苏兄弟，因此苏辙有《答徐州陈师仲书》中“以客来见”的说法，在苏辙离开后，元丰元年四月，秦观来到徐州并对苏轼“执师弟子礼”。也就是说，陈师道三兄弟与苏辙、苏轼会面发生在熙宁十年，秦观与苏轼的会面发生在元丰元年，这是两次毫不相关的交游事件，

只因都发生在广义的徐州集会期间内，郑骞先生与范月娇先生便将它们含混成一次交游，反而自己产生了困惑，于是索性称“《苏诗总案》之说，并无确证，故改系于本年（熙宁十年）”。这则翻案实际上立不住跟脚，正是因为苏辙在徐州时只会见了来谒的师道三兄弟却没有会见秦观、参寥，郑谱与范氏将两次交游含混为一次而致误，通过对苏辙行迹的把握，可以为《苏诗总案》的观点提供确证。

这样的话，郑谱与范氏主张的熙宁十年陈师道兄弟、苏轼兄弟、参寥与秦观的三方会面应当并不成立。秦观来徐的时间应当是徐培均先生所考之元丰元年四五月间，随后便因访张天骥而离开徐州集会的主会场。在这场持续了接近两年的徐州文人大型集会活动中，陈师道、秦观与苏轼三人共同参与的，大概只是元丰元年四五月间这段时间罢了。

## 二、陈师道《湖上野步》系年重订

通过上文的考辨，陈师道与秦观徐州交游的熙宁十年说并不成立，即使两人此时确有交游，那也势必发生在元丰元年。但依旧很难判断元丰元年时陈师道究竟是“曾晤（秦观于）东坡座上”还是“卧病仅闻其名”，任注后山诗因陈师道自焚少作的缘故无当时之作，但后山外集有《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关于其系年，学界已有元丰二年、元丰三年等多说，此诗之中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值得我们对其系年、本事加以考证。

兹录此诗如下：

晓风疏日乍相亲，黯黯轻寒拂拂春。  
触目渐随红蕊乱，经年不见绿条新。  
宁论白黑人间世，懒复雌黄纸上尘。  
十里松阴穷野步，暂时留得自由身。<sup>[13]548</sup>

陈师道于诗题称“秦太虚”而不称“秦少游”，可知当时秦观应尚未从“太虚”改字“少游”。虽然古人改字之后，朋友间有因习惯、喜好等原因依旧称原字的现象，但秦观借改字“以识吾过”，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悔意识，体现出他对前半生功过的总结与反思，作为秦观友朋的陈师道不会不清楚，他断不可能在秦观明确改字“少游”之后再称秦观原字“太虚”。

这样，再结合陈师道《秦少游字序》<sup>[14]</sup>与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sup>[15]</sup>易知，秦观改字应当发生在陈师道与秦观广陵交游与东都交游之间，换言之，陈师道《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之创作时间，必定在元丰八年陈、秦东都交游之前。

因《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出自后山外集，故而任渊不注，最直接的参考材料是近人冒广生所作之笺，冒笺将其系于元丰二年并断定秦观原诗为《游鉴湖》<sup>[13]338</sup>，实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讹误，因为秦观《游鉴湖》诗作于他与苏轼、参寥同游惠山之时，苏轼《游惠山》诗前序明确声称：“既去五年，复为湖州，与高邮秦太虚、杭僧参寥同至览唐处士王武陵、窦群、朱宿所赋诗，爱其语清简，萧然有出尘之姿，追用其韵，各赋三首”<sup>[16]944</sup>，很显然，陈师道并未参与此次活动，而元丰二年陈、秦之间也绝没有另外会面的可能。

此外，另一说为元丰三年说，根据持此观点的学者的论断，他们多认为“广陵交游”作于元丰三年，而此诗作于“广陵交游”之时。

“广陵交游”究竟发生在何年，必须予以解决。

若不嫌繁琐，先列诸前人学者观点如下：

其一，广陵交游发生于元丰三年春。因为秦观于元丰三年自会稽还家，常游览扬州名胜，与“从吴归，见于广陵逆旅之家”的描述基本吻合<sup>[17]</sup>。

其二，广陵交游发生于元丰四年九月之后。这主要是基于陈师道所自称的“元丰四年，予游吴过秀……其秋八月，就舍钱塘”，结合“从吴归”之说，应当在当年九月或之后一段时间<sup>[7]</sup>。

其三，广陵交游发生于元丰五年二月或夏秋间。这一年內，一方面是陈师道自杭北归，途径扬州，另一方面是秦观自家往京应考，落第后再归家，有两次途径扬州的机会。陈、秦广陵交游若发生在这一年內，或可能是在秦观应考前之二月，或可能是在秦观落第后之夏秋间<sup>[1]57~58</sup>。这种观点是学界较为主流的看法。

三种观点中，以第二种观点根基最不稳固，根据《宋史·地理志》易于推知，虽然因秀州与钱塘均属两浙路，皆南于广陵<sup>[18]</sup>，自秀州至钱塘途经广陵而返乡（徐州）的活动路

径虽然在地理上大致可信，但他们大抵没有将《思白堂记》理解通透，因为后山在该文的结尾明确地说：

明年而余北归，又明年而为之记。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两候否？  
〔2〕4页A面

既然陈师道在《思白堂记》中称其元丰四年秋八月就舍钱塘，那他北归的时间应当是在元丰五年，作《思白堂记》的时间应当是元丰六年，既然元丰四年陈师道尚在钱塘而非路过扬州，那么显然陈师道与秦观绝不会相逢。

排除元丰四年之说后，剩下元丰三年与元丰五年之说，根据《陈后山年谱》、《淮海先生年谱》等材料，可以先对此陈师道与秦观在这两段时间的动态简述一二：大致说来，元丰三年时陈师道初婚娶，生活颇为安稳。而秦观则经历着漫游吴中与交结往来友人的一段快乐时光。总的说来，元丰三年两人的生活皆较舒缓，行程也不甚紧张。而元丰五年则不同。秦观匆匆进京应礼部试，并在其中铩羽而归，陈师道因白衣也“未尝一至贵人之门”，一度处于进身无门、一官难求的尴尬境地。

有基于此，陈、秦广陵交游元丰三年的系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秦少游字序》中明确声称：“夜半语未卒，别去，余亦以谓当建侯万里外也。”试问若广陵交游发生在元丰三年，且不说刚刚婚娶并生儿育女的陈师道为何不居家中照顾妻儿而莫名其妙地前往遥远的广陵，悠闲地漫游吴中的秦观若巧合地与陈师道异地相遇，怎么会“语未卒”就别去？并且秦观当时漫游的心态，如何也与“建侯万里外”搭不上任何关系。

如果广陵交游本身发生在元丰五年，一切都变得合理有据：元丰五年夏秋间，秦观落第归家，陈师道自杭北归，他们在广陵相遇，因秦观落第悲伤而陈师道急于北归，匆忙的两人就此夜半别去，而“余谓当建侯万里外”之言，乃是陈师道得知秦观落第之后的安慰、劝勉之语。进一步，将秦观元丰五年落第后之诗文详加考订，可以将郑谱中所称“夏秋间”进一步地精确，按秦观《谢曾子开书》<sup>[10]1201</sup>中称曾肇为“史院学士阁下”，而曾肇为国史院编修是该年八月事并在九月丁母忧而推论，秦观抵达广陵应当是元丰五年九月左右。而郑骞先生

谱中另提之“二月说”其实并不可信，即使在情感上，“余谓当建侯万里外”这样的说法可以被理解为陈师道对秦观应试前的激励之语，但稍加结合现实情况，这种说法就显得非常不妥当。据《思白堂记》可知，陈师道“自杭北归”的路线是自钱塘至开封，秦观的路线是自高邮至开封，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因为高邮在广陵之北，秦观的北上路线并不经过广陵，他们是不可能在广陵会面的。即使假设秦观北上的路线曲折迂绕，途中经过了广陵并与陈师道成功会面，那么既然两人的目的地同样是开封，为何在一次会面之后要匆匆分别而分开前行呢？在郑谱二月说与夏秋间说的基础上，只要进一步考订便可知，广陵交游正发生于元丰五年九月。

综上所述，在郑骞先生的观点上继续推论，可考证广陵交游的发生时间是元丰五年九月，“元丰二年说”与“元丰三年说”皆不成立。如前所述，若本诗必作于元丰八年秦观改字之前，那么参考陈、秦两人元丰年间的行迹与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基本可以认定陈师道《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这首诗，若不作于元丰五年九月广陵交游时，就必作于元丰元年徐州集会时。基于以下两点，这首诗应不作于元丰五年：

其一，节气不符。根据陈诗之中“黯黯轻寒拂拂春”、“经年不见绿条新”之语，此诗应当作于晚冬初春之间。可据前文考证，陈、秦广陵交游应当在元丰五年九月间，陈师道又怎么会在深秋九月之时描绘初春时节的风景呢？

其二，时间不符。陈师道与秦观湖上野步，并声称“十里松阴穷野步”，显然两人经历了较长一段同处的时间并且相处时并不匆忙，这就与陈师道《秦少游字序》中所描绘“夜半语未卒，别去”的匆忙产生矛盾。

时令与时间的问题若在元丰元年徐州集会时，则完全讲得通：

《秦观年谱》中称：“元丰元年夏四月，将入京应举，途中访苏轼于徐州”<sup>[10]1647</sup>，秦观该年抵达徐州时间为当年四五月间，正与陈诗中“黯黯轻寒拂拂春”所描写的节气相合。并且秦观显然是在徐州有过短暂一段时间的

停留，那么两人同处并野步也是全然有可能的。秦观因入京应举而过徐州，而陈诗中“暂时留得自由身”的寄语，与秦观将要应举的心态与处境更是全然暗合。基本就可以确定，陈师道《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应是作于元丰元年徐州集会时，因此，陈师道与秦观在徐州势必曾有交游。本诗即是此次交游的重要标志与直接佐证。

这样，陈师道与秦观徐州交游这桩悬置已久的历史公案就此得到了它应有的审定：陈师道与秦观元丰元年同处徐州时确曾有过交游，后山外集诗《和秦太虚湖上野步》就作于当时。前人学者们带有推测、猜想口吻的假设与因文献材料不足以佐证所产生的怀疑，在上文的考证推论中得到了解释与回答。

### 三、重论傅、章“识交后山”的发生与陈、秦之关系

《和秦太虚湖上野步》诗系年的重订是确定陈师道与秦观徐州交游情况非常有力的材料，但若只依据这一则材料，便径将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直接盖棺定论，未免失之偏颇。在后山本集诗内证之外，尚有一些其它的外部材料或可佐证两人在徐州集会时有所交往，并且，前人研究中对徐州集会时陈、秦交往的质疑，其观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漏洞，此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些问题。

陈师道与秦观“徐州交游”的背后之所以疑窦重重，其实是关乎于文献材料的弊病，即陈师道自言之“焚毁少作”：

仆于诗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

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sup>[2]9页B面</sup>

据余嘉锡先生考证，陈师道初见黄庭坚在元丰七年<sup>[19]1375~1399</sup>，后山元丰七年前之“少作”几乎全被焚毁。也就是说，在《秦少游字序》文字含糊不明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集会时之诗作予以参考。当直接涉事的陈师道、秦观与苏轼三人诗文集中皆不见当时陈、秦交游唱和的迹象时，不妨将问题进行转化：陈师道与秦观的第一次交游发生在何时？

且将“徐州交游”按下不论，陈师道与秦观之间的第一次交游应当至晚不会晚于《秦少

游字序》中所称之“广陵交游”，根据前文中的考证，即元丰五年九月。

按照陈师道“见于广陵逆旅之家，夜半语未卒，别去”的说法，两人在广陵的交游应该是时间非常短促、情感并不亲密的。同时，广陵交游的性质与徐州集会大规模的文人集会全然不同，虽不排除两人身边可能有陪伴侍从并将此事广而告之的可能，但广陵交游毕竟是一次相对而言非常私人化的交游，如果广陵交游确实是陈师道与秦观第一次交游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在陈师道《秦少游字序》问世，或陈师道与秦观下一次公开会面之前，除了陈、秦二人，以及两人亲密的仆从友朋外，其它人断不会知晓两人有过亲密交往。换言之，若有陈师道与秦观之外的人在《秦少游字序》问世之前知晓两人的关系，那么广陵交游是陈师道与秦观第一次交游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就很值得质疑。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详细记载的随后一次的东都会面发生于元丰八年，而陈师道《秦少游字序》的写作时间则是“元祐元年二月一日”<sup>[2]6页B面</sup>。可是在郑骞先生《陈后山年谱》元丰七年的记载中，分明可见以下一则行年：

傅尧俞闻师道名，请秦观为介，先来见，师道答拜，是为二人相识之始。傅年长于师道二十八岁。<sup>[1]64~65</sup>

郑骞先生根据陈师道《谢傅监》诗与邹浩《送郭照赴徐州司礼序》文两则材料，推算傅尧俞求见陈师道事在元丰七年，是基本可信的。这样，元丰八年之前就有傅尧俞早知陈、秦之间的关系，并因欲见后山而请秦观作媒引荐。而傅尧俞显然算不上陈、秦亲密的友朋仆从。设若陈、秦此前只在广陵有过一次私人会面，那么傅尧俞何以会有意识的从秦观来结识陈师道呢？

之前学界往往以傅尧俞识交秦观事件来推论陈师道与秦观之间的亲密关系，如范月娇《陈师道及其诗研究》：“元丰七八年间，傅尧俞、章惇欲识师道都先通过秦观，后来李之仪、邹浩亦托秦观向师道致意，可见秦观对师道的为人处世相当清楚，交情亦甚深厚”<sup>[4]110</sup>，此一观点非有不合理之嫌，但若循此脉络向前摸索，一次“夜半语未卒”的交游，就能让陈、

秦之间亲密的友情天下皆知，实在未免太荒谬了。这则论据虽不能直接指向徐州集会时两人有过交游，但或可为陈、秦确有徐州交游的观点提供更多证据。

当然，对于学界之前的观点，理应予以响应。关于徐州集会事件，学界素有交游于熙宁十年说与未曾交游两说，本文对郑谱范氏熙宁十年说的商榷可见于上文，在此还需再与陈、秦徐州未曾交游说产生对话。

持论陈、秦未曾在徐州有过交游的学者们的论据，以管窥之，大抵是以下几种：

其一，陈师道在《秦少游字序》中自言“其时余病卧里中，闻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论说伟辩，坐者属耳”<sup>[2]5页A-B面</sup>，陈师道在徐州集会的关键时期（元丰元年）应当是“卧病里中”，因此他在此期间的参与程度并不太高，未与此期间内过往徐州的文人交游确实合情合理，故而他自言“闻其行道雍容”而非“见其行道雍容”，语意似有明确的暗示。

其二，陈师道对徐州集会时秦观的全部表述都来自于他人评价的转述，若他们二人之间发生过确切的交游，当不至于如此。且《后山集》与《淮海集》中皆不见当时互相提及之语。陈师道卧病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已不可知，但徐州集会系列事件中他明确参加的只有黄楼集会一次<sup>[2]1页A面</sup>，而此时秦观恰恰已离开徐州了。

其三，《秦观年谱》称：“在徐，陈师道始知先生”<sup>[10]1647</sup>，与同期相交其它诸人<sup>[10]1647</sup>完全不同。这里明确的将徐州集会时陈、秦之关系做出了界定，或可说：秦观在徐州与苏轼、苏辙、张天骥等文人进行了直接的交游与访问，而陈师道则只是知道有高邮秦观其人而已。

其四，《秦少游字序》称“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虽“疑之”主语是世人，与陈师道并无关联。但设若陈、秦确实会面，为什么陈师道还要“疑之”，而不是在知悉这种矛盾的传闻见解之后终于“眼见为实”或是“以为不可”呢？

这些质疑确实在逻辑上都能站得住脚，但我上文已经提及，陈师道自称“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导致文献的缺失是徐州集

会问题益加模糊的根源，所以以上观点，不论对陈师道“卧病里中”时间的含混，还是对秦观交游态度的模糊，更或是对后山文章文字的质疑，都完全更像是推理揣测而非确凿之言。换言之，以上任何的一种疑点，都只能在逻辑上无法证明“徐州交游”为真，而非证明“徐州交游”为伪。我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后山集》与《淮海集》中皆不见当时互相提及之语，但陈师道与苏轼确曾交往，而两人集中亦不见互相唱和提及之诗作<sup>[6]69~75</sup>，那么，倘若陈师道与秦观之交游若如陈师道与苏轼一样，虽有所交往但互相未有唱和作品传世，是否可以推论陈师道与秦观未曾交游？也就是说，在《后山集》中当时诗作多有散佚的情况下，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陈、秦两人未曾交游，在逻辑上依旧不能推导出陈师道与秦观元丰元年同处徐州时未曾会面。并且，上文之中，我已经提供了陈、秦徐州交游的支撑材料，因此，陈、秦徐州未曾交游说便不再有学理上足够的说服力了。

至此，应当可以说明：陈师道与秦观在徐州集会时确有交游。前人学者熙宁十年说与未曾交游说皆缺乏足够的证据依托，并且傅尧俞识交秦观事件的背后，也潜藏着或可推知陈师道与秦观元丰元年徐州集会交游的佐证。

### 四、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在曾枣庄先生、马东瑶先生、郑骞先生、范月娇先生等诸多宋诗研究界的重要学者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文献的搜集考证，以后山外集诗《和秦太虚湖上野步》为元丰元年所作的重新系年为核心内证，参考傅尧俞识交秦观事件等外证材料，陈师道与秦观“徐州交游”这一桩历史公案得到了它应有的裁决与审定：徐州集会期间两人确有交游，并在此后逐渐相知相识。这样，陈师道与秦观在徐州、广陵、东都的三次交游贯穿了元丰始末，而徐州交游成为了两人一系列交游的序曲与渊源。

### 注释

[1] 郑骞《陈后山年谱》，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版。

- [2] (宋)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影宋本十六卷。
- [3] 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4] 范月娇《陈师道及其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发行1988年版。
- [5] 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6] 曾枣庄《陈师道师承关系辨》，《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 [7] 王一飞《陈后山年谱》补正，江苏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 [8] 杨晓乐《陈师道唱和诗研究》，中国矿业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 [9] 曾枣庄、舒大刚《北宋文学家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
- [10] (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11]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12] 曾枣庄《苏辙年谱》，巴蜀书社2018年版。
- [13] (宋)陈师道著、(宋)任渊注、冒广生笺《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2009年版。
- [14] “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
- [15] “元丰八年，先生慕马少游之为人，改字少游，陈无几师道为作《字序》”。
- [16]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17] 周婷《陈师道诗歌接受及逸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 [18]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 [1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

龙飞宇，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媛，兰州大学萃英学院本科生。

# 苏轼《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 碑刻的历史沉浮

李援朝

**内容提要** 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守颍半年间，他夙夜在公，留下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卓越政绩，同时，他重视当地文化建设，大楷书丹《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中吕满庭芳》等诗词并刻石，撰立《昭灵侯庙碑》于辖县颍上昭灵公祠等。《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著名刻石的主件，历经近930年沉浮终于回到了它的故里颍州（今阜阳市），再度进入了大众视野，这是值得载入文化史册和传扬的一件盛事。

**关键词** 苏轼 颍州西湖 月夜泛舟听琴 碑刻 三度沉浮

在阜阳历史上，北宋一代晏殊、蔡齐、欧阳修、苏颂、燕肃、吕公著、陆佃、苏轼、张耒等一批贤相名臣、文化名人先后知颍州，留下大量赞咏颍州及西湖的诗文、墨迹和碑刻。如北宋治平四年（1067）颍州太守陆经，将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离开颍州后所写的十三首《思颖诗》，刻石在颍州北城内的署衙；熙宁三年至五年（1070~1072）颍州太守吕公著主持了欧阳修《思颖诗》后续17篇诗作的刻石立碑。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衔知颍州，大楷书丹《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中吕满庭芳》等诗词刻石立于西湖书院碑亭内，还撰立书丹《昭灵侯庙碑》于颍上昭灵公祠内等等。

这些宋代颍州的碑碣，一如明正德《颍州志·卷一·古迹·碑碣》所述：“前代石碑，多更丧乱，残毁少存，如西湖书院有碑沉埋湖

水中，宣德中犹有渔家见数道浅水处，今湮没泥中，代远可知也”<sup>[1]19</sup>。令人欣慰的是，苏轼守颍所作诗书丹的《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以下简称《月夜泛舟听琴》）刻石的主件，经历近930年沉浮，在2000年回到了它的故里颍州（今阜阳市），再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不禁引发了人们怀古之幽思，这是值得阜阳文化史、书画史记载和庆幸的一件盛事。

## 一、《月夜泛舟听琴》刻石诞生记

元祐六年（1091）九月十五日，是苏轼任颍州太守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他邀请了颍州签判赵令畤（字景贶）、颍州教授陈师道（字履常）和远道而来的客人崔闲等人来到城西北郊的颍州西湖。崔闲（字诚老），是一位不务功名的著名琴师，苏轼被贬谪黄州期间，他曾多次前往拜望。

秋风微拂、月明星稀，大家乘着画舫泛游在颍州西湖静谧的水面上。会老堂、西湖书院、宜远、飞盖、望佳三桥等景致隐隐可见；远处传来，歌女传唱欧公（欧阳修）当年所作的《玉楼春》（西湖南北烟波阔）<sup>[2]2020</sup>：“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大家不禁触景生情，即兴作诗，怀念欧公，场面肃穆而热烈。苏轼思绪连绵，作《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sup>[3]649</sup>：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  
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  
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该词写得情真意切、深沉哀婉，无论是天上月，还是波底月，苏轼睹月思人，浮想联翩，抒发了对恩师欧阳修的无限缅怀之情。

这时，苏轼拿出父亲苏洵生前珍藏的唐代名琴——“雷琴”，交由琴师崔闲，请他抚琴弹唱元丰年间贬谪黄州所作的《醉翁吟》（亦称《醉翁操》）<sup>[3]440</sup>：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  
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  
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醉翁吟》，以节奏鲜明的词，与余音绕梁的曲形成了绝妙搭配，有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众人沉浸在哀戚缠绵的琴声中。

还是苏轼带头调节了沉静的氛围，他接着作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sup>[4]1790</sup>一诗：

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  
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  
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  
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  
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  
哀弹奏旧曲，妙耳非昔闻。  
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  
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

继而苏轼又作了《减字木兰花》<sup>[3]123</sup>词，赞扬了琴师崔闲弹出的高妙琴声如高山流水：

空床响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坐寒。《转关》《镆索》，春水流弦霜入拔。月堕更阑，更请宫高奏独弹。

颍州签判赵令畤、颍州教授陈师道先后唱和，作了《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在西湖月夜泛舟打道回府后，苏轼又作《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sup>[4]1790</sup>。

苏轼对所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一诗十分喜爱。不几天，便将它寄给了外地的朋友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等共享，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再作《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其一《见和西湖月下听琴》，向他们讲述了邀请著名琴师崔闲月夜弹琴之事。

不久，苏轼应颍州签判赵令畤、颍州教授陈师道的提议，约于十一月份用大楷书丹《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一首示坐客》<sup>[5]173</sup>，请镌刻工匠精心雕刻，立碑于西湖书院之碑亭。苏轼立石书丹时将原题目修改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这个 12 字的标题比之原题更显凝练，楷书字体偏大，气势磅礴，丰腴雄壮。全诗五言十六句，计 80 字。苏轼此诗此碑得到颍州儒学（州学）、西湖书院士子们的青睐，各地文人墨客也慕名纷至沓来，欣赏咏读和拓帖，一时间传为佳话，也成为颍州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 二、《月夜泛舟听琴》石碑藏匿西湖

北宋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任用奸臣蔡京为宰相，并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兄弟及其门人秦观、张耒、晁补之、黄庭坚等 120 人列出罪状，谓之“元祐奸党”，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崇宁三年（1104）六月，时宰蔡京等人又重定“奸党”，将 120 人增加至 309 人列入《元祐党籍碑》黑名单，置于文德殿门东墙壁，再由徽宗颁诏全国刻石至州县，下旨此 309 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永世不得翻身。

同时，在奸臣蔡京等人的操纵煽动下，宋徽宗皇帝下诏，天下碑碣榜额，系苏轼书撰者，并一例除毁。此后又多次下诏禁读苏轼文章，焚毁苏轼墨迹，凡有收藏和习用苏轼片纸只字者，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

迫于当时大兴“文字狱”的严酷局势，颍州官府也不得不砸碎焚毁了一批事关苏轼的诗文碑碣文牍。但对于人们喜爱的苏轼《月夜泛舟听琴》石碑，还是不忍心砸成粉齑，有人甘冒被株连的危险，手下留情，敷衍塞责，仅将石碑砸成几段并顺势抛在了颍州西湖，这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保护。正如阜阳著名文史学者刘奕云老师在《苏轼“听琴”诗及石刻考析》<sup>[6]53</sup>所述：当销毁苏轼文字的诏令下达时，人们将“听琴”诗刻石顺势推入颍州西湖水下，以敷衍塞责（“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阜阳西湖遗址上的欧阳修故居会老堂中一块欧阳修画像石，即是被当地群众扔进泉河而保存下来）。不久金兵南下，长淮以北为金所占有，人民逃亡，年湮代远，当时没有记载，后

人便无所知。随着沧海桑田，水落石出，此二石出土了，其余刻石或仍沉睡于泥沙深处，亦未可知。

据著名作家林语堂撰《苏东坡传》<sup>[7]20~21</sup>记述：北宋崇宁五年（1106）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门东墙壁上的《元祐党籍碑》突遭雷击，破成两半，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天怒，宋徽宗（赵佶）也十分恐惧，连忙下诏全国销毁《元祐党籍碑》。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得对苏轼的毁誉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五年后，有一道士向徽宗奏称，曾梦见苏轼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管诗文。徽宗愈加害怕，急忙将苏轼在世时的官爵恢复，皇家也开始搜集苏轼的文稿，重刻苏轼的碑文，苏轼的诗文字画成了皇家、富商重金收藏的珍品。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这笔钱以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

到了南宋时，宋高宗赵构（1107~1187），于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市）后，认真阅读了苏轼有关国事的政论，很是敬佩苏轼谋国忠勇的品格。为了追念苏轼，他决意为苏轼彻底平反，遂追复“端明殿学士”，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并把苏轼的孙子苏符（1086~1156）赐封高官。南宋孝宗赵昚（1127~1194）对苏轼的诗文、人品更是赞赏有加，于乾道六年（1170）追谥其“文忠公”，乾道九年（1173）特赐太师，编辑出版了苏东坡文集，并钦赐序言，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盛赞他的浩然正气，这些都使得苏轼身后的名气地位越来越高，几乎达到了高峰。

苏轼身后 70 年间这场毁誉贬荣的变化，正如他生前的坎坷仕途一样，在中国古代名人中实属少见。《元祐党籍碑》的立与毁，反映了北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南宋朝廷给苏轼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肯定了苏轼应有的崇高地位和对历史文化的贡献，这不能不令崇敬苏轼的人们感慨万千。

苏轼的冤案平反、名誉恢复后，世面上有苏轼《月夜泛舟听琴诗》残石拓本在流传。如南宋绍定元年（1228），收藏家聂子述辑刻《宋拓郁孤台法帖》（见金字图片），收录了苏轼《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一首示坐客》等书法作

品。此帖今唯存残帙二函，藏于上海图书馆，为该馆镇馆之宝。《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选·苏轼、蔡襄大字楷书》<sup>[8]3</sup>与颍州原石拓本苏轼《月夜泛舟听琴》，在笔迹及笔划粗细、间架结构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应为苏轼在同一时期书写的同一内容的两件书法作品，也就是说，苏轼或在颍州至少两次大楷书写过《月夜泛舟听琴》一诗，而颍州原石及拓片或在先，《郁孤台法帖》版本碑刻及拓片应在后。在整个南宋、金元，未见苏轼任颍州太守时所刻《月夜泛舟听琴》原石真迹曾露真容的任何记载。

### 三、《月夜泛舟听琴》碑刻惊现清朝

清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上旬，颍州知州樊士鉴与阜阳县学训导宫樟，终于打探到了苏轼《月夜泛舟听琴》残碑的下落。

樊士鉴，字菱川，号雪鸿，山西临汾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观政于工部虞衡司主事（郎中），清嘉庆七年（1802）任颍州知府。

宫樟，字乔望，号鹤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拔贡，五十七年（1792）二月授任阜阳县学训导。“樟能诗，其官训导时，阜阳有欧阳西湖之胜，每携友朋偕生徒登临赋诗，一时称盛事。”江志伊《宫君墓铭志》<sup>[9]284</sup>记载：“君训导阜阳县时，阜阳古颍州欧阳文忠公聚星堂、苏文忠公所开西湖俱在，君每携生徒登临其间，吊古赋诗，飞盖流霞，望之若神龙。”

清道光《阜阳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收录了颍州知府樊士鉴《嘉庆壬戌冬日，宫昕圃广文拓东坡〈西湖月夜泛舟听琴〉诗断石四十字见贻。笔力严整，石质完好，真堪宝藏。因用坡翁〈石鼓歌〉韵以志之》<sup>[10]822~823</sup>一诗。作者在该诗的第一部分，详细记述了《月夜泛舟听琴》诗碑历劫 600 年后又复现于世的经历：

我初观政尔辛丑，守颍又继东坡叟。  
访求遗墨苦杳然，空想老笔风雷走。  
昕圃广文善搜罗，得此石刻笑开口。  
元在宁氏茂才家，大书深镌超前后。  
惟惜历今六百年，石仅存二遗八九。  
急觅良工事响拓，细玩笔法似颜柳。  
前列题款十六字，后字廿四光射斗。

二石两面，刻计四十字。

形大如拳笔屈铁，力透纸背神运肘。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樊士鉴中进士第，然后在朝廷的工部任郎中，实习政事；嘉庆七年(1802)有幸来到北宋东坡公曾为太守的颍州任知府。政务之余，他不惧辛苦地访求东坡先生在颍州的遗墨，然而杳无遗迹，没有什么收获，以至久思成梦遇见了东坡先生在娴熟地秉笔，如风似雷般地挥毫疾书。颍州府属阜阳县儒学训导是怀远人宫樟，尊称“宫广文”，他同样敬仰苏轼，精于诗文，常带领学生登临“欧苏”两公经营过的颍州西湖，凭吊赋诗。宫广文先生与樊士鉴都有搜罗文物、研究历史的共同爱好。宫樟终于历尽周折打听到东坡《月夜泛舟听琴》残碑的确切下落，原来它早年就被颍州府城宁秀才家的祖上所收藏，通常秘不示人，这一发现真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宁秀才家的祖先于明宣德十年(1435)调任颍川卫世袭指挥同知，遂定居于颍州，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月夜泛舟听琴》碑上的大楷字，镌刻的深浅非常到位，字迹十分清晰。但此碑从古至今已被埋没了600多年(约数，实则710年)，唯一可惜的是仅存两片残缺的碑石，还遗失了不少的文字。他们急切地寻觅到了技艺精良的拓匠，用“响拓”即复制办法作了几幅拓片，细细地玩味着东坡先生运斤成风的笔法，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遗韵就蕴涵在其中。拓片开头有“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16字，诗的正文遗有24字，总计40字。东坡的诗文彩熠熠，字形大如握拳，弯曲如铁，柔中有刚，运笔如神，力透纸背。

接下来，知府樊士鉴写道：

具足力现庄严相，他书偃笔功有莽。  
鲁公书法是吾师，僧虔季海仅良友。  
锥画沙今印印泥，气食牛兮于菟穀。  
当时作字兴不浅，政余文酒辨蝌蚪。  
幸值元祐承平年，治继晏欧诸宿耆。  
政善何止活千人，刑清不用一獒嗾。  
朝游清颍照须眉，夜泛西湖举兕觥。  
皓月当空漾玻璃。清琴入耳胜矇瞍。  
诗成知已凌陶谢，书就真卿追岣嵝。  
垂绅正笏真端人，岂同临王章子厚。  
集载九月十五日，未记坐客为某某。  
为读赵陈二和篇，一时文采古未有。

如此学品如此书，奈何竟罹乌台枉。

当年何人事青蝇，舒亶李定两走狗。

遂使端明鬢学士，远谪儋耳鬼为偶。

可怜居黄书赤壁，多难畏尾复畏首。

进御题跋皆割去，寸楮片纸遭击剖。

况此西湖两片石，焉能宝藏待人取。

在这部分，知府樊士鉴概述了东坡对书法艺术的孜孜追求，政善清刑、甘棠遗爱的从政理念，描述了东坡月夜泛舟听琴西湖的往事，赞扬了东坡高尚的德品学品，谴责了御史台官员李定、舒亶等“走狗”制造“乌台诗案”，以及后来徽宗朝廷、奸佞蔡京等对忠臣东坡的持续迫害及贬谪流放、列入“元祐党人”和碎碑焚文等一系列恶劣行径，为苏轼坎坷的政治遭遇大鸣不平。

最后，颍州知府樊士鉴以欣慰的口吻写道：“谁知天怜千古才，历劫犹能出尘垢。四十楷法不二门，一字一珠神物守。五百年后人谁是，我勉作歌乞不朽。安得缺石全出世，珠还璧合为公寿”。用今天的话来说：上天怜悯眷顾着千古难得的人才，东坡在蒙难历劫之后得以平反昭雪，英名重现于世。《月夜泛舟听琴》残碑四十个大字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楷书经典，可谓是神灵守佑着的字字珠玑。我由衷地赞颂它不朽的光辉，也希冀缺失的碑石能全部出世，更能彰显珠联璧合，并以此来纪念苏公的诞辰。

清代中期文学家、思想家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有传。他曾在清嘉庆年间应邀来颍州府学、清颍书院等处讲学。他与颍州知州樊士鉴、阜阳县学训导宫樟等人，在宁秀才家一同观赏了东坡《月夜泛舟听琴》刻石，并作《颍州观东坡月夜西湖泛舟听琴诗石刻呈上樊雪鸿、宁鞠溪、王约斋两明府》诗，盛赞东坡避嫌引疾外任颍州后的优异政绩和清雅兴致：“学士才朝右，忧谗请左符。高情殊不替，清兴满西湖。胜地星常聚，前贤风未孤。坐看成异政，还使继清娱。”<sup>[11]820</sup>。樊雪鸿即颍州知府樊士鉴，宁鞠溪即宁贵，王约斋即驭超，清嘉庆年间曾先后任阜阳县知县(亦称明府)。

《月夜泛舟听琴》残碑在清嘉庆年间的颍州偶露峥嵘，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一阵轰动之后，其身影再度隐匿，消逝得无影无踪。

#### 四、《月夜泛舟听琴》残件再现民国

据刘奕云先生《苏轼“听琴”诗及石刻考析》<sup>[6]45~46</sup>记述：1984年阜阳文物普查时，发现苏轼《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石刻拓片两张，每张长约一百公分，高约三十七公分，存“听琴”诗四十字，正楷竖行自右至左书写。其一石书十六字，八行，每行两字，每字高、宽各约十三公分，其文：“颍州 / 西湖 / 月夜 / 泛舟 / 听琴 / 一首 / 东坡 / 居士。”另一石书二十四字，八行，每行三字，每字高、宽约十公分，其文：“为谁来 / 似为我 / 与君水 / 天浮四 / 坐河汉 / 落酒樽 / 使我冰 / 雪肠不。”

该拓片纸黄墨淡，因保管不善，纸边折叠处，均残缺破损。经调查，原石刻两块，解放前尚嵌在阜阳私立丽泽中学墙壁上，解放后移至阜阳一中院内，不知何时遗失，或说是被砸碎烧石灰了。

又据阜阳书法家张树山先生《诗成已知凌陶谢，书就真卿追岣嵝——读东坡月夜泛舟诗残石》<sup>[6]84</sup>记述：“此石精装在西湖会老堂。由于时局变迁，几经沧桑，至清嘉庆时，落入邑人宁茂才家。那时只有40个字了。解放前，曾嵌在丽泽中学的墙壁上。解放后，一度转到一中。十年浩劫中，有人说被烧石灰了。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愿原物尚在，能够再现。”另据《安徽阜阳地区史略》作者张家琦老先生记述：“昔在颍州私立丽泽初中读书时，曾见到两块各刻四个大字的石碑，都说是苏东坡在颍州时写的，其文为：‘颍州西湖’和‘月夜泛舟’，字很大，字体和一般标明为苏东坡写的字帖上的字一样。后来这两块石碑不知弄到那里去了。”<sup>[12]290~291</sup>

刘奕云、张树山和张家琦三位先生都认为《月夜泛舟听琴》残碑曾经存放于丽泽中学和阜阳一中。确实如此，丽泽中学与阜阳一中有着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据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六·学校志》<sup>[13]106</sup>记载：丽泽中学“原系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经宁斗南、宁虞南等呈请设立的私立初级中学。由宁斗南捐产三百二十亩为校产，并假乃父贻谋所筑之愚园建校舍，图书、仪器颇称完备。二十七年（1938）被敌轰炸，而尚克保存，尤属难能。迄三十三年（1944），曾办毕业十有三届。奉命结束。

今改私立清颖女子中学，校长宁馨。”“宁馨之父宁雅章又捐四百余亩。”从上述所知，无论是私家“愚园”，还是利用“愚园”所建的“私立丽泽中学”、“私立清颖女子中学”，都是由宁氏家族或其后裔所经营。1949年2月私立清颖女子中学（原丽泽中学）被“阜阳联合中学”接管，成为阜阳第一中学前身的一部分。解放后，《月夜泛舟听琴》的残碑（部分）转移到了阜阳一中校院内，也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事，应是一种文物保护之举。

苏轼残碑之事，也被曾是阜阳一中学生的姚登恒先生写在他的《阜阳沧桑》著作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他写道：1963年，“一个名叫姚登恒的阜阳一中高二学生，与他的同学们在校内发现一块刻着‘颍州西湖，月夜泛舟’的石碑，大家为苏轼的豪放而感叹不已。”<sup>[14]33</sup>。姚登恒先生，1945年出生于阜阳，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曾任阜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阜阳地委副秘书长等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阜阳沧桑》《亳州沧桑》等书。

1984年，阜阳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苏轼《月夜泛舟听琴》石刻拓片两张，与清嘉庆七年（1802）颍州知府樊士鉴所描述残碑块上的数字高度一致。为什么到了清末民初时人们见到的石碑上仅遗留下“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八个大字呢？笔者分析，从清代嘉庆七年（1802）残碑的第一次露面，至清末民国时嵌镶在愚园内，在时间上相距110余年。或是当年宁家因家庭财产分割等问题而再次造成了残碑“身首分离”的情况，宁贻谋先生将分得的这两块“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八字石碑残件嵌筑于“愚园”的墙壁上。而另外的残碑主件正文人们未见提及，亦未详其踪，或是流落到了他乡。

#### 五、《月夜泛舟听琴》残碑主件归故乡

2004年初，阜阳市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主编了《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他在《后记》<sup>[5]237</sup>中记述：民国以前属阜阳管辖的霍邱县，有位自号“亦园叟”的刘勋芳老先生，生前翻刻和收藏了一批有价值的石刻，如《唐元和二年张宁墓志》《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岳飞雪满千山路诗》《宋苏轼颍州西湖月

夜泛舟诗》等，都是在石灰窑坊被有心的农民兄弟抢救下来的劫后遗珍。其中，霍邱刘氏所藏北宋苏轼《苏坡颍州西湖月夜泛舟诗》石刻，5幅拓片，计66字，后被收录在《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颍州历代书法选》等书籍中。

但是，霍邱刘氏所藏第一幅拓片“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16字，与1984年阜阳文物普查所获拓片第一幅的“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16字，在每行文字数量、书写顺序上存在区别：一是6行16字（前4行 $4 \times 3 = 12$ 字，后2行 $2 \times 2 = 4$ 字），一是8行16字（每行2字）。由此推测，历史上“听琴”诗首幅拓片的刻石或有一幅有可能存在原拓翻刻的成分。若是“翻刻”亦属保护文物的一种正常做法，韩自强老馆长曾指出：“刘勋芳老先生，生前翻刻和收藏了一批有价值的石刻”大概也是此意。

我市著名文史专家刘奕云先生，在见到《月夜泛舟听琴》残碑原石和拓片后，十分高兴，曾欣作六言诗盛赞：“霍邱亦园苏碑，原嵌堂前两廊，日久园毁堂倾，文物四散星亡，石雕化作石灰，子遗垫路补墙。忽焉熙春寒往，又见苏字重光。”

霍邱刘氏所藏北宋苏轼《苏坡颍州西湖月夜泛舟诗》<sup>[15][40]</sup>石刻及拓片内容分别是：

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  
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

四

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

琴有

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

据史料显示，5幅拓片中第一幅的原石，内容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16字标题），目前仍下落不明仅存拓片，其余4块原石主件（共50字），当时由霍邱县亦园叟刘勋芳老先生收藏。2000年前后，经由阜阳市文史学者、原阜阳市地志办主任刘奕云先生苦心搜寻，阜阳市博物馆韩自强馆长引见收购，几块残碑从霍邱以三万元购回阜阳，归由阜阳市著名收藏家范亚军先生珍藏。经有关专家考证，确为宋代碑石无疑。目前，阜阳得以珍存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守颍时的真迹原石，实在是阜阳文化之幸，弥足珍贵。

苏轼《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亦称《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立有复刻碑石。据徐丽《苏祠漫步》<sup>[16][34]</sup>中记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颍州任知州时的作品。此作赞美了颍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泛舟，听琴的豁达情怀。同时也表明苏轼做人臣的坦荡胸怀，如冰雪一样高洁。

### 注释

- [1] 明正德《颍州志》，黄山书社2017年版。
- [2]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4]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5] 韩自强主编《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阜阳市博物馆2004年版。
- [6] 《阜阳文物考古文集》，阜阳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1989年9月编印。
- [7] 林语堂撰《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8] 《宋拓郁孤台法帖精品选·苏轼蔡襄大字楷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 [9] 清嘉庆《中国地方志集成·怀远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10] 清道光《阜阳县志》黄山书社2009年版。
- [11] 水赉佑编《苏轼书法史料集（下）》，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
- [12] 张家琦著《安徽阜阳地区史略》，内部资料2008年版。
- [13]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黄山书社2008年版。
- [14] 姚登恒著《阜阳沧桑》，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 [15] 任智、王兴华、董兆乾编《颍州历代书法选》黄山书社2017年版。
- [16] 徐丽编著《苏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2008年版。

李援朝，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阜阳市政协文史馆馆员。

# 王尚絅“左苏右程”观考辨

王维玉

**内容提要** “先生平生每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当薛应旂如此定位王尚絅时，再细读王氏诗文创作与为学旨要，观其言而察其行，却显示出诸多矛盾。三苏坟建牌坊以表对三苏敬仰之情乃是其作为文人的诚挚之心，上书张崇德三议汝州书院，“右两程左三苏”之主张，符合当时程朱理学制度化与世俗化的时代语境，乃官方话语的必然姿态；其诗文创作及观念综合苏轼与二程，书写性情更有远程近苏趋向；理学思想上，继承张载气本论，也与二程理学有所背离，而接近苏轼。作为学者（文人）兼官员，王尚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对于圣人之道，在文人与儒者之间的犹疑与坚守，私人学术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学统与政统的偏离与依归，而此坚守、协调与依归，正构成了王尚絅“左苏右程”观的官方话语显性面相。

**关键词** 王尚絅 左苏右程 考辨

读王冰博士《王尚絅集校注》一书，感慨良多。在“前言”中王冰博士指出，“明代理学家王尚絅，客观评价二程在理学上的贡献，自觉维护二程及其学说的地位。”<sup>[1]</sup>感到这种客观评价、绍述前人的为学态度，也是王冰博士自身写照。《王尚絅集校注》凡十八万字，校注以文意疏通为准，简明扼要；前言后记关涉王尚絅评价部分，言必有出，亦觉精当客观。尤其前言，王冰博士从王尚絅的文学、理学以及学界研究现状几个方面，对其成就加以介绍，娓娓道来，用语平正公允。然而，细细研读，困惑不自觉间油然而生。比如就王尚絅对三苏态度，作者一方面征引后学评价，认同其“右两程左

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观点，另一方面既介绍了王尚絅的文学成就、文学观点，以及对作为文学家的三苏的敬仰，又介绍了源出于张载的气本论而非二程的理本论的王尚絅的理学思想，而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恰恰又是迥异于二程，却与苏轼是比较接近的。这些内容的并置与内在矛盾，令人质疑王尚絅“左苏右程”观念的合理性。如果合理，又如何理解？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考辨。

## 一、“左苏右程”与理学独尊

王尚絅对三苏的矛盾态度值得探究。

正德元年（1506），王尚絅曾在三苏坟捐立了一座高七米、宽六米的“青山玉瘗”坊，坊柱上刻有描摹苏轼笔迹的苏轼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坊额刻“青山玉瘗”四字。“壮兹气节，钦尔风神”，表达了他对三苏的敬仰之情。

正德十六年（1521），汝州知州张崇德筹建三贤书院，在《汝州书院三议》中，王尚絅不同意将苏轼苏辙列入，而极力主张二程，理由有三：一是苏氏兄弟生前与汝地关联不大。“东坡始终未至，颍滨史志皆无所载。”“徒以莹墓在郏。”（《汝州书院第一、二议》）<sup>[1]262~265</sup>确实，“圣人之道，远及于天下，近切于一乡。在乡者，犹其在天下也。”（《汝州圣学书院碑铭》）<sup>[1]276</sup>如果圣人之道讲求一乡与天下的互动与关联，突显地域性文化对普适性天下之道的影响程度，此点甚确。二是三苏之学与二程之学的伪正对立。具体描述了苏学被禁与洛学走向官方之学的状况，洛学蜀学，有正伪之分，比之十五年前的敬仰，此批判之姿令人困惑；三是书院养性

命道德之功能。

那么，正德、嘉靖年间，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是怎样的呢？据考察，此期正是程朱理学制度化与世俗化相当严重的时段。一方面，永乐年间编成的《性理大全》等书，规定了知识的边界，以及世人阅读与理解的走向，另一方面，产生于唐代本是侧重于藏书的私家书院，唐宋以来渐趋有了教育的功能，明代更是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及德行之士培养的主要场所。就上述王尚絅的二三两点理由来看，在此时代语境之下，汝州书院命名取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诚如后世学人高攀龙回忆正德、嘉靖前后的社会思想状况时所言：一方面程朱理学官方化后，“邪说屏息，吾道中天矣，至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于是，”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sup>[2]</sup>“本来是批判性相当深刻的程朱学说，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了思想世界普遍接受的知识和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之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sup>[3]291</sup>回到王尚絅的第一点，维护乡土之学的纯洁性，并且作为一种资源，可以贯通且成为天下之学，固然令人神往。但是如果乡土之学渐渐失去的潜在生长性，那么，汲取天下之学而活化地域之学，是否会成为必要的选择？

### 二、文学创作与近苏远程

王尚絅究竟是理学家还是文人？我们认为他与二程不同，比如程颐认为作文害道，为文是玩物丧志，此轻视文学态度可谓空前绝后。王尚絅对诗文是十分重视的，这从《王尚絅集校注》中占据三分之二篇幅的诗歌作品亦能直观感受到。

后学评价王尚絅，多否定其文人身份，而突显其学者或理学家面相。比如薛应旂指出：“先生文追秦汉，诗逼苏李，一时艺林咸称作者，有《苍谷集》十二卷行于世，然实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两程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使假之以年，当必有继往圣而开来学者。”（《苍谷先生传》）<sup>[4]4012</sup>清人刘宗泗也说：“尚絅学问淹博，雅善诗文，然实非所好也。当时推理学者，每与何文定塘同称

云。”（《王布政尚絅》）<sup>[1]356</sup>

上述评价不禁令人想到苏轼。晚年的苏轼曾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四首》三）<sup>[5]1741</sup>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亦云：“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sup>[6]981</sup>宋代以来道学盛行，文人身份似乎只能是私家领地，道义担当是儒者身份总是令人神往。

比之二程，王尚絅显然类于苏轼，有文人的一面。尽管“时士大夫以诗文为讳，予以不复敢及此矣。”（《赠言会录序》）<sup>[1]239</sup>他不仅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还有自己的文论。“世之论文者必曰文须学古，临文则曰某学某，某学某。某操钺伐柯，十年不就。洎病伏苍谷，收视反听，无意于诗文也久矣。乃翰林主人偶相示曰：‘文，心之神也。’……夫有心矣，苟非神以主之，辟则走碑行尸，种种昏迷，安在其学古人也？……弟尚明曰：‘眉山谓文章以气为主，伊洛谓文章主于理，然则何居？’呜呼，知先生之神者，理与气可得而言矣。”<sup>[1]253~254</sup>，潘思光在《重刻王苍谷先生集录序》中云：“考其生平，以孝为本，行道扬名，清修励节……其为诗、古文辞也，追秦汉、逼苏李，抒写性情，不以追琢翰藻为工。原本经术，不以难深险奥为尚，谨严之中蔼然敦厚，一时艺苑未能或先。”追秦汉，逼苏李，书写性情，文学创作的主体指向，有着近苏远程之势。

### 三、理学建构与洛学疏离

程朱理学僵化，王阳明源陆象山建构心学。与之类似，王尚絅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

张载主张“虚空即气”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一元论”。它不仅与程朱的“理一元论”形成鲜明的对立，而且是对老庄所主张的“道一元论”的驳正。程颐即不赞成太虚为万物本源的说法。当学生问及“太虚”有无时，程颐否认识，“亦无太虚”，且谓“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

苏轼论气，有他的特点。他很少从哲学思辩角

度探讨气的物质属性。但在为数不多的几处文字中，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见解比较接近于张载。

王尚絅的气本论则是充分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哲学思想，比之于二程理学，与苏轼的气本论是否更接近？

作为学者（文人）兼官员，王尚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对于圣人之道，在文人与儒者之间的犹疑与坚守，私人学术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学统与政统的偏离与依归，而此坚守、协调与依归，正构成了王尚絅“左苏右程”观的官方话语显性面相。

想到了左东岭的一段话：“即使那些在朝官员也难以做到全是台阁诗文的写作，刘基对内心苦闷的吟咏，高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刘嵩对宦海风波的忧虑，都斑斑可考地存在于其别集之中。文人的生命状态、文学的功能作用以及诗文审美的趣味需求，本来就是差异巨大的多样共存。但是，在鸣盛的时代主潮里，这些复杂多样的声音都被淹没了。今天来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思想，的确需要重视台阁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对历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左右着明前期的文学走向，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主流之外的各种声音，因为是它们构成了那一时代立体多元的真实样态。如果忽视了这些非主流的声音，那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sup>[7]115~124</sup>文人的双重身份，恰恰可以佐证那个时代的王尚絅，其身份的多元性吧！

### 注释

[1] [明]王尚絅著，王冰校注《王尚絅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 [明]高攀龙著，许珏辑《高子遗书节钞》，《锡山先哲丛刊》第四辑，风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薛应旂《苍谷先生传》，《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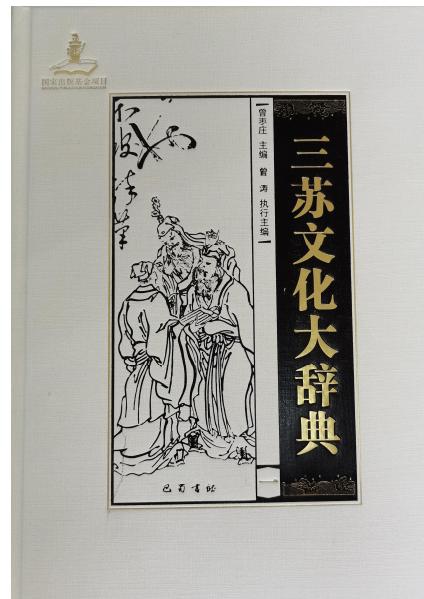
[5]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 秦观著《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左东岭《“台阁”与“山林”文坛地位的升降浮

沉——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流变》，《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王维玉，平顶山学院教授、三苏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书名：三苏文化大辞典（精装1~4册）  
主编：曾枣庄 曾涛  
出版：巴蜀书社 2020年6月第1版  
开本：260mm×185mm  
印张：139.25  
字数：3000千  
定价：1800.00元  
稿酬联系：028-86259418或84898585@qq.com  
发行联系：028-86259622 86259423

# 《龙川略志第四》赏析

胡先酉

## 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知润州<sup>[1]</sup>许遵<sup>[2]</sup>尝为法官，奏谳<sup>[3]</sup>妇人阿云谋杀夫不死狱，以按问<sup>[4]</sup>欲举，乞减死。旧说，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以减。谋而杀，则谋非因，故不可减。士大夫皆知遵之妄<sup>[5]</sup>也。时介甫在翰苑<sup>[6]</sup>，本不晓法，而好议法，乃主遵议。自公卿以下争之，皆不能得，自是谋杀遂有按问。然旧法，一问不承，后虽犯者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皆厌其说。

予至齐，齐多劫盗，而人知法有按问，则未有盗而非按问者。二人同劫，先问其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其右，则按问在右。故狱之死生，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又有甚者，捕人类多盗之邻里，所欲活者，辄先问之，则死生又出于用情。

予见而叹曰：“惜哉！始议按问者之未究此病也！”因以语齐守李诚之<sup>[7]</sup>。诚之亦叹曰：“吾侪<sup>[8]</sup>异日在朝，当革此弊。”予曰：“虽然遵议则非，而要能活人；吾议则是，而要能杀人，予意亦难改之。”诚之曰：“信然。奈何而可？”予曰：“昔劫盗，赃三千而死，今五千而死矣，非有常也。必欲改是，增至七千而死，庶几可耳。”

后十余年，谪居筠州。筠守许长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诸子仕宦者十余人，而郎官、刺史至数人。予复叹曰：“遵之议妄甚矣，而子孙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之也哉！”

## 注释

- [1] 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润州区。
- [2] 许遵：泗州人，第进士。熙宁间，知润州。
- [3] 谯（yà n）：审判定罪。
- [4] 按问：查究审问。
- [5] 妄：妄法。胡乱执法。

[6] 翰苑：翰林院的别称。

[7] 李诚之：李师中，字诚之，楚丘（今河南商丘或山东曹县）人。北宋大臣。

[8] 吾侪（chái）：我辈；我们这类人。

## 译文

润州知州许遵曾经担任法官，他向朝廷上奏一个叫阿云的妇人谋杀丈夫但未杀死的案件，说根据审问时妇人有自己招供的情节，请求减轻判决，不处以死罪。按过去法规的说法，斗殴至死、抢劫至死，斗殴、抢劫是至人死命的原因，所以审问时犯人能招供可以减轻判决。有预谋而杀人，那么预谋不能算如斗殴、抢劫杀人等的其他原因，所以不可减罪。士大夫都知道许遵此举是妄法。

当时王安石在翰林院，他本不通晓法律，却喜欢议论法规，于是就赞同许遵的做法。从公卿以下的官员同他争论，都说不过他，从此谋杀就可以按问了。然而按照过去的法规，第一次审问，犯人没有招供，以后即使犯人自己坦白了，都不能按坦白从宽减轻判决。当时为了推广按问的法规，即使是多次审问不招供，只要后来招供了，也当坦白从宽办理，天下都不满意这种说法和做法。

我到齐州工作，齐州有很多抢劫偷盗的违法之事，齐州人都知道有坦白从宽的法规，因而便没有抢劫偷盗案件不按坦白从宽处理。两个人一同抢劫，先问左边的，那么左边这个犯人就可以视为坦白从宽；先问右边的，那么右边的犯人就可以视为坦白从宽。所以两个人一同抢劫，被捉后谁生谁死，在于先审问谁，而不在于谁的罪行大。更有甚者，抓捕劫盗的公人好多是劫盗的乡邻，他们想谁不死就先审问谁，那么谁生谁死就看抓捕劫盗的公人与犯人的感情怎样。

我见到这种情形而叹息道：“可惜啊！开始倡议按问的官员们没有想到有这些弊病啊！”我于是把我的看法告诉齐州知州李诚之。诚之也叹息道：“我们以后如果在朝，应当革除这一弊端。”我说：

“虽然许遵的说法与做法不合法规，但能够让人活下来；我们的看法虽然正确，但却要杀死人，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许遵的说法与做法。”诚之说：“确实是这样的，怎么办才行呢？”我说：“过去的劫盗案件，赃额达到三千就判死罪，现在赃额达到五千判死罪，看来法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定想改变现在按问的弊病，可以将赃额增至七千才定死罪，就差不多了。”

后来过了十几年，我谪居筠州。筠州知州许长卿，是许遵的儿子。他说他们兄弟以及各自的儿子当官的有十几个，而当上郎官、刺史的也有几人。我又叹息道：“许遵的说法与做法很不合法规，可是他的子孙当官的这样多。看来只要你能使人活命，老天是不会抛弃你的啊！”

### 张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岛

曲堤<sup>[1]</sup>周氏以财雄于齐<sup>[2]</sup>，有秘书丞<sup>[3]</sup>高者，尤骄纵不法。尝自京师载妓妾数十人游杭州，其一人以妒害自沉死。及还齐，其父母邀贿谢<sup>[4]</sup>，不满意，诉之长清令<sup>[5]</sup>张次山，取证左<sup>[6]</sup>治之，亦无他矣。

会次山之婢本周氏隶也，自牖<sup>[7]</sup>窥之，历指所从来一人本高父妾，尝生一子。次山即以长吏举<sup>[8]</sup>行之，高坐刺配<sup>[9]</sup>海岛而死，齐人快之。

李诚之尝语及此，称善。予曰：“使我为长清，决不举也。”诚之曰：“何故？”曰：“民间如此事不为少也，偶一婢知之，因而发之以为明。彼不知者独何幸，高独何不幸也！事发有端，长吏不得已治之，可也；其发无端，自非叛逆，不可也。”诚之曰：“此长者之论，次山之流固不及。”

### 注释

[1] 曲堤：今山东济南市济阳县曲堤镇。

[2] 齐：齐州。今山东济南市。

[3] 秘书丞：官名。古代掌文籍等事之官。

[4] 邀贿谢：邀，请求，要求；贿，财物；谢，谢绝，拒绝。

[5] 长清令：长清县令。长清，齐州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

[6] 证左：左同“佐”。证佐，证据。

[7] 窠(yǒu)：窗户。

[8] 举：检举；揭发。

[9] 刺配：古代在犯人脸部刺字并发配边远地方。

### 译文

曲堤的周家凭借财富在齐州称雄，有个官任秘书丞叫周高的，尤其骄纵不法。他曾经从京城用船载着几十名妓妾游览杭州，其中有一人因为嫉妒不满而跳水自杀死去。等回到齐州，这名死者的父母要求周高拿钱财来赔罪遭到拒绝，便在长清县令张次山那里去告了周高。张次山调查取证审理这件案子，也没有发现周高有罪。

适逢张次山的一名婢女原来是周高家的仆人，她从窗口偷看大堂上周高家被审讯的人，指出跟随周高来的其中一人原是周高父亲的妾，还曾经为周高父亲生过一个儿子。张次山就以县令的身份检举揭发周高有违背伦理的罪行而对其治罪，发配周高到海岛并死在那里，齐州人都为之拍手称快。

齐州知州李诚之曾经对我说到这件事，十分称道张次山会办案。我说：“如果我是长清县令，一定不会揭发周高的这件事。”李诚之问我道：“为什么？”我说：“民间这方面的事情不少，偶然有一个婢女知道，因而揭发出来让众人都知道并因此而判刑。那些没有被揭发的人是何等的幸运，而周高是何等的倒霉啊！如果因为这种事引起纠纷而有人揭发告状，作为行政长官不得已而治罪，是可以的；如果无人因这件事而举报，当事人（即周高父亲的妾）也没有背叛主人而到官府告状，那么行政长官不过问也是无可厚非的。”李诚之说：“您这是长者的看法，张次山之流确实不如。”

### 契丹来议和亲

予从张安道判南都，闻契丹<sup>[1]</sup>遣泛使<sup>[2]</sup>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及北使至，上亲临轩<sup>[3]</sup>，喻之曰：“此事小，即指挥边吏分画。”使者出，告人曰：“上许我矣。”有司欲与之辨，卒莫能得。

予闻之，以问安道，安道曰：“昔庆历中，契丹遣刘六符等来议和亲，未许。燕人有梁济世为雄州<sup>[4]</sup>谋<sup>[5]</sup>者，尝以诗书教契丹公卿子弟，先得其国书本以献。仁宗性畏慎，时吕许公<sup>[6]</sup>为相，奏曰：‘藩国求和亲，汉、唐所不免，当徐议以答之者耳，无深忧也。’仁宗深以为然。及六符至殿，上读书如平日，无所问。

六符失色咨嗟，出至殿外幄次<sup>[7]</sup>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与之评议，无甚难也。今两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朝廷所详。若以实答之，以付边臣，议定以闻，边臣以疆场为职，谁敢不尽力？而其可否尚在朝廷。事莫便于此。何乃面与之决？”

### 注释

[1] 契丹：契丹即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2] 泛使：宋代称派往他国临时办理事务的一般使节为泛使。

[3] 临轩：皇帝不坐正殿而御前殿。殿前堂陛之间近檐处两边有槛楯（ji àn shùn），如车之轩，故称。

[4] 雄州：今河北雄县。北宋时曾一度属契丹。

[5] 谍：间谍；刺探情报。

[6] 吕许公：吕夷简，字坦夫。祖籍莱州（今属山东），后移家寿州（今安徽凤台）。北宋著名政治家，司空吕蒙正之侄，光禄寺丞吕蒙亨之子。

[7] 帷次：古代帝王休憩或祀神用的帷帐。

### 译文

我跟随在南都任通判的张安道，听说契丹派泛使来想求得河东路边界上的土地。宰相王安石认为边界上那点小小的土地没有什么可惜的，而且朝廷正在河北路设置各处守将，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回来。等契丹的使者到了，皇上亲自走到殿堂前檐，告诉契丹使者说：“这是小事，很快就安排边界的官员把土地划分给你们。”契丹使者出来后，告诉人们说：“皇上答应我的要求了。”管理国土的官员想与他分辩，可最终没有办法。

我听说这件事后，来问张方平，张方平说：“过去庆历年间，契丹派刘六符等人来商量和亲的事，朝廷没有答应。因为有个叫梁济世的燕地人是雄州的间谍，曾经教契丹王公贵族的子弟读诗书。他先得知了契丹要来宋朝商量和亲的国书的内容，并报告了朝廷。仁宗皇帝生性胆小谨慎，听说此事后有些担忧。当时吕许公任宰相，他上奏说：‘藩国来求和亲的事，汉朝、唐朝也是免不了的，只需要用慢慢商量来回答他就行了，无需担忧。’仁宗也觉得这样好。等刘六符到宫殿时，仁宗皇帝依旧像平时那样读自己的书，也不问刘六符来做什么。刘六符见此情景，惊恐得脸色大变，叹息连连，出来走到殿外的帷次时说：‘和亲的事已经泄露了。’由此有关部门与刘六符等商谈，就不难了。现在契丹与

大宋朝两国边界上的土地犬牙交错，本来就不是朝廷详细了解的。如果把这一实际情况告诉对方，并将此事交给边境上的官员处理，等商定好了再上报朝廷。边境上的官员其职责就是守卫国家的边界，谁敢不尽力？但对商谈结果是否认可的最终决定权在朝廷这里。没有什么能比这样做更便利了。何必当面就答应他呢？”

### 议卖官鞠与榷酒事

真宗皇帝自毫<sup>[1]</sup>还过宋<sup>[2]</sup>，御楼宣赦，以宋为南都，仍弛其酒禁，使民卖官鞠<sup>[3]</sup>，十余家共之。更七八十年，官课不亏，有监鞠院官<sup>[4]</sup>。

神宗立，监司建议罢卖鞠而榷酒。时转运司方苦财赋不足，其判官章粢<sup>[5]</sup>大喜，亲至南都集官吏议之。予曰：“南都卖鞠与建都同一敕，今都如旧而罢卖鞠，一不便也。昔南都、西都<sup>[6]</sup>皆卖鞠，近年西都已榷酒矣，此转运司据以为例也。然西都鞠户败折，列状求罢，官不得已而听，今南都鞠户未尝欠官一钱，无故罢之，二不便也。使改法而官获厚利，不顾而行，尚可也；今八家造酒，每家父子兄弟同干酒事者不下三人，三八二十四人，乃能办此课利。今议罢榷酒，欲分城内与河上为两务<sup>[7]</sup>，每务不过监官二人，衙前四人，共十二人，比酒户减半。若较其忠志，公私相远，至于官本，于所费亦复不少，但恐榷酒之利不如卖鞠，三不便也。今不顾三害而决，为之奈何！”粢不能难，但言本司窘迫，万一有利耳。议未决，而予谪筠州，粢遂决成榷法。

后五年，予过南都，闻酒课<sup>[8]</sup>不旋踵而败。又七年，予适预议郊赦，乃罢酒榷而复卖鞠，南都人大喜。

### 注释

[1] 毫：亳州，今安徽亳州市。

[2] 宋：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商丘为古宋国的都城。

[3] 官鞠：曲的繁体字，酒曲，也叫酒母，这里指酒。官鞠，官酒。

[4] 监鞠院官：管理官酒的官员。

[5] 章粢（ji é）：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北宋大臣。

[6] 西都：宋时把今河南洛阳定为西都。

[7] 务：古代官署名。多为掌管贸易和税收的机构。

[8] 酒课：酒税。

### 译文

当年真宗皇帝从亳州回朝经过宋州时，驾临城楼宣布赦令，把商丘定为南都，仍然放松民间卖酒的禁令，让百姓卖官酒，有十多户人家共同从事这一买卖。经过七八十年，官税没有亏减，还设有监院官。

神宗皇帝登基后，监司提出取消民间卖官酒而转为酒由官府专卖。当时转运司正苦于收的赋税不足，京东路转运司判官章粢大喜，亲自来到南都召集官吏商议这件事。我说：“南都民间卖官酒与建都同在真宗皇帝的一个诏令中，现在南都没有改名却把民间卖官酒取消，这是第一个不对之处。过去南都、西都都是百姓卖酒，近年西都已经改为酒由官府专卖，这是转运司用来证明南都也应改为酒由官府专卖的例证。但是西都是因为酒户们的生意做亏了本，上书官府请求不再卖酒，官府不得已才同意了。而现在南都的卖酒户们不曾欠官府一分钱，无缘无故就不准他们卖酒，这是第二个不对之处。假如将南都的酒改为官府专卖能让官府获得丰厚的利润，不顾所有的反对意见而实行，拿也可以。现在南都是八家酒户造酒卖酒，每家父子兄弟从事这一工作的不少于三个人，总共三八二十四人，才能将这个生意做来把税交了还有点利润。现在提出把酒改为官府专卖，还要准备分成城内和河上两个部门，这样一来每个部门不过监管官员二人，衙前差役四人，总共只有十二个人，比起酒户的人少了一半。如果比较起对这件事的尽心尽力程度，做公家的事比做自己家的事，那是远远赶不上的。而且改为专卖后，还要拿本钱出来运作，这笔钱不会少。恐怕官府专卖的利润远赶不上酒户卖酒，这是第三个不对之处。现在不顾这三个有害之处非要改为专卖，这怎么能行呢！”对我的理由，章粢无法驳斥，只是说自己部门现在财政窘迫，万一专卖可以获利而已。可商议还未定下来时，我就被贬到了筠州。章粢于是就将酒改为专卖。

过了五年，我经过南都，听说改为专卖后，很快就把生意做败了。又过了七年，我刚好参与郊祭时朝廷准备颁布大赦事项的商议，提出罢除南都的专卖而恢复酒户卖酒，南都人十分高兴。

### 江东诸县括民马

予为绩溪令<sup>[1]</sup>，适有朝旨，江南<sup>[2]</sup>诸县市广西战马。江东素乏马，每县虽不过十余匹，而诸县括<sup>[3]</sup>民马，吏缘为奸，有马之家为之骚然<sup>[4]</sup>。

予谓县尉惇愿曰：“广西取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为之备可也。吾邑孰为有马者？”惇愿曰：“邑有递马簿<sup>[5]</sup>，岁月远矣，然有无之实，尚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从得马牙人<sup>[6]</sup>乎？”曰：“召猪牙诘之，则马牙出矣。”果得曾为人卖马者，辞以不能，曰：“吾不责汝以马，但为我供文书耳。”曰：“诺。”

州符<sup>[7]</sup>日至县督责买马，乃以夏税<sup>[8]</sup>过期为由，召诸乡保正、副<sup>[9]</sup>问之，曰：“汝保谁为有及格马者？”相顾，辞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谁当知者！弟<sup>[10]</sup>勿以有为无，无为有，则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将使众人诉其不实，而陈其脱落者，不可不实也。”人知不免，皆以实告。复喻之曰：“买马事止此矣。广西取马者至郡，则马出；若不至，则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马者卒不至。

### 注释

[1] 绩溪令：绩溪县令。绩溪，今安徽绩溪县。

[2] 江东：北宋设江南东路，简称江东路，治所在江宁府。北宋江东路辖江宁府和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七州，又南康、广德二军，共四十三县。

[3] 括：搜求。

[4] 骚然：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5] 递马簿：递马，驿马。中国古代历史上为国家传递公文、军事情报、物资等的马。递马簿，登记递马的簿子。

[6] 马牙人：牙人，旧时居于买卖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以获取佣金的人。马牙人，买卖马匹的中间人。

[7] 州符：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凭证。州符，州里传达命令的凭证。

[8] 夏税：夏税，田赋名称。唐起，历代田赋都分夏、秋两季征收，称为夏税和秋税。

[9] 保正、副：保，宋以后地方实行保甲制，若干甲作一保。保正，一保之头叫保正，有正、副之分。

[10] 第：只要。

### 译文

我在绩溪当县令时，适逢朝廷下达命令，要在江东各地买广西所需的战马。江东素来缺马，每县虽然不过十余匹，可因为各县都要搜求民马，加之

官吏借此搜刮钱财，所以搞得有马的人家里动荡不安。

我对县尉郭惇愿说：“广西取马的官员还没有来，办事切忌太着急，慢慢准备也就行了。我们这一县里哪些人家有马？”郭惇愿回答说：“县里有登记递马的簿子，登记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估计上面登记的数量，找到一半是问题不大的。”我叫他马上就把递马簿取来封存起来，以免有人做手脚。我又问：“从哪里找得到马牙人呢？”郭惇愿说：“找买卖猪的牙人来问一问，就找得出买卖马的牙人了。”果然找到了那些曾经替人卖马的人，可是他们都推辞说找不到马。我说：“我不要求你们把马拿出来，你们只是给我提供买卖马的文书就行了。”他们说：“是。”

州里每天发文书到县里督促买马，于是就以该征收的夏税已经过期为由，召集各乡的保正、保副来问他们：“你们各自的保里哪些人家里有合格的马？”这些保正、保副们你看看我，我看你，都说不知道。我说：“保正、保副都不知道，那谁是该知道的！只要不要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如果这样说不知道，我就要让大家来指控你们不老实。因此你们在报告递马簿上登记的那些没有了的马时，不可不如实陈说。”保正、保副们看敷衍不过去，都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各自保里马匹的情况。我又告诉大家说：“买马的事就此为止了。广西取马的官员到了我们这里，大家就把马拿出来。如果他们不来，那就算了。”大家向我拜了两拜，说：“我们这地方的人真是幸运啊。”后来取马的官员最终没有来。

### 评点

《龙川略志第四》追忆的是有关朝廷和地方的司法、外交、行政等事情，其中，《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张次山因一婢知周高刺配海岛》讲的是司法，《契丹来议和亲》讲的是外交，《议卖官鬻与榷酒事》《江东诸县括民马》讲的是行政。作者之所以把这几个看似有点杂的事情放在一卷，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一是所写的几件事都是作者在齐州、南都、绩溪这几个地方任职期间或听说、或亲历的事情，二是这几个看似有点杂的事其实都是统属于朝廷的政事，三是从时间上看，它们都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朝。在《龙川略志》中，作者回忆这一朝代的事只编辑在两卷中，一卷是记述

自己在京城三司条例司任职时的情况，即第三卷，另一卷就是本卷。

本卷的第一篇是《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文中所谈到的“许遵议法”的事在北宋神宗朝还是一件虽小而大的事。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妇女（即文中的阿云）持刀伤人而犯了法，但看似很小的事却引发出朝廷关于法的大争论，并导致一些律法的更改，而且还使得一批朝廷官员因此而遭贬，因而就成了一件大事。且看民国初年蔡东藩的《宋史演义》中有关这件事的记述：“登州有一妇，许嫁未行，闻夫婿貌丑，心甚不平，竟暗挟利刃，潜往害夫。适乃夫卧田舍间，便拔刀斫入，幸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才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断一指而去。乃夫遂鸣官诉讼，知州许遵，拘妇到案，见该妇姿色颇佳，与乃夫确不相配，遂有意脱妇，令她一一承认，当为设法保全，该妇自然听命。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上达朝廷。安石（王安石）谓遵言可行。光（司马光）愤然道：‘妇谋杀夫，尚可减罪么？’安石道：‘妇既自首，应从末减。’光又道：‘律文有言，因他罪致杀伤，他罪得首原，今该妇谋杀乃夫，本属一事，岂谋自谋，杀自杀，可分作两事，得准首原么？’安石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两人相持不下，当即请神宗判断。偏神宗左袒安石，竟准如安石议。文彦博、富弼等，谏阻不从，且将谋杀已伤，按问自首一条，增入律中，得减罪二等，发交刑部，垂为国法。侍御史兼判刑部官刘述，封还诏旨，驳奏不已。安石大愤，请神宗黜退刘述。述遂率侍御史刘琦、钱顗，共上书论安石罪。疏上，安石奏贬琦监处州盐酒务，顗监衢州盐税，并拘述狱中。司马光等上疏力争，乃将述贬知江州。琦、顗照安石议，贬谪浙东。殿中御史孙昌龄，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坐述党忤安石，贬徙有差。”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围绕阿云伤未婚夫一案，王安石、宋神宗不仅坚决支持许遵不按律法的轻判，而且还因此更改成法，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朝廷大员。《宋史演义》虽说因其是文学作品，但关于这件事的记述是基本合于史实的。

因此笔者认为，苏辙回忆这件轰动朝野的事，虽然是在批评许遵妄法，但主要针对的却是王安石。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许遵妄法虽然是引发王安石变更刑法的起因，

但从文中所记来看，尽管许遵妄法的事实俱在，可作者在文章后半部分先借与齐州太守的对话用“虽然遵议则非，而要能活人”来表达对许遵的肯定，接着末尾又写了在筠州遇见许遵的儿子许长庆，了解到许家子弟十多人做官的情况，并感叹说尽管许遵妄法，可由于他救活了人，连老天都眷顾他，再次对许遵作肯定。这样一来，作者对许遵的评判，给人一种既有过又有功，而且功似乎还大于过的感觉。正如文章标题说许遵是“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那样，这由一个“虽”字与一个“而”字构成的转折句式，表明作者对许遵是肯定大于否定的。所以笔者认为苏辙对许遵“妄法”虽然是指责，但有贬有褒，似乎褒还大于贬。

而文中关于王安石的内容则全是对其否定的。作者先记述王安石坚决支持许遵的妄法，然后用一句“自是谋杀遂有按问”来指出王安石更改了刑法，接着便用事实来指出这一更改了的刑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作者首先指出，当时有王安石及其有力支持者宋神宗为了要推广这一更改的刑法，竟然对那些多次审问都不招供的罪犯，也作为有自首情节而减罪，这种做法使得“天下皆厌其说”。接下来，苏辙便以自己在齐州亲历的罪案来证明这种“按问”法的弊端：在盗窃案多发的齐州，由于所有的人都知道“法有按问”，所以一切的盗窃案都可以依此法而减罪。更可笑也更可悲的是，如果有二人作案，先审问的那个罪犯就作“按问”而轻判，后审问的那个人就重判，而根本不管这二人中间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谁的罪大，谁的罪小。再加之官府里参与审案的一类人中，多有盗窃犯的邻里乡亲，他们为了要使其不死，就对其先审问，完全以感情来判案。这是何等的荒唐！从上述记述不难看出，作者对王安石更改刑法是深恶痛绝的。

面对同一“妄法”事件，面对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的许遵、王安石二人，苏辙的态度何以如此迥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说说苏辙为官的根本理念。苏辙同他哥哥苏轼一样，自小在父母师长的教育熏陶下，就树立起“爱民”“忧民”的仁政为官理念。基于“爱民”“忧民”的为官理念，对于朝廷官府所设立的刑法，苏辙认为，它不应该是拿来“胜民”，即打败民战胜民的。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一开篇就说：“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而不能自出也。”苏辙说，古代的圣

人明君治理天下的根本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打败民战胜民而让民服服帖帖。因而他们在设立刑法来应对天下之犯罪行为时，还唯恐民众被刑法所禁锢伤害而不能自拔。所以在具体实施刑法时，又提出了一个“罪疑者轻”的原则，即对那些可判可不判的就不判。而只有对那些“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即罪恶昭彰、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法推脱的罪行，才“不得已而用其刑”。古之圣人明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在“可以刑，可以无刑”的情况下，如果“刑之”，就会“伤于仁”。“爱民”“忧民”的圣人明君怎可用刑法来伤害仁爱呢？当然，对这些“可以刑，可以无刑”的人，圣人明君并不是一放了之，尽管没有将刑加其身，但还是要“以耻劝之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可耻而改过自新。从苏辙的这篇“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作者参加礼部省试写的文章）不难看出，他是十分肯定古代圣人明君在刑法上的仁爱之心的，因而他尽管认为许遵“妄法”，但却对于许遵使犯罪的妇人没有被杀这点委婉地给予了肯定。这种看法，除了从仁爱之心来解释外，还有什么能解说呢？对此，笔者还可举一例来说明。在《龙川略志》第一卷的第一篇《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颖严震皆不杀》中，苏辙就借在梦中见到老子说高颖、严震二人之所以比杨绾长寿的原因就在于“杨绾好杀生，而颖、震皆不杀”，并且还要苏辙好好记住的这一段记述来表达自己为官的仁爱之心。

笔者觉得，虽然许遵活人而子孙多福带有些迷信色彩，但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中的确有这样一种现象，即那些滥杀无辜、害人无算者，其后人有好结果的又有几人呢！

而苏辙之所以对王安石支持许遵“妄法”并修改成法如此深恶痛绝，笔者觉得，苏辙早就认为王安石的行为大都是害民、残民的“成见”，《龙川略志》第三卷中苏辙对王安石新法的抨击就是明证。苏辙尽管不赞成以刑法杀人，提倡对“可以刑，可以无刑”的人不判刑，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罪行都不判，他认为，那些“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的罪行是必须要依法“刑之”。而王安石一修改成法后，结果是再有天大的罪，只要一“按问”，就可以“得减罪二等”。这样一来，刑法还有什么作用呢？天下岂不成了罪恶公行的乱糟糟的社会么！这样的社会，老百姓怎么能活呢！王

安石还对反对他更改刑法的朝廷大臣残酷打击报复，贬谪、下狱，手段可谓凶残之极。

综上所说完全可以表明，正是仁爱待民的为官理念，使得苏辙在记述许遵“妄法”时，表现出了对许、王二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在《张次山因一婢知周高刺配海岛》中，苏辙之所以对作为一县之长手握刑法权的张次山却不合规矩地去揭发周高乱伦，把周高判刑将其刺配海岛并致其死去很不以为然，就是因为他认为对周高不合伦理的行为在“可以刑，可以无刑”情况下却“刑之”了，这样做是有违为官的仁爱之心的。

在《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张次山因一婢知周高刺配海岛》和卷第一的《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颖严震皆不杀》中，可以看出苏辙似乎表达出一种不赞成以“刑”来“杀生”的态度，他说许遵“能活人以得福”，他对将有不端行为的周高判刑至死的张次山大不以为然，他借老子的口说“杨绾好杀生”，应该说都是出自这种态度。

写到这里，笔者便不由得联想到当今社会关于如何看待律法中死刑的议论。以刑法来实现“杀人抵命”，自古以来被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尽管有“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古训，尽管有苏轼、苏辙兄弟在《刑赏忠厚之至论》说的“尧曰宥之者三”、“刑之”就会“伤于仁”，但死刑是不曾被动摇过的。可是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却不少人对这天经地义的死刑质疑。这些质疑者反对死刑的理由是什么呢？笔者阅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尽管各自所说有些不同，但归总起来大致有几条：一是废除死刑，能教化人们尊重生命和敬畏生命权，减少人为剥夺生命的不人道行为；在所有的人权中，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在所有的方案穷尽之前，也就是只要有可替代的方案，都不应以剥夺某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权的方式来保护另外一部分公民。二是废除死刑，可以消除因死刑制度缺陷产生误杀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判决都是有可能误判的，犯人一旦被处死，意味着错误将不可弥补，这种令人揪心惨痛的案例，从古代的窦娥到今天的聂树斌，数不胜数。三是死刑不能使被规定为死罪的严重犯罪下降。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杀人必偿命，而死刑本身就带有复仇情绪，仇恨之下甚至掩盖了杀人背后的原因。古代的各种死刑、酷刑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仇恨心理来进行暴力统治，血腥恐惧之下又会刺激出新的暴力，任何犯罪都不曾因死刑而得到制止，尤其是乱世中的

死刑，明显就是一种镇压手段，法律是文明的产物，不该是以暴制暴，更不该被政治利用。四是死刑断绝了罪犯改过自新的道路。笔者觉得，废除死刑论者还该加上一条理由，那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都倡导仁爱，反对杀生，这也是苏辙、苏轼兄弟所秉持的为政理念。尽管笔者目前仍还觉得以刑法来实现“杀人抵命”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只限于以杀人为目的且致人死命），也觉得在当今中国如果废除死刑可能是弊大于利，但我也相信，随着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仁爱之心逐渐广泛深入人心，废除死刑必将成为现实。到那时，生活在安定祥和社会中的人们，不知要对历史上那些秉持仁爱为政理念、不赞成以刑“杀生”的苏辙们表示多大的敬意啊！

《契丹来议和亲》是说外交。苏辙在文中用对比的手法，记述了王安石、宋神宗与前朝吕公、宋仁宗处理外交事务的不同方式与结果。在处理涉及国家疆土的大事上，王安石却“谓咫尺地不足惜”，使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的宋神宗竟对契丹使者说出“此小事，即指挥边吏分画”这样的大损国家主权话语，弄得想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司”也“卒莫能得”。而在处理契丹来议和亲的事情上，宋仁宗采纳了吕公“徐议以答之”的意见，沉着应对，结果契丹使者失败而归。同样是宰相，同样是皇帝，同样是面对契丹使臣，可处理方式与结果迥异，且作者对王安石、宋神宗的贬与对吕公、宋仁宗的褒，态度鲜明。再者，本文本来是谈“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可却以“契丹来议和亲”为标题，这也充分表明了作者的褒贬态度。

但笔者觉得，苏辙记述文中的两件事，并不仅仅只限于对这两件事的参与者表褒贬之情，联系文中他对“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这件事所发表的处理意见以及他其他所写的关于对外交问题的一些著述，可以表明他对外交事务是比较重视并能妥善处理的。除了本文他对“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所发表的“今两朝地界犬牙相入，本非朝廷所详。若以实答之，以付边臣，议定以闻，边臣以疆场为职，谁敢不尽力？而其可否尚在朝廷。事莫便于此。何乃面与之以之决？”妥善处理意见可以作为明证外，笔者另举一例说明。

北宋王朝从建国起，就面临着处理契丹、西夏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和战问题，而其主流则是用岁输金帛以求和，这种一味求和的外交政策最后换来的

是北宋王朝的国破人亡。这样的外交政策不足为训。外交事务关乎国家的尊严与利益，作为大宋朝臣民的苏辙刚一迈入仕途，就对处理外交和战问题发表自己与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仅二十来岁的苏辙在《进策五道·民政下·第四道》中对朝廷“每岁委百万之资以予人，……特幸其一时之安，而欲得其间隙之际以治天下”的外交政策作了否定，提出以赂契丹、西夏为手段，让其放松对中国的戒备，而中国则准备精锐兵马一击致胜的应对方略。他认为，对契丹、西夏要“礼之当加恭，待之当加厚，使者之往，无求以言胜之，而其使之来者，亦无求以言犯之。凡皆务以无逆其心而阴堕其志，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内，搜士拣马，择其精锐而损其数，以外见至弱之状，使之安然无所顾忌，而益以怠傲。不过数年，彼日以无备，而吾日以充实。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而有无厌之求。彼怠而吾奋，彼骄而吾怒。及此而与之战，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

其后，苏辙在元祐朝为官期间，先后写了《论兰州等地状》《论西边警备状》《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西边商量地界札子》《论西事状》等二十篇关于处理与西夏、契丹二国外交关系的文章。元祐四年，他还以贺辽国生辰国信使的身份出使契丹。苏辙在所写的关于处理西夏、契丹二国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如在《论西边商量地界札子》中提出在商量处理两国地界应本着“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的讲信义原则，如果“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又如在《论西事状》中，提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审行事之得失，然后料虏情之所在，定制敌之长算”的四条应对寇边之敌的意见。（《唐宋八大家文钞》卷148评价《论西事状》说：“此状情事本末及制胜处，元祐第一奏疏。”）苏辙处理外交关系的文章与意见，不仅有用于千年前的宋朝，即使在今天，那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如果能读读，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本卷中的《议卖官鬻与榷酒事》《江东诸县括民马》都是讲地方行政官员的行政，内容上虽然一为榷酒一为括马而不相同，但在牧民上的作为上却是一反一正对比鲜明。章粢为了在民身上夺利，不听反对意见，一意孤行，最后以失败告终，苏辙面对朝廷诏令，妥善处置，一境安宁，百姓称颂。凡

对于与民夺利的为官行为，苏辙在为官期间从始至终都坚决反对，上卷对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本卷中对章粢榷酒的反对，均是如此。对这点，笔者在卷第三的简评中已谈得较多，这里不在评述。

而对苏辙处理括马一事，笔者还很有些感触。“括马”是朝廷为广西征战而在各地搜集马匹的诏令，作为一县行政长官的苏辙那是必须要执行。但在地方括马，势必要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如何做到既要保证朝廷布置的任务得以完成，又能不扰民，苏辙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文章一开始，作者便以“诸县括民马，吏缘为奸，有马之家为之骚然”的记述表达了对各县官吏以括马为由搜刮马财而弄得百姓惊恐不安这一行为的厌恶，接下来，便写自己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召集各乡保正、副落实任务的具体过程，最终以“买马事止此矣。广西取马者至此，则马出，若不至，则已矣”这样不扰民的话语安抚了民心，得到了大家“邑人幸矣”的由衷感激，而整个括马事情最终得以安然解决。笔者觉得，苏辙能圆满处理好这一棘手的问题，除了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外，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为官理念。苏辙的这一理念及其做法应该是值得今天以“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为宗旨的各级官员参考乃至效仿的。

综上所述，作者在本卷中通过追忆自己在熙宁、元丰年间在地方上任职时或听说、或亲历的有关朝廷和地方的司法、外交、行政等事情，表达了自己为国为民的为官理念，尤其凸显了自己全心爱民的拳拳真情。而在行文上，主要用对比手法来增强表达效果：有“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与王安石制定“按问”之法而“天下皆厌其说”的对比，有张次山因一婢知周高刺配海岛与苏辙自己“使我为长清，决不举也”的对比，有宋神宗、王安石随意处理与契丹的边界事务与宋仁宗、吕许公沉着应对契丹来议和亲的对比，章粢夺民之利的榷酒与苏辙对此坚决反对的对比，有“诸县括民马，吏缘为奸，有马之家为之骚然”与苏辙自己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圆满处置括马的对比。这些对比突出了主题，表达了鲜明的爱憎，其写法很值得学习。

胡先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 《苏诗补注》前言（下）

王友胜

## 三、《苏诗补注》的内容与特点

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侧重在删补施、顾注，分卷、编次悉依其旧，收诗略有增损，大体以恢复宋椠原貌为要义；查慎行《苏诗补注》则不仅分卷、编次与收诗，与宋刊施、顾注本比较有很大的改观，而且在注释上也有很多新成就、新特色。现就浏览所及条列于下：

### （一）补录被新刻本删削的施、顾原注

邵长蘅等肆意删落施、顾原注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对勘宋椠本加以补录的当以查慎行、翁方纲二人用力最勤，收获最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谓“慎行是编，凡长衡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众所周知，南宋施、顾注本以题下注最有价值，邵长蘅等人对此的删削力度也最大，本文即以此为例，来看查慎行补录施、顾原注的贡献。如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邵本卷十二将施、顾题下注有关司马光生平的四百余字悉行刊落，仅于“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句下，保留施、顾注引《渑水燕谈录》60余字以求简省。实际上《渑水燕谈录》卷二有关司马光的这段文字仅载其以才德闻于朝野之事，用来解释此二句尚可，未能记述司马光一生之梗概。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一五回诗注“司马君实”条，将施、顾题下注原文径予补录，既大体保存了宋注原貌<sup>[1]</sup>，又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理解苏轼原作意旨极有帮助。他如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施、顾题下注140字，详具吕希道字号、家世、及第时间、仕履、政绩，对其雍容宽厚，刚正守节的品格尤多赞赏。检《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均无吕希道之传，故这段材料还可补史之缺，其重要性至为显

然。而邵本卷三于该诗题下注仅节录三十字：“吕希道，字景纯，河东人。丞相文靖公之孙，翰林侍读学士公绰之子。历知解、和、滁、汝、澶、湖、亳七州”。查氏《补注》卷六同诗注“吕希道”条，则检核其所得宋椠影钞本，予以补录原文，颇为可贵。他如卷六《送文与可出守陵州》注“文与可”条，补录被邵长蘅删削的施、顾原注70余字，亦复如此，兹不备叙。

### （二）驳分类注之讹误

前文已述，查氏对分类注本颇为不满，尝批谬指误，积稿盈卷。故《补注》一书对分类注误注、失注之辩驳尤为有力。如卷六《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注“三将相”条云：

按《宋史·宰辅表》及《宰辅编年录》：吕蒙正于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学士参知政事，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莱国公。吕夷简于仁宗天圣七年自龙图阁直学士除同平章事，景祐元年封申国公。吕公弼于英宗治平二年自权三司使，枢密直学士除枢密副使，四年进枢密使。诗中所称“三将相”谓蒙正、夷简、公弼也。王氏注于蒙正、夷简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著。按公著于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诗熙宁中，其谬戾昭然。《施氏补注》（按指邵本）复踵其讹，今为改正。

按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作于熙宁三年（1070），考《宋史》本传及《宋宰辅编年录》等书，知吕公著迟至元祐元年（1086）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共为宰相，废除新法。故查氏的考证非常精确，驳分类注极为有力。又如卷一四《同年王中甫挽词》注“十五人”条引王应麟《困学纪闻》驳分类注之讹误亦可信从。

查氏在未看到新刻本，未得宋椠影钞本之前，主要读分类注本，相习已久，知之甚深，故能辨其要害。此诚如柳宗元喜读《国语》而能作《非国语》也。前修或未密，后出而转精，作为补注，辨前人之误，首当其冲。

### （三）驳史籍之误

查慎行曾为翰林院编修，参与过《佩文韵府》等大型官书的编撰，对古代典籍较为熟悉。在补注苏诗的过程中，查氏常能补史籍之疏漏，驳史籍之讹误。如卷八《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对欧阳修卒年的考辨：“按《欧阳公年谱》：公于熙宁辛亥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颍，明年壬子闰七月薨，年六十六。《宋史·神宗本纪》谓公薨于八月，讹。”按关于欧阳修的卒年，《宋史》本传仅云：“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师，益曰文忠。”未详具具体时间。查氏引南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定欧阳修去世时间为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而以成书于元代的《宋史·神宗本纪》所定熙宁五年八月为误，虽孤证不为定说，但提出问题，引人思考，故不谓无识。又如卷一五《阳关曲三首》其一《赠张继愿》注“受降城”条，引《旧唐书》（按卷九三）所载张仁愿筑城于神龙三年（707）为准，而驳《元和郡县志》所载景云三年（按景云实仅二年）之误，其情形亦类同上举之例。

### （四）阐释诗旨，考辨诗题

查氏注苏诗，常引笔记、诗话及史书中的材料阐发诗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如释卷一二《王莽》“入手功名事事新”句及《董卓》“岂信车中有布乎”句，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陆游语云：“王性之谓东坡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岂信车中有布乎？盖指介甫争易市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经此一注，读者则知前诗以王莽比王安石，后诗以吕布比吕惠卿，既贴切于彼此的姓名，又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吻合。读者只要联想到汉代王莽、吕布之所作所为，则对苏诗所寄寓的讽意不难理解，此可谓以史证诗，诗史互证之范例。

再看查氏对诗题的考辨。如卷一《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查氏引《汉书》（按应为《后

汉书》）“建安二十年”条、《三国志·魏书》、葛洪《神仙传》及乐史《太平寰宇记》考证出张道陵所寓非安乐山，实为鹤鸣山。又引王象之《舆地碑目》、邓绾《吏隐阁记》及黄庭坚语，考证出安乐山乃唐高宗时真人刘珍（字善庆）飞升之所。再引曹学佺《名胜志》，考证安乐山上有树，叶长如荔枝，上有文如虫篆之事。最后查氏作出结论：“据此数说，则安乐山仙迹乃刘善庆，非天师也。先生舟行过山下，一时所闻，出长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故为考证如此。”此处考辨苏轼诗题之误，广征博引，穷究典源，立论周详严谨，当可信从。《补注》中诸如此类的考辨指不胜屈，充分反映了该书寓辨证于注释的写作特色。

### （五）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

南宋施、顾编年注非常重视注释诗题或诗中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查慎行《苏诗补注》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对前人失注、误注者及有涉人物名同实异者更为关注。如卷九《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诗题所涉释可久，事迹鲜为人知。南宋编年注本、分类注本均无注，有碍读者理解诗意。查氏补注云：

《咸淳临安志》：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两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数升，以瓶贮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用，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师可久，钱塘钱氏子。天圣初，得度，学教观于静觉。喜为诗，居西湖祥符。苏轼元夕去从者，独行入师室，了无灯火，但闻檐葡余香，叹仰留诗云云。晚年送客不逾阈，如此十余年，窗外惟红蕉数本，翠竹百个，一日谓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几皆验。

查氏引《咸淳临安志》详具可久生平大端与简朴的生活习性，引《武林梵志》考述可久与苏轼之交游及竹蕉应验之事，凡此不仅对理解诗句有所帮助，就是对研究可久其人其事亦不无裨益。

查氏长于考释地理，尝于《略例》中自云：“古今沿革，考索最详。”这既与他尝协助徐干学编撰《一统志》，受学著名地理学家顾祖

禹有关，又与他一生游历极广有些联系。其《补注》卷首附《采辑书目》六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山经、地志与图经之类，所引方志尤多。如卷五〇《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其一注“万州”条，引《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备陈万州自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引《名胜志》注明岑公洞的方位与大小，引《图经》考辨岑公的名号、籍贯与事迹，引《舆地碑目》详述万州有段文昌《岑公洞记》、黄庭坚《题名》等石刻。此段注文引录《舆地记》等五种地理书籍，长达 170 余字，详细注释了万州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与人文景观，材料周详，层次清楚。仅此一条，足可显示查氏精熟史地的渊博学识。

### 四、《苏诗补注》的其它成就

《补注》所取得的成绩非常全面，除了前面讨论的补注苏诗的独特贡献外，还在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等方面有所作为，下面试分而论之。

#### （一）系年

南宋施、顾注本对苏诗作了大面积的系年，然或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疏漏讹误尚复不少，其突出者如不收《南行集》中诗，无端将苏诗系年推迟二年，又《和陶诗》二卷亦不编年，混杂其间，殊无伦次。查氏《补注》承源接流，又求之苏轼本诗及手书真迹，参以同时诸公文集及宋元诗话、题跋。年经月纬，重新编排。约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宋施、顾注本重新编排，二是将施、顾注本未收之诗尽量系年，散分各卷。

施、顾注本前 39 卷编年诗，查氏《补注》改编在卷三至四五，编次大体依旧，略有调整。如卷三《客位假寐》诗，为苏轼不满于凤翔知府陈希亮而作，施、顾注本误陈希亮为陈襄，编在猝杭时，查氏据邵博《闻见后录》卷一五所载改回签判凤翔时。如卷八《盐官绝句四首》，施、顾注本讹编在《鸦种卖行》后，查氏将其提前，编在《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后。卷九《癸丑春分后雪》诗，施、顾注本误编此诗在是年立秋后，查氏则将这些诗按《栾城集》编次，移置前卷。卷一九“在狱出狱”诗 11 首，施、顾注本编卷四〇遗诗

中，查氏从编年例，编在湖州以后。<sup>[2]</sup>卷三〇《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到《次韵宋肇游西池》八首，为苏轼元祐 3 年（1088）正月权知贡举时所作，施、顾注本讹编上卷，查氏据年月改正。

施、顾注本卷四十收遗诗 29 首，元祐三年作翰林贴子词 54 首，查氏《补注》将遗诗中《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等大多数诗系年入正集，《刘顗宫宛退老于庐山石碑……》（诗缺）入卷四七补编诗中，《老翁井》、《虚飘飘》其一入卷四九他集互见诗中。贴子词 54 首被邵本删去，查氏补录于卷四六（另收致语口号 11 首）。施、顾注本卷四一、卷四二为和陶诗 107 首，不编年，邵本仍其旧（分类注本不收和陶诗），查氏《补注》将其系年编在卷三五至四五各卷，是为苏轼和陶诗首次系年。其《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自云：

“《和陶诗》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1094）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sup>[3]</sup>除此以外，对其中不能确指年月者，系于相关诗后，按语说明。

除改编施、顾注本外，查氏还将其未收之诗系年后编入正集。苏轼《南行集》宋时有单行本，故施、顾注本径以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苏轼赴凤翔为编年之始。然《南行集》后来失传，其诗多被明人辑入《续集》、《外集》中，查氏则将这些诗按《栾城集》编次，以《郭纶》压卷，《初发嘉州》以下次之，编为 2 卷凡 81 首，冠于全集之首，故《补注》以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南行赴京为编年之始，时间上较施、顾注本提前二年又一月。

宋荦所辑《苏诗续补遗》2 卷 446 首，查氏将《送淡公二首》《游杭州山》《雷州八首》《池上二首》等 89 首他集互现诗编卷四九、卷五〇<sup>[4]</sup>，将《戏足柳公权句》《送别》《寄周安孺茶》等 19 首无法系年的诗编入卷四七，其余绝大多数诗均依大体按年编次的《外集》顺序，分编各卷。

通计《补注》前 45 卷，共得编年诗 2432 首，比南宋施、顾注本前 39 卷编年诗 1884 首多出 548 首。

除以上诗歌系年以外，查氏又作《苏诗补注年表》，约六千字。主要节略王《谱》、傅

《录》而成，后附加苏辙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事迹。

## (二) 补遗

苏诗数量繁富，但囿于党禁，散佚亦多，清人宋荦有所辑补，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查慎行留心典籍，续有增补，其所辑佚诗编排在卷四六至四八中。卷四六除补录被邵长蘅删去的施、顾注本中翰林贴子词 54 首外，另从苏轼全集辑得《兴龙节集英殿宴口号并致语》等，是为口号入诗集之始。<sup>[5]</sup>卷四七至四八除收《苏诗续补遗》中无从编年的 19 首诗外，查氏又另为辑录佚诗 137 首，这是查氏补遗的突出贡献。查氏补遗所依据的文献及所辑诗数量是：明毛九苞编《重编东坡先生外集》82 首、朱存理《铁网珊瑚集》4 首、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3 首、孙绍远《声画集》1 首、赵令畴《侯鲭录》1 首、何薳《春渚纪闻》4 首、邵博《邵氏闻见后录》1 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5 首、魏庆之《诗人玉屑》1 首、阮阅《诗话总龟》1 首、葛立方《韵语阳秋》1 首、陈岩肖《庚溪诗话》1 首、周紫芝《竹坡诗话》1 首、惠洪《冷斋夜话》1 首、蒲积中编《岁时杂咏》4 首、曹学佺《名胜志》2 首、袁綱《枫窗小牍》1 首、《锦绣万花谷》2 首、《临安志》1 首、《武林梵志》2 首（其中 1 首又见《咸淳临安志》）、《金山志》1 首、《吴兴志》1 首、《吴兴掌故集》1 首、《京口三山志》1 首、《赣州旧志》1 首、《池阳后集》2 首及《晚香堂苏贴》3 首，本集与黄师是尺牍 1 首、苏轼《大全集》2 首，又以《黄泥坂词》、《清溪词》、《上清词》及《醉翁操》为诗从本集收入，《刘顥宫苑退老于庐山……》（题存而诗亡）以《栾城集》考之为苏轼诗而收入。以上凡 137 首，均首次入苏轼诗集。其辑补之功，至为显然。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氏《补注》在将一些不见于诸刻本的苏轼诗收入诗集的同时，也把大量本非苏轼所作的伪诗赝作辑入诗集，鱼目混杂，论者引录这二卷诗尤须慎重。如卷四八据《锦绣万花谷》（按在后集卷三）所收《西湖绝句》当为南宋杨万里诗，见《诚斋集》卷二三，题作《晚出净慈送林子方》（其二）。同卷据《京口三山志》所收《宝墨亭》诗当为北宋苏舜钦作，见《苏学士集》卷八，题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对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曾批评：

至于所补诸篇，如《怪石》诗指为遭忧时作，不知《朱子语类》谓二苏居丧无诗文。《鼠须笔》诗本轼子过作，而乃不信《宋文鉴》。《和钱穆父寄弟》诗已见三十一卷，乃全篇复见。《元祐九年立春》诗即《戏李端叔》诗中四句，已见三十七卷，乃割裂再出。《双井白龙》诗，《冷斋诗话》明言非东坡作，乃反云据以补入。甚至李白《山中日夕忽然有怀》诗，亦引为轼作，尤失于检校。如斯之类，皆不免炫博贪多。

四库馆臣所指出的这几首诗究竟是否为苏轼所作，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他们指出查慎行“贪多炫博”，这倒是实在的话。查氏确有这种失误，比如有时还将一些佛教偈颂、歌辞也一并辑入集中，殊失断限。

## (三) 辨伪

查氏《补注》在补注苏诗时即以长于考辨人物、地理而显示出独到的特色。非惟如此，他在考辨苏诗重出、伪作方面也体现出深厚功力，可算是古代第一个对苏诗进行全面考辨真伪的学者，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关于苏诗窜伪的情况，查慎行在《补注》卷四九按语中说：

唐宋名家诗文，间有互见他集者……。但未有舛谬混杂几及百篇，如东坡诗之甚者也。端叔有言：先生自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盖绍圣以后严禁苏氏之学，至淳熙初禁乃驰，后人得公手迹便采入公集，承伪数百年，注者与读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驳正，非敢一毫臆断，悉从诸家文集、诗话一一搜抉，校对其雷同者，另编二卷。

查氏指出苏轼诗集伪诗非常的多，并分析了致伪的部分原因，与苏诗的大致情况相符。他检核诸家诗话与别集，考订苏诗互见于他家的重出作品，得 90 首，编为 2 卷，每首后附注此诗亦见某集，便于读者察考。所重出作家中，唐代有李白重 1 首、顾况重 1 首、白居易重 1 首、孟郊重 2 首、李德裕重 1 首、陆龟蒙重 1 首、僧人怀素重 1 首，其余所重出者均为北宋时苏轼的师友，其中苏洵重 2 首、欧阳修重 1 首、王安石重 2 首、黄庭坚重 27 首、秦

观重 25 首、晁端友重 1 首、蔡肇重 1 首、刘攽重 1 首、沈辽重 1 首、郭祥正重 1 首、朱定国重 1 首、参寥重 2 首、辨才重 1 首、关子容重 2 首。查氏不仅指出苏诗中重出的现象，还能进行认真的甄辨，对历代传刻所造成的讹误，凡能明其归属者，考辨按断是非，态度分明；难定归属者，则列文献资料出处，以资他人旁证；对诸家意见歧异者，亦备列诸说，让人思考。如《补注》卷四九《白鹤吟留钟山觉海》诗，查氏于诗后按语考云：“右一首见王半山集第二卷中，题云《白鹤吟示钟山觉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二句，不知何以脱落，又复讹入先生集，今驳正。”按检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三，此诗题作《白鹤吟示觉海元公》，首二句下正有上引两句，惟查氏所勘版本或有不同，故所云诗题与卷次与朝鲜活字本小异。查氏对自己的考辨结论非常自负，卷五〇《寄欧叔弼》考证出此首实为《栾城集》中《赠蔡州壶公观刘道士》七律之后半首，然后说：“此种缪伪向来注家刻本从未有勘正者，余始发之，览者亦可识其苦心矣。”

《补注》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一些。如仿刘辰翁评点杜诗例，将与苏轼同时唱和之作，检核作家文集，概予附录；如有集而不传，传而不远的作家，也尽量广罗他书，予以采用。全书凡附录 77 人 910 首唱和诗。所附之诗，概不注释。其中附苏辙诗 499 首、黄庭坚诗 74 首、晁补之诗 37 首、陈师道诗 24 首、秦观诗 23 首、王安石诗 14 首、参寥诗 18 首。所附之诗既可以与苏诗原作相互发明，又对研究作家彼此之间的交游、思想与创作都有帮助。再者，一些作家文集不传或传而有佚，故所附之诗对后人来说还有辑佚补缺的作用。苏诗历代诸家注均未附唱和诗，此亦查慎行之首创。如卷二《次韵水官诗》所附苏洵《水官诗》，《嘉祐集》失载，查氏从分类注中辑出，颇为可贵。另外，查氏《补注》还能经常证引地志、石刻、笔记、诗话等史料对苏诗进行文字校勘，校改历代版本传刻中的讹误。如卷一《过宜宾见夷牢乱山》诗引《方舆胜览》校改诗题诸刻本作“夷中”之误；卷二《正月二十一日往岐亭郡人……》引石刻校改诗题诸刻本作“二十日”之误；卷三八《南康望湖亭》诗引周辉《清波杂志》定诗题当作“重湖亭”。凡此等等，都

可见查氏在苏诗文字校勘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 五、《苏诗补注》的评价

综上所述：《补注》征引广博，注释详明，既长于考释人物、地理，又善补前人之疏略，纠前人之谬误，在补录施、顾原注，保存公（苏轼）自注等方面功绩尤卓，做出了独特贡献，在关于苏诗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诸端亦成绩不菲。清代中后期的注苏者都很重视查慎行的补注，翁方纲《苏诗补注》继续补录查氏补施、顾原注所未备者，冯应榴的《合注》以集施、顾注、分类注与查注为首任，王文诰的《集成》录查注也相当多。查氏《补注》在后世虽受到过一些责难，但总的来说评价都相当高，不少人将其与宋代的编年注、分类注相提并论，如钱大昕《苏文忠诗合注序》说：“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今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冯宝圻《新修补苏文忠诗合注序》亦说“注苏诗者，王龟龄、施德初、查夏重三家皆善。”（皆见《苏轼诗集合注》附录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在详细论评了《补注》的功过得失后，也作出了高度评价：

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

四库馆臣们说这段话之前，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合注》与王文诰《集成》均未问世，故在当时来说，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正因为查慎行的补注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后人便将查注从施、顾注中析出单独刻印，有点类似后人将《文选》李善注从六臣注中析出独立刊刻。但亦有学者颇以两读为病，冯应榴《合注·凡例》即谓“初白翁原本先列施注，后列补注，后人专以查注刊行，读者往往有偏而不全之憾。”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亦曾感慨“刊本不与施注合刻，翻阅为难”，并拟将施、查二注合刊，因“刊费繁多”而未遂。

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补注》在取得以上各种成就的同时，其疏漏、讹误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应，后人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适当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列举其“编年有差”、“校讎为舛”、“体裁未明”、附诗不当及补诗有误等五种失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查氏注苏诗”条，批评查氏注《和陈述古拒霜花》诗引《古灵先生行状》，将陈襄误作陈尧佐之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五注《赠袁陟》诗，谓邵长蘅《施注苏诗》已详具袁陟生平，批评查氏于人物失考，王文诰《苏海识余》卷二批评查氏引伪《陈无己诗话》（按即《后山诗话》），谓其“不独疵累本集，即无己亦冤也。”<sup>[6]</sup>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序》批评其“所据多短书小说，纰缪弥复不少”，并特作专书，补其阙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宋刊施顾注苏诗跋》亦曾批评查氏补录施、顾原注未备，其意见极为详致，现引录如下：

查氏《补注》深悟宋、邵之非，于是奋然取其删落者而逐卷补录之，其志未尝不嘉。然余取箧藏影宋残帙校之，则又有大谬不然者。如卷一一《苏潜圣挽词》，宋本题下固详着其名籍、官职凡37字，而查氏乃注云：“爵里失考”。卷二五《送陈侗知陈州》题下注“侗与东坡为同年”凡87字，邵氏删之，查氏亦“失考”；诗中注文凡二十五事，邵氏只取六事（亦删节其文），查氏补者三事。然“铁牛”一条施注引《唐文粹》贾至《铁牛赋》，而查氏则引《太平寰宇记》。其余类此正多，岂查氏于宋本曾未亲见耶？抑就宋本更有所取舍耶？

傅氏的猜测颇有一定的根据。查慎行所得为影钞残宋本，且所存之卷亦多脱误，断碑残碣，几与无本相埒，故谓其“宋本未亲见”，虽不属实，但大致不差。再者，查氏认为施、顾原注存在着“有诗意本了然，多添注脚者；有所用非此事，强为牵率者；有一事经再三用，稠迭蔓引者”，颇以“冗踏”、“芟之不胜芟”<sup>[7]</sup>为病，故查氏对宋本“更有所取舍”亦不无可能。

前人所指摘《补注》谬误仅极少部分，其失误之处尚有很多，如该书卷四七所收补编诗

《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据《宋拓西楼贴》此诗真迹及明刊《外集》卷三，“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十二字乃另行书于诗末，实为苏轼手录挽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时间，查氏阑于诗题，王文诰《集成》卷五据此编入治平元年（甲辰），遂以讹传讹。按亡伯指苏轼的伯父苏涣，卒于嘉祐七年八月，诗当写于苏涣卒后不久。除此以外，《补注》有时亦将诗叙阑入诗题，如《外集》卷六《题沈君琴》诗前有叙“武昌主簿吴亮君采”云云117字，查氏《补注》收录此诗，以诗叙为题，又误“元丰六年”为“元丰五年”。

### 注释

[1] 按查注仅补245字据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三同诗所补注，尚缺191字。

[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云：“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定，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如《御史府》诸诗，不欲传之于世，《老人行》《题申王画马图》非其所作，故皆无之。”故知以上诸诗本不在《东坡集》中，施、顾作为遗诗编在卷四〇。

[3] 按查氏《补注》收和陶诗与施、顾注本不同，除在诗的分合上不同外，又补录《归去来集字十首》《和东方有一士》及《和刘柴桑》，删去《和归去来兮辞》，故为136首，较施、顾注本107首多出29首。

[4] 按查氏《补注》2卷互现诗仅《老翁井》一首采自施、顾注本卷四〇，余皆出自《苏诗续补遗》2卷。

[5] 按诗题曰“口号”者，始于梁简文帝，唐张说、杜甫亦有，参赵翼《陔余丛考》“口号”条。但宋代教坊之所调“口号”则与此不同，通常是在乐工所唱诗之前有丽辞一段，谓之致语，后继以诗一首，谓之口号。《宋史·乐志》十七即云：“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

[6] 按《后山诗话》在宋时已多疑为伪作，郭绍虞《宋诗话考》卷上“《后山诗话》”条谓“此书既非师道手定之稿，又有后人窜乱之迹，故虽获流传而谬误特多。”

[7] 均见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苏诗补注》卷首，乾隆26年香雨斋刻本。

原刊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社科联副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 第一章 “经纶不究于生前”（四）

曾枣庄

在苏轼出任地方官这几年，不仅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斗争激烈，而且在变法派内部争权夺位之争也愈演愈烈，反王安石者愈来愈多。神宗不得已，乃以王安石知江宁府。王安石举韩绛代己而以吕惠卿参知政事。吕惠卿是靠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为副相后，一面与韩绛争权，一面防止重新起用王安石。韩绛自知不是吕惠卿的对手，暗请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出知陈州。吕惠卿在陈州攻击王安石“罔上要君”，加之王安石之子死，悲痛不堪，再请去位。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再未还朝。王安石罢相后，围绕变法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成排斥异己的竞争。熙宁年间苏轼反对新法，虽然被王安石排挤出朝，但王并未迫害他，其间一任通判，三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罢徐州任，改知湖州，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仅仅三个月，七月二十八日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了。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在《湖州谢上表》（卷 23）中发了两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

“生事”等语刺痛了投机新法的人，他们就群起攻击陷害苏轼，连章弹劾。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丛书集成初编本），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怨望皇

上，讪谤谩骂，无人臣之节。《东坡乌台诗案》引舒亶札子云：

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议之入，固为不少，然其大不过紊乱事实，造作诡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袁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

乌台诗案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虽然今已失传，但据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所提及的 43 首诗、14 篇文章，至今仍存。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诗文中确有专门讽刺新法的，如《戏子由》《寄刘孝叔》《山村五首》等诗。但有的纯粹是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卷 8）指控为对神宗“不臣”。原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据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本）载，元丰初，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时相语默。章惇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惇尝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这首诗描写了两株桧树“凛然相对”“直干凌空”，根到九泉，亦无曲处的雄姿，至多不过是苏轼借此抒发自己挺拔不屈的性情而已。

说来滑稽，苏轼诗文的第一个注本应推《乌台诗案》，注者竟是苏轼的政敌和他自己。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讪，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存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

《乌台诗案》的内容由两部份组成，一是李定、舒亶诸人弹劾苏轼的札子，是对苏轼诗文的曲解；二是苏轼自己的供词，虽然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但也可看成是苏轼对自己所作诗文的解释。《乌台诗案·与王诜往来诗赋》交待《戏子由》诗云：“‘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意取《东方朔传》‘侏儒饱欲死’及《滑稽传》‘优旃谓陛楯郎，汝虽长，何益？乃雨立。我虽短，幸休居’，言弟辙家贫官卑，而身材长大，所以比东方朔

陛楯郎，而以当今进用之人比侏儒优旃也。又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时朝廷新兴律学，轼意非之，以谓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而忘诗书，故言我读书万卷，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君尧舜之术也。又云‘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所至苛细生事，发谪官吏，惟学官无吏责也。弟辙为学官，故有是句。又云：‘生平所慚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笞。’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笞此等贫民，轼平生所慚，今不耻矣，以讥讽朝廷盐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是时张靓、俞希旦作监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与争议，故毁之为阳虎也。”以上是诗，《与王诜往来诗赋》又交待《杞菊赋并引》：“不合云：‘及移守胶西，意其一饱。而始至之日，斋馆索然，不堪其忧。’以非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斋厨薄事皆索然无备也。”又云：“轼又作《超然台记》云：‘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意言连年蝗虫、盗贼、狱讼之多，以非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所致。及云‘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以非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以上是文。苏轼一生还从来没有这样系统详尽地解释过自己的诗文，数集量竟达五六十篇。

朝臣对乌台诗案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李定、舒亶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王珪等乘人之危，推波助澜；有的人避之惟恐不及，生怕连累自己；但敢于起来营救苏轼的人也不少，乌台诗案未能改变师友门生对苏轼的态度。

苏轼的前辈张方平，这时退隐南京，愤然上书营救苏轼。其《论苏内翰》（卷 26）云：

今日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知轼之所坐，而早尝识

其为人，起远方孤生，遭遇圣明之世。然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由是材誉日著。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而尤轼僭易轻发之性。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四海生灵，譬如天之无不覆冒，如地之无不持载，如四时之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伏惟英圣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广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弃瑕含垢，则人才有可惜者。

南京官吏不敢转呈，他就派儿子张恕上京到登闻鼓院投书。张恕徘徊不敢投，以后苏轼出狱，读到张方平奏疏副本，大惊失色。苏辙看了这封上疏，感慨道，难怪吾兄吐舌，苏轼不死，正得张恕之力。苏轼有何罪？只不过声名太高，与朝廷争胜。张方平却说苏轼是“天下之奇才”，这只会更加激怒神宗（《元城语录》卷下）。

当时朝廷许多内外大臣也劝谏神宗。章惇说，仁宗得轼以为一代之宝，现在反把他投入监狱，恐后世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sup>[1]</sup>。宰相吴充甚至说，曹操那样猜忌，还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还不能容一苏轼？<sup>[2]</sup>王安石当时已退居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是神宗器重的人物，虽已退隐，但这话仍很起作用。据说，这场公案就以王安石一言而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对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若对苏轼行法，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为了营救苏轼，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她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以制科得苏轼兄弟，高兴地说，他为子孙得两宰相。现在苏轼因诗入狱，会不会是仇人对他的中伤呢？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营救苏轼的人，既有执政大臣，也有退居老臣，既有政治主张与苏轼一致的人，也有政治主张与苏轼对立的人。最感人的还是他的弟弟苏辙的《为兄轼下狱上书》（卷 36），一开头就写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恩，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苏辙既动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又明之以罪有可恕：“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但“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最后又以古喻今，望神宗效汉文帝，“免（轼）下狱死”：“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由于上下内外的多方营救，加上神宗本来也很赏识苏轼的才华，才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辙、王诜也同受贬斥，司马光等数十人因与苏轼关系密切各罚铜二十斤（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1 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

### 注释

[1] 周紫芝《读诗谳》，《太仓稊米集》卷 49，四库全书本。

[2] 吕本中《杂说》，十万卷楼丛书初编本。

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 关于冷成金老师的一些回忆

张逸文

在正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以前，我并没有上过冷老师的课，也没有见过冷老师。关于冷成金老师，还在念本科的我只听过在学院里广为流传的几则传说——事实上，冷老师俨然就是咱们人大文院的一段传说。

第一个关于冷老师的故事，来自一位师兄的分享。那是在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学院开展“五四文学节”的活动，学术部在人文楼202会议室举办了一次座谈会，会上邀请了几位文院的前辈——包括不同年龄段的教职工以及年长的师兄师姐，大家欢聚一堂，畅聊学院的往事。一位研究生师兄提到了冷老师。他说有一年冷老师带着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去参加思想培训。讲台上的思政辅导员慷慨激昂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讲台下的学生们昏昏沉沉地听。或许是为了调节气氛，辅导员抛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是先有党性还是先有人性？”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先有人性。”辅导员推了推眼镜，继续引导：“你们再想想。是先有党性还是先有人性？”冷门子弟仍旧不依不饶：“先有人性。”辅导员摆了摆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对，我认为应该是先有党性！”此时，但听教室角落里的冷老师“呸”了一声，随后他那雄浑的嗓音不紧不慢地响起：“那狗也能入党。”冷老师的声音很低沉，音量并不大，但却压过了辅导员的叫嚷，覆盖住了屋内每一个人的听觉。同学们先是怔住了两秒钟，仿佛在咂摸冷老师这句话的滋味，接着便全都狂欢般地大笑起来。

当师兄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这些坐在一旁的大一新生们也受到了感染，跟着故事里的师兄师姐们笑了起来，仿佛冷老师此刻就

站在我们面前，脸上浮现出一个读书人可贵的高傲，他正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对他不赞同的东西表达轻蔑和鄙夷。算起来，距离我首次听到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有足足七年了。冷老师的幽默与犀利令我心折，我于是开始了对他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他必定相貌清癯，身材瘦削，整个人潇洒而不羁，俨然一副竹林名士的模样——嘿，这是什么傻想头啊。

第二个故事则是来自楠师的口述。那天楠师的兴致格外好，他和我讲起他大学的往事。楠师也是冷老师的学生。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有一回楠师上冷老师的课。当时冷老师正讲到道德标准的变化对人心性的影响，他以道德要求的松动和女性行为的变化间的联系为例展开自己的论述。这时，讲台底下一个女生坐不住了，她举手站起来说：“冷老师，您不懂女人啊。”冷老师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没说话。于是这位女生就自顾自地讲了下去，她举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例证，试图驳倒冷老师。这次冷老师倒是出乎意料地耐心，他先是继续毫无表情地听那女生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分钟，然后干脆侧过身子，倚在椅子上，双手叉在胸前，右臂抵住椅背，睨着眼又瞧了那女生一小会，继而轻轻“哼”了一声，淡淡说道：“一个卑微的灵魂如何能够理解一个伟大的心灵？”冷老师的声音很低沉，音量并不大，但却压过了这位女生的高谈阔论，覆盖住屋内每一个人的听觉。女生被冷老师这突如其来的一句问懵了，可她仍在负隅之地，试图作最后的抵抗：“可我就是女性啊，我自然比您更了解女人。”此时冷老师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的声音无比威严，其中裹挟着一种电闪雷鸣

般不容抗拒的崇高：“你以为你了解，你了解的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你。而我，了解的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你，是你真实的全部。”

故事讲到这里时，楠师先是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欢乐，“哈哈哈”地大笑了几声，接着他就沉默了，他的眼神格外渺远，似乎想起了十几年前种种的青葱往事。良久良久，楠师回过味儿来，他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当时冷老师让我想起了谁吗？”我张着嘴，呆傻地摇了摇头——冷老师精彩的故事已经听得我痴迷了。“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楠师先背了一段，然后感慨无限地说：“冷老师总能让我想起孟夫子。”

2017年的秋天，我第一次上冷老师的课，发现冷老师的样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相比于隐士的洒脱之气，冷老师身上更多的是一种侠士的豪迈之情。他的身材高大而强壮，脸色红润，洋溢着健康且欢快的神采。冷老师的五官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但用“目光如炬”四个字来形容，那是再贴切不过了。他的声音同样很有魅力，雄浑、低沉但又充满力量。我们都很喜欢听他念诗，并将他念诗的方法称为“叹字诀”——譬如，诵读一首七律，冷老师并不通篇平平读完，而是在尾联的倒数第二字上重重一顿，吸一口气，再将诗句的最后一字的字音以“呼”的方式悠悠喷出。如此一来，尾字的发音遭到了弱化，有一种缥缈空灵的品质；又因为冷老师的肺活量很大，呼吸的气息特别长，所以尾字的音节也被拉得很长，这种缥缈空灵的品质于是也愈加长了，有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感觉。经过冷老师的朗诵，我们的耳朵便能清楚地感受到一首言尽世事盛衰的诗歌中的苍凉滋味。

冷老师讲课是很有气势的。他讲课的方式，我们也起了个名字，叫“拍案法”。课上每每讲到精彩处，他并不急着讲下去，而是先用右手在讲台上重重一拍，这石破天惊的一响与禅宗的“当头棒喝”可谓有异曲同工的妙处，接着冷老师用手指向我们，目光如电、气势凛然的低喝一声：“你们给我听好咯！”这是冷老师教学的智慧，既是提示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同时也能将那些心不在焉、神游物外的同学们拉回到课堂来。

冷老师是很节俭的。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春夏秋冬，每次来上课时他似乎总是穿着同样一件西装。他和我们说，这件衣服他穿了已经快有十年了，他说他是一个不太在意物质生活的人，生活中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衣服穿着贴身就行，花那么多钱在衣服上他很心疼。惟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央视找冷老师录制节目，这款教育类系列节目面向的是全国的中小学生。为表郑重，冷老师特意定制了一件红色马褂。那天他就穿着这件红马褂来给我们上课，他兴致非常好，在讲台上来回踱了好几圈，似乎是想充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终于，冷老师还是忍不住了，他点名叫自己的学生梁博宇起来回答问题：“梁博宇，你看我今天这身衣服好看不好看？”宇哥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给出肯定：“挺好看的。”“是真好看还是假好看？”“嗯……是真的很好看啊。”

冷老师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是非常高的。冷老师少年得志，名扬四海，总会有很多校外人员因为仰慕冷老师的才名而跑来旁听冷老师的课，这里面有男有女。冷老师对他们很亲切，他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抽出时间来听我的课，这是我的荣幸。”这些人和冷老师混熟之后，冷老师甚至会开车把他们送回自己的住处。送女学生回家，他是很谨慎的，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车上得有其他的男同学，而且他一定是先将女生送回家，再将男生送回家。“男女授受不亲，”冷老师时常和我们说：“我从不和女生同处一室，孤男寡女成何体统。”冷老师总是和我们强调：男女有别，是一个正常社会最起码的标准。这种近乎酷不入情的道德约束，或许在某些人看来甚至算是有些迂腐和刻板吧。但也恰是这种迂腐和刻板的道德，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

自然，听冷老师讲课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课堂上有我的好兄弟——驰昊参与的话，那么冷老师的课堂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欢乐的地方。驰昊是位妙人，他来自浙江龙游，于是给自己取了个雅号——衢州周生。这位衢州的周生声称自己生平有所敬者一人、所好者二事。他所好的两件事，其中一件是给RPG游戏写自动打怪练级的脚本，另一件则是在课上记笔记。驰昊的笔记记得非常认真，也非常详细，老师在课上讲的知识点，他几乎可以方方面面地都照顾到。而他生平最尊敬的

人便是冷老师。他经常和我们炫耀，他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冷成金老师的大名了。那时驰昊非常喜欢他们班上的语文老师，而语文老师常和他们提起冷老师，说冷老师才华横溢，是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耳濡目染之下，志学之年的驰昊便也就对冷老师怀抱起了无限的憧憬。从大三来人大交换开始，一直到考入人大正式成为文院的硕士研究生，驰昊总共七次选过冷老师的课：“唐诗宋词选读”他选了四次，

“中国文学思想史”则选了三次。尽管在这七次课里面，冷老师的观点往往是前后贯通且一致的，可只要冷老师站在讲台上，那么这堂课驰昊就会津津有味地听，笔记则专心致志地记。冷老师的课，驰昊上了七次，笔记便也就记了七本。

渐渐地，驰昊已经不满足于记录冷老师的学术观点了，热爱记笔记的驰昊决定把冷老师在课上讲的话全都记下来，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个名场面。话说2018年春假过后，冷老师刚参加完“全国苏轼研讨会”，从海南回到北京。这一天冷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苏轼的“悲剧意识”。既然讲到了苏轼，冷老师便顺带提起参加这次会议时的所见所感，进而又聊到海南这几年以及未来的发展情况。“海南是个好地方呀，”冷老师颇有感触地说，“以后你们毕业了也可以尝试去海南发展嘛。4月30号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则通知，主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海南的经济和文化产业……”当时我们全班同学都仰着头，聚精会神地听冷老师讲课，唯有一人低头奋笔疾书，此人正是衢州周生——驰昊，他已经立志将冷老师的话全都收录在他的笔记中。

冷老师远远地瞧见驰昊伏案疾书的模样，想着自己现在只是闲聊，没有讲到什么学术问题，所以断定驰昊肯定不是在做笔记，既然不是在记笔记，那肯定就是在写和课堂无关的东西。他于是喊了一声驰昊的名字，而驰昊正在忘我地记录冷老师刚才说过的话，于是便就随便应了一声“到”，头都没有抬。冷老师有些生气了，他又叫了一声驰昊的名字，他此时的声音里已经充满了威严：“周驰昊！你把笔给我放下！”驰昊这才反应过来，他放下笔，惊恐地望着冷老师。

冷老师问：“你在干什么？”

驰昊说：“老师我在记笔记。”刚说完这句

话，他仿佛控制不住自己似的，于是拿起笔又情不自禁地记了起来。

冷老师这时不怒反笑：“哎呦，那可谢谢你。真没想到，你听我的课听得这么认真呐？”

驰昊依旧陶醉在他记录的快感里，对悄然而至的危机浑然不觉。他抬起头，对着冷老师咧开嘴，憨厚地一笑，然后继续埋头书写。而我们几个男生坐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望着驰昊，心想一会可有好戏看了。果不其然，冷老师拍案而起，驰昊吃了一惊，手中的笔一个没握住于是掉到了地上。冷老师喝到：“你倒是给我们念念，你都记了些什么。”

“好的老师。”但见驰昊蹲下身去，把地上的笔捡到桌子上，在这个匆忙的过程中，他的头还和桌子撞了一下，眼镜被桌腿卡歪了。他坐回椅子上，先是扶正了眼镜，然后吹了吹笔记本上的墨渍，无比郑重地捧着本子开始念：“海南是个好地方呀，以后你们毕业了也可以尝试去海南发展。4月30号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则通知……”驰昊娓娓读来，字字珠玑，简直和冷老师刚才说得分毫不差。

冷老师当时的表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先是站起身来，双手按住讲台，身体前倾，那两道闪电一般的目光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驰昊压去。但随着驰昊一板一眼地朗诵自己笔记本上的文字，冷老师知道这个学生是真的在记笔记，他没有欺骗自己，于是目光温和了很多，这温和的目光掺杂着一位老师对自己学生的怜爱；可他的眉头随即皱了起来，并逐渐往上拱，两条眉毛呈现一个“八”字型，这显然是无奈的表情了——毕竟谁会记录这么无聊的闲话嘛。驰昊仍旧在诵读，冷老师于是干脆坐回到椅子上，他的眉头越耸越高，还不时用手捂住嘴，我断定他捂嘴的时候一定是在偷着笑，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也就不再加以掩饰，终于“哈哈哈哈”地仰天大笑起来，冷老师这一笑引发了连锁反应，我们也跟着哄堂大笑——毕竟我们也憋了好久了。

冷老师挥手示意驰昊停下，语气非常温和，但又有一些调侃的意味：“驰昊啊，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会记录在案呀？”

有道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驰昊只要不假思索按照实际情况回答“是”就行了，可偏偏这个档口他思考了几秒钟，然后给

出了一个近乎零分的答案：“其实也不是，您说的有用的话我记，没用的话我不记。”衢州周生并不想做一个阿谀之人，所以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给出的真诚回答。但一个学生怎么说老师说的话没有用呢？冷老师继续笑眯眯地问驰昊：“那你倒是说说我说的话里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呢？”驰昊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杵在那里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话。驰昊那副期期艾艾的样子，冷老师越看越来气，于是对驰昊说：“学而不思谓之罔，思而不学谓之殆，我看你是既罔又殆。这样吧，你就站到教室后面反省一下。”驰昊站起身来，向冷老师鞠了一躬，然后缓慢地往后面走。我看着他落寞而苍凉的身影，觉得很喜感，于是忍不住偷偷笑了几声。然而我这个小动作并没有能够逃过冷老师的法眼，他叫住我：“张逸文，你笑什么笑？”突然之间被冷老师点名，我心中升起了一阵不详的预感。我向前伸着脖子，摊开双手，作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只听冷老师接着说：“不要装，说得就是你。周驰昊犯错误，你觉得很好笑是不是？你也跟他一起到后面站着吧。”我于是只得学着驰昊的样子，站起身来，向冷老师鞠一躬然后朝教室后面走。望着我落寞而苍凉的身影，这时班上的其他同学实在是忍不住了，再一次哄堂大笑起来。但我知道，他们这次嘲笑的对象已经从驰昊换成了我。我站在教室的最后面，皮皮赖赖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心里着实有些委屈：偷着乐的又不止我一个人，为什么偏偏针对我嘛。

几乎整个硕士生涯的三年里，我都有这样一种错觉：冷老师并不喜欢我，在他的眼里，我一定是那种既不听话又自以为是的坏学生。这样的想法，在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议之后被彻底颠覆了。在答辩会议上，郑志良老师向与会的其他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告诉大家，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失败了，正在准备接下来新一轮的博士考试，当时冷老师也在场。会后，冷老师特地用微信语音给我打了通电话。

看到是冷老师打来的电话，我不禁有些惊慌失措。电话刚接通，冷老师就说：“你的这篇论文写得很不错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冷老师是不常夸人的，他这一句话的分量对我来说很重很重，一时之间，我受宠若惊。冷老师接着又说：“考博失败了？

为什么没考上呢？”我跟冷老师说了一些自己在考博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阻碍，讲了一些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并向他询问了一些我在治学上的困惑。冷老师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一条条为我分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给我解答。不觉聊了很久。快要挂电话了，我对冷老师的关心万分感激，于是十分真诚地说道：“冷老师，今天真的太谢谢您了。”

电话那头冷老师“哈哈”地笑了两声：“你我师生之间这么客套干什么。”

听冷老师这么说，我不禁心头一热，于是说道：“我原本以为您不怎么待见我，我觉得在您心里面我应该是个很不听话、很逊的学生。”

冷老师似乎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地向他剖白自己，他“嚯”了一声，问我：“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老师您还记得我第一次上您课时候的情景嘛？那时您在给我们讲‘悲剧意识’中的‘亲证理论’，我有点不太赞同您的说法，于是举起手想跟您讨论一下，结果我还没说两句呢，您就打断了我，用十分威严、不容置疑的口气质问我：‘你是在置疑我吗？’那一刻我心里暗叫不妙，想着，应该已经给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吧。”

“哈哈哈，小孩心思。”冷老师又爽朗地笑了起来，“恰恰相反，我对你的印象出奇的好。尤其是那次课堂展示，我记得你讲的是李商隐。我觉得你讲得很精彩，你很有灵气，文本分析的能力很强，是个可塑之才。”冷老师突如其来的夸赞使我喜出望外，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居然会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血潮上涌，整张脸都滚烫滚烫的，我屏住呼吸，听冷老师继续往下说：“至于当初为什么要打断你嘛，我不过是想挫挫你的锐气。我怎么可能会只因为你不赞同我的观点而记恨你呢？我的气量还不至于那么小。年轻人有思想、有朝气、爱思考、爱讨论，这本身是非常好的事情，值得鼓励，但你得分场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课下交流，你问我答，进而我们相互讨论，这叫‘解惑’；课堂的主要用途不是‘解惑’，而是‘传道’与‘授业’，那是老师传授知识的地方。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想到了就说两句，那可怎么好？”说到这里冷老师叹了口气：“现在的学生呐，那是越

越来越不好教了。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都学西方，搞什么开放式课堂，提倡老师和学生的平等地位。我就不看好洋人的这一套，中国的课堂就得有中国课堂的样子，师授而生受，这是最起码的嘛，尤其是你们这些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应该继承这样的传统。须知道，立学者，先立人。尊师重道这是最基本的品德，你们很多年轻的学生啊，读了两本书，就自觉了不起了，总想着在课上出出风头和老师掰掰手腕子，这样的行为，于人于己，都是有害无利，它甚至会遮蔽你对自己的认知，不利于你长远的发展。我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要及时喝止你。

“逸文，我们不妨再多说几句。为学者，最可贵的品德是什么？不是勤勉，不是聪颖——当然它们都很重要——而是谦卑。惟其谦卑者，方为最通透之人。我见过不少的学生，他们看起来都很聪明，而且似乎也很努力，但为什么最后却泯然于众人了呢？因为他们不谦卑，他们总是眼高于顶、目空一切，这个也瞧不起，那个也看不上，他们一直守着自己这种迂阔的傲慢，至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转益多师的机会，所以他们最终平庸了。什么叫做‘谦卑’？唯‘情会’而已。那什么又叫‘情会’？就好比你去评价一位学者的成就，或许他作出的种种业绩并不能如你之意，但先别忙着否定他，要先站在他的角度、他的立场，去想一想他的难处是什么，想通了这一点，你或许更能进入他的研究。对别人指手画脚总是很容易的，哪怕是一位最优秀的学者，你都能从他的文章里面挑出一些学理上的毛病，可比起批判一个学者的学理逻辑，体谅他的立场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解决问题的学理逻辑，只有进入到这个问题的最初立场才是有可能成立的，所以抛开立场去谈学理，这本身就是最不学理的一种行为。而你们很多年轻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去体谅人家的立场和处境——治学如此，为人亦然。

“我明白，我现在和你说做人要谦卑，你可能都会偷偷笑话我，认为我是自己说到但却做不到。我懂，你们当中很多人上我的课，会觉得我有时候有些固执，说话有些绝对。但‘固执’‘绝对’和‘谦卑’并不冲突，后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品格，而前者不过只是一种姿态。我嘛，始终是这样想的，矫枉必须过正。

人嘛，得要刚烈一点，折之可也，摧则不可。”

……

冷老师就这么说下去，说下去。他始终是这样健谈，他就这么把他的金玉良言，一字一字、毫不吝啬地说与我听。我知道，他这是将他多年以来治学的经验和体会向我倾囊相授，他是真真正正对我毫无保留，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学生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心与冷老师贴得那样近，老师于我，俨然就是如父如师的存在了。

我们又聊了很久很久。直到聊天的最后，冷老师对我说：“你这孩子有点才气，所惜之处，在心志尚不甚坚、心性尚不甚定：你多愁善感的性格致使你非常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干扰，这倒也像个诗人。不过想要成才，你还得继续再捶打捶打，所以这次考博失败对你来讲并非坏事。”老师又说：“是应该出去闯荡闯荡，男子汉大丈夫总窝在一个地方也没什么出息。其实，在哪里读书，跟着谁读，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生活，你如何完成自己，你是否对你所处的世界具备应有的尊重与体谅，你怎样去亲证，你怎样去建立自己的价值。下一轮考试你可多联系几位老师，多试试几次，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赏识你的老师的。但如果你兜兜转转绕了一圈还是没有合适的去处，那么，我非常欢迎你来考我的博士。”

挂了电话，我心里暖洋洋的。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远没有冷老师说的那样优秀，可那时我甫逢失败，正处于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十分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理想，我对我的未来感到一片茫然，冷老师的鼓励使我重新拾起信心，没有被这次失败打倒。

二战成功之后，我获得了将近一年的读书时间。我首先找来冷老师的书：《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论语的精神》，紧接着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读得是那样认真，一个字、一句话也不放过，我尝试着遵循老师的教诲，去发掘老师的立场，去体谅老师的难处，去揣摩老师落笔前的良苦用心。曾经的我就像冷老师说的那样，隐隐觉得他多少有些固执和绝对，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为自己的肤浅感到羞愧。我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他那真诚畅达的文风里，渐渐地，

我终于体会到了，原来那些时而嬉笑怒骂，时而纵横捭阖的文字背后，屹立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自始至终都在迫切地思考一件事情：一个中国人何以能够称为中国人——在现代主义后现代的冲击之下，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个中国人如何能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之美的体会和再体会，重新找到安置自我的精神家园，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并充满信心地走下去呢？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难题，这位伟大的心灵毫不吝惜地奉献出了自己一生的光阴。

我于是想起有一次冷老师在课上不无感慨地和我们说：“你们有些同学喜欢听我讲课，就像现在学术界有些学者喜欢用我的悲剧理论分析问题。可是，喜欢听我讲课的同学，你们真的能记住我所讲的东西嘛？那些使用我理论研究问题的人，真的能够明白我理论的内涵嘛？不见得，都不见得。不过话又说回来，思考问题，写成文章，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学术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让谁记住，也不是为了让谁理解。归根到底，治学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重要的是，存诚于心，哪怕不是为了谁，我们也要自己对得起自己。”

过年的时候，我给冷老师发了一个新年问候。一如往昔，冷老师简短地回了一句“谢谢”。过了一会，冷老师又发来一条语音：“逸文最近如何？”我赶忙回了长长的一大段，大概意思是说，考博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已经有了不错的结果；这段时间拜读了老师的几部著作，收获很大，但同时也有不少困惑，希望能够等到秋天回到北京之后，可以继续向老师问道解惑；我还说，我知道老师好酒，所以特意准备了一瓶好酒，以学问佐酒当是人生雅事，万望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呀。冷老师没有再回我，这倒也蛮符合老师不拘小节的作风。我丝毫不介意，反而开始期待着秋天之后与老师再会的日子。说到与老师喝酒，我还专门在“喝什么酒”这个问题上费了一番心思。茅台自然是不行的，这种酒虽则名贵，但倒也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关键在于此酒虽然香气馥郁，但过于浓烈，有失雅士清淡；五粮液虽然是好酒，口感纯净甘甜，但所惜之处在余味往往不足，冷老师也未必会喜欢；想来想去，还是梦之蓝妥帖，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这种酒的滋味柔中有刚，朗练干脆，且回味悠长，最是长情、

最是可人，一定很对冷老师的路子。其实我不太能喝酒的，我的酒量极差，基本三杯就倒，这一点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可是，我真的真的，好想和冷老师喝一杯啊。

直到今天噩耗传来。他们说冷老师去世了。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于是赶紧给宇哥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宇哥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他正在赶往冷老师家的路上，我们沉默了一会，互道一声“珍重”，然后挂上了电话。我看了看家里酒柜上静静立着的那瓶梦之蓝，又翻了翻和冷老师的聊天记录，目光落在那一句“老师，您可一定要给我个机会呀”上，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同老师把酒言欢了。

我倚在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风景，依稀记起来，刚读研的时候，自己不太适应冷老师讲课的风格。于是在师门的读书会上，我向楠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楠师“嘿嘿”一笑：

“你呀，要尝试去学习体会冷老师的可爱。冷老师呢，他的身上保存了一种老人大人的风范，这是从黄保真先生、蔡钟翔先生、成复旺先生一脉传承下来的风范，是老人大人独有的风范。那种讲课时，滔滔不绝、纵横捭阖、俾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才是英雄本色嘛，这可不比当下的很多学者看似严谨，但实则唯唯诺诺、什么也不敢说于是什么都不用负责的鸟样子要有趣多了、可爱多了？文院从前的老先生们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他们的风采你无缘再见，冷老师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你要好好珍惜与冷老师相处的时光。”

我正回想着楠师的话，窗外忽然刮进一阵料峭的寒风，我感到一种直觉的混乱，冷老师昔日的种种涌上心头，他的音容笑貌从我感官的各个方面侵袭着我，我知道我正在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伟大灵魂的逝去。恍惚之间，我只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很难过。楠师言之有理。冷老师的离开，不仅带去了我们的欢乐以及对他的思念，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个曾经伟大时代的终结。

张逸文，中国人民大学 2017 级硕士。

# 念师恩

司 聰

我的博士导师冷成金教授于今年3月9日晚8点52分去世，那天正好是他五十九岁生日。

我赶到告别厅时，师兄弟已为他整理好了遗容。他刮过胡子、剪过手脚指甲，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结束了一上午的课，在办公室黑沙发上小憩。同门屋里屋外站了十几个。我有些分不清真假，这么多学生在他面前，他怎么会不起身教训我们？起码会教训我，我被行政事务缠得无法呼吸，好久不写正经文章。我期待他骂我两句，在这个如往常一样的春季学期。

我第一次见他穿得如此整齐、干净。他春秋季节喜欢叠穿衣服，恨不得有五个领子，或者在办公室披一件深紫色的棉袍，颜色极不好看。可我压根不敢提。

大二那年，我给他邮箱里发散文与小说，他认真给我评语，赞我聪明有灵气；读研之后，评价变成只有些小聪明；再往后，索性连小聪明也懒得说，大约对我失望透了。

我读书时他生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又来给我们上课，并不太谈病情，我只当他好了。毕业后，他还在课堂上提到我，有时是笑着说我的趣事，有时又连连摇头，十分不满意。几年前秋天在眉山开会，他面色红润、声若洪钟，说四川是民族精神的后花园。会议间隙我劝他和我们一起吃火锅，他看我一眼，没理我。我觉得他病早已好了，只是不像得病前那般善饮。

三个月前，忽然得知他在急诊室抢救。我晚上去探望，进不了病房，只送进去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口袋书。回家路上收到微信，首页便被他发现了错误。又有天晚上我偷偷跑去，恰

逢医生进出，门没关严，我看不见他靠在枕头上，像是在闭目养神。如果那时我大喊，他一定能听得见，可我没有，在门外一声不吭。

他走时正逢初春。细雨零濛，枝桠上有新绿。再过一个月，丁香将满园盛放。他曾认真地说人可不能和花拍照，因为没人会美过花，合照时只会显得花更美，人更丑。这话说的，真像是棒子迎面砸头，死去活来地打出顿悟。我从此见到花丛中拍照的人，总是生出复杂的怜悯。

想起宋人笔记故事，苏轼自黄州一路向东去江宁，见隐居半山园的王公。苏轼为着常服道歉，细雨骑驴的老头昂着头：礼岂为我辈设哉？春雨中的布衣东坡与骑驴介甫，都幻化成他的脸。

不知他在哪里。那个世界没有病痛，但是否有四季？如果四季如春，多少也有些无聊，还应当有白雪皑皑，像苏轼在渑池遇到的那场一样大。他应该又有了很多新学生，听唐诗宋词与悲剧意识。课堂上也会聊些逗趣事。

不知道他的窗外，春天开不开丁香花。但愿坐第一排的学生，每次都记得给他杯中添热茶。

司聃，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 书香之城

方永江

从成都沿成（都）乐（山）高速往西南方向行驶半小时，出高速路口，四座厚重庄严的仿宋城墙矗立千里平畴，格外引人注目。城门上精雕细刻着两个苏体镏金大字“眉山”，这就是东坡故里了。漫步眉州大道，可见飞渡天空的城际高铁桥体上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画，让人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城池，陶醉于丰盈饱满的书香中。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路过眉山，专程前往三苏祠披风榭拜谒东坡先生遗像，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情写下了“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诗句，从此，眉山有了“千载诗书城”的美誉。

千载诗书，千载书香，书香之城，“进士之乡”。书城的源头在孙氏书楼。盛世藏书，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眉山人孙长孺就建成了藏书丰富的书楼，声名远播。光启元年，僖宗御书“书楼”赐之，眉山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一朵奇葩，一时风光无两。“门前万竹竿，堂上四库书”，一代又一代的收藏、一层复一层的累积，古老的眉州散发出经久不息的书香。图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天天都是读书日；那些元气淋漓极富生命张力的人，个个都是读书人。立志读遍人间书、发愤识尽天下字，不仅是苏东坡而且是那时眉山读书人的普遍志向。到了宋朝，眉山之通经学古、挟经载笔、应对进退的人，洋洋大观。成就

了“天下好学之士多出眉山”（宋仁宗语），两宋间共出进士 886 人的传奇。

“唐宋八大家”书香之城占三家，金声玉振、雄视百代。苏家自苏洵父苏序起，就不遗余力为子孙营造优雅的读书环境。苏轼兄弟念念不忘的南轩，竹柏杂花丛生满庭，鸟跃枝头馥郁扑鼻，经史百家之书活色生香。眉山苏氏在当时虽是富裕的小康之家，但他们不治田产，却广购图书，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苏轼苏辙束发就学时，就能以父为师，坐拥书城，“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熏染于翰墨，畅游于书海，驰骋于版迹，三苏父子文峰鼎峙、浩气长存。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这座城池的经，他们的琴棋书画是这座城池的纬，相亲相爱的人们在这里诗意栖居。

书香之城，东坡读史明志的故事，激荡人心、留芳千古。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宦学四方”，母亲程夫人就亲自教育两个儿子，给他们讲述古今成败的事例。一天，程夫人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传》讲的是范滂因反对宦官当权而被逮捕的事，有一段记述了他被逮捕时与母亲诀别的情形。范滂跪着对母亲说：“儿子此次被捕，难以生还，无法再尽孝道。弟弟仲博很不错，能代我孝敬母亲。希望母亲大人能‘割不忍之恩’，不必太过伤心。”范母对儿子说：“你今天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范滂听了母亲的话后，

更加增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站起来拜别了母亲，后来死于狱中，年仅33岁。

程夫人读到这里，深深为范滂母子事迹所感动。侍立在一旁的苏轼对母亲说：“我如果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您也能赞许我么？”程夫人十分坚定而庄重地回答儿子：

“你能够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不能成为像范母一样的人吗？”小小的苏轼树立起了为国为民担当责任“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雄心壮志。

书香之城，东坡“八面受敌”的读书法，授人以渔、终生受益。王庠是苏辙的女婿，他在应科举考试之前，写信向苏轼求教，问怎样才能读书速成，有何捷径可走。苏轼在回复他的信中说，读书学习是没有任何速成的捷径可走的，要想学有所成，“八面受敌”法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苏轼说，每读一本书，都要对它作多遍的阅读，才能读尽该书中所有的意思。书中丰富的内容有如大海，里面“百货皆有之”，但是读书的人精力有限，进入到书中知识的海洋里，不能够一下子“兼收尽取”，只能得到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读书学习时，每次只确定自己最想得到的一种知识去读。这种读书法虽然“愚钝”，但是用这种读书法学成的知识十分扎实，能够“八面受敌”，对解决各种问题、撰写各类文章都能应付裕如，这同那些贪大求全的读书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是他长期以来的读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学成后的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各种不同的题目都能写出主题鲜明有创意、内容丰富有文采、让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正是他“八面受敌”读书法所带来的学习效果。他的“八面受敌”和手抄汉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等方法，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崇。

眉山生三苏，草木自葱茏。春风化雨、学以致用，三苏的人生风范和不朽功业，涵养起了这座城市的精与魂。今天的眉山，不仅阅读经典蔚然成风，而且厚植书韵外化于

形、内化于心。木假山堂、程夫人教子、披风榭如切如磋、连鳌山运斤成风，启贤广场、牛角挂书、远景楼重光、纪念馆新建，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间、熠熠生辉在通衢大道旁。这些雕塑和文化工程，徐徐展开三苏父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壮丽画卷，是暗夜最敞亮的照见，是来者最暖心的传承，散发着恒久的馨香。“我爱苏东坡，为你把墨磨。一撇又一捺，一生都快乐”的优美旋律萦绕在眉山大街小巷，在苏轼遗址遗迹地特别是这些地方的中小学得到广泛传唱，而且在央视展播。参观三苏祠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题词：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题词：蜀中多名士，东坡第一人；著名作家蒋子龙题词：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东坡（落款是小作家蒋子龙放肆）；著名作家贾平凹题词：耸瞻文旦。这些文化大咖在眉山的留存，是对书香之城的由衷加持。书声琅琅、书香袅袅的眉山，已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无论是久住的人，还是南来北往的客，都视之为心安惬意的故乡，甘愿在她芳香温暖的怀抱做一棵柔媚的水草。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 三百个故事讲透苏东坡（一）

刘小川

## 从苏东坡的爷爷说起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西蜀眉山有个怪老头名叫苏序，他就是苏东坡的爷爷。邻里称他“苏四大”：个头大，酒量大，脾气大，喉咙大。他喜欢学神仙张果老骑毛驴，身上歪挂个酒葫芦，在眉山城的石板路上晃悠。他口中念念有词，旁人不大听得懂，原来他在念他自己写的诗。“有所欲言，一发为诗。”苏序写了几千首打油诗，在眉山城很有名气。

苏老爷子背负青天手拿书卷，看书看得得意了，大街上哈哈大笑，把路人吓一跳。小孙儿苏子瞻仰望爷爷，觉得爷爷比县太爷还了不起。城里有个茅将军庙，专门骗老百姓的香火钱，苏序带了二十多个后生去拆了茅将军庙，扯断了坏官劣绅合伙搞的利益链条，断了这些人的一条大财路。眉山的县官不讲道理，苏老爷子会冲到官厅去讲理，好像他才是上级。他的喉咙大得很，城门洞外都听得清清楚楚。眉山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苏老爷子又骂县太爷了。

很多年以后，苏东坡写万言书，狠狠批评皇帝。

苏序干了一件事，眉山人传了几百年。他积谷数千石，装满了好多粮仓，城里人以为他想屯积居奇，等灾荒年来了，把屯食抬价抛出去，赚大钱。问他，他不解释。他又念念有词，原来他在掐算天气，顺手摸摸小孙儿苏子瞻的冬瓜脑袋。第二年，眉山果然闹天干，庄稼都干死了，人心惶惶，有人节衣缩食；有人想逃荒，逃到成都去。城里的几家粮铺趁机哄抬粮价，于是菜价也涨了，肉价翻了几番。人们议论纷纷：屯粮大户苏序有何动静？恐怕是要卖

高价喽，黄澄澄的谷子一担担挑出来，那白花花的银子哦，流进城西的苏家去。

然而，苏序竟然开仓散粮，专门救济贫困户，平抑物价。眉山人又奔走相告：苏老爷子放粮救灾啦！“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苏东坡有回忆祖父的文章《苏廷评行状》。

很多年以后，苏东坡在杭州建“安乐坊”，看病不收钱，救了成千上万染上瘟疫的人。祖孙二人行事，好像商量过。其时，苏序早已去世，在天堂注视着孙儿苏东坡。

## 费头子·黄荆条子

《三字经》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老泉即苏洵，苏轼的父亲，家中排行老三。小时候的苏洵是眉山的费头子，天上都是脚板印，天天玩到黑摸门。“费”是淘气的意思，费头子类似孩子王。苏洵爬树子手脚并用，比猴子还利索；苏洵畅游滔滔岷江，“弄潮儿向潮头立。”苏洵最喜欢跳进城西的大池塘，摸鱼捉虾掰爬海（螃蟹），踩水抖脑袋，躺水欣赏荷塘月色。踩水、躺水都是民间的游泳技巧。苏洵来了野性子，搅得水花四溅，吓得水蛇逃、乌龟藏。

苏老爷子来找儿子，喊：三娃儿哩，你狗东西钻到哪儿去了哦？你狗东西哦！

狗东西却在水下优哉游哉，嘴里含一根细竹筒通气。苏序游走池塘边，心里有点慌。忽见一条白影子冒出水面，跳上岸来，抓起草丛中的衣裳裤子开趟子跑，光屁股扭得好快。那苏老爷子也敏捷，闪电般追过去……有时苏洵被父亲捉住，衣领子被父亲的大手提起，却拿

足尖点地，双臂展开如大鹏展翅，对路边看笑要的街坊娃儿说：反正要挨打，不如先耍耍。

苏家五亩园子，有一棵黄荆树，苏洵最怕黄荆树的树条子，这种树条子又长又细，人称凶凶柔条，打得屁股精痛，却不伤筋骨。苏老爷子边打边念打油诗：打你贪玩又好耍，打你上课不念书，打你活得像头猪。

苏洵上学堂，对同窗说：猪有猪福气，回回拱到花生地。

同窗问：黄荆条子抽你光沟子，抽得暴起一条条猪儿虫，以后你还野不野？

苏洵把眼皮一翻：野啊，咋不野？黄荆条子算啥子，笋子炒肉我不怕！

笋子炒肉指竹片体罚。眉山的男孩子全都吃过笋子炒肉，个个抗压力强。有些野丫头也要吃这种炒肉。

苏洵闹够了，野够了，发一会儿呆，也拿起书卷来，念书看到天黑，掌灯又念。苏序在窗外听书，摸着他的七寸胡须。眉山人家家户户有藏书，苏家的老大老二都爱读书。后来陆游骑驴到眉山，惊叹：“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两宋三百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州县第一，成都不比。

苏序观察老三，寻思：这个野娃儿说不要野出明堂。

如何野出名堂呢？苏序骑毛驴，在眉山城外的孙氏书楼下打转。这孙氏书楼有唐宋皇帝赐的金匾哩。苏序眼前灵光一闪：让老三野到外面去长见识？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 野出去

苏洵雄赳赳野出去了，野上了峨眉山，野出了长江三峡，越荆楚，入中原，见识了大世界。家里人巴望他有大出息。他回来了，说话南腔北调，举手投足有派，大谈汴京的大人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听上去，这些大人物都跟他有某种关系。左邻右舍也来听他讲。讲完了，他的眼睛亮如灯。有人却问：苏处士，汴京黄金榜上，有你苏洵的大名吧？

处士，指民间的读书人。

苏洵的亮眼睛顿时暗下来了：进京考进

士，一考再考，名落孙山。他已成家，妻子程夫人出自眉山的大户人家，程夫人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苏轼，次子苏辙。

接下来怎么办？苏洵还行不行万里路？全家人等着苏序拿主意。这老爷子喝着洪雅县道泉茶，摸摸孙儿的冬瓜脑袋。他开了金口：老三，明年还想出去？

苏洵忙道：想！

于是，苏洵又野出去了。邻居揶揄：苏家老三就是脚野，钱多了，一把把花买路钱，铜板白白撒一地。

苏序听见了，装着没听见。其实，家里穷了，程夫人当街做生意卖布帛，赚的钱都成了丈夫的买路钱。苏轼、苏辙正在吃长饭，一顿顿狼吞虎咽，又上学堂，交学费。程夫人悄悄典当她的嫁妆……丈夫出远门一年半载，终于回眉山啦。这一回，苏洵却是灰头土脸，衣裳破烂，语音混乱。程夫人心都紧了，公公依然不动声色。苏洵这次回来的变化是：一头扎进书房南轩，半夜三更还在苦读。

问题是：苏洵还出不出去？眉山有一段顺口溜很难听：苏洵苏洵没出息，大把银子花出去，挣球不来黄金屋，倒能气煞颜如玉。

舆论不利于眉山苏家。程夫人“耿耿不乐”。苏序徘徊庭院，慨然写下打油诗，以示自强不息：苏家想要雄起，遇事就要稳起。遇事不能稳起，大家都要遭起！

据苏东坡在海南回忆，眉山苏家三代人，穷困过好几回。

苏东坡的回忆录叫《东坡志林》。

## 三种光

转眼到了秋高气爽的八月，蜀人出远门的好时光。苏家点灯开会，老大老二都来了。老二苏涣考上了进士，如今在雅州做官。七个孙子辈，在堂屋的三合土光地上坐一溜：苏不疑、苏不欺、苏不危……年逾七旬的苏序老爷子，摸着一溜脑袋瓜，摸那个冬瓜脑袋似乎摸不够。苏轼的乳母任采莲，苏辙的乳母杨金婵也出席了点灯会议。

程夫人很紧张，她的夫君苏洵更紧张。会议气氛，叫做凝重。

大伙儿七嘴八舌，苏序听得认真，频频点

## 景苏札记

头。苏洵却耷拉了头，鼻尖冒虚汗。看来形势不乐观，眉山的老处士恐怕要“处”到底。七嘴八舌渐渐停了，大伙儿一齐望着一家之主苏序。序言的序，序幕的序。七个乖孙子一律仰头望。

苏序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种光。

进士苏涣会心一笑：父亲是说日月星。

后来苏东坡有得意对联：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当时苏序却摇头，依然晃悠他的三个指头，又说：三种光。

苏洵忙问：父亲，儿子都快急死了，您就别卖关子啦。

苏序喝一口道泉茶，慢吞吞开口：老三究竟会不会有出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出去，他回来，银子花光了，可是他的眼睛在放光。他讲外面的世界无限精采，什么陕西，什么东京，什么翰林院大学士，讲得子瞻、子由两眼放光，也让我这个老诗人的老眼放出光来。苏家三代人，三种光。光这种东西实在不实在？依我看，实在。老三见识了外面的高人，每次回眉山都加倍用功。光在啥地方？光在书卷上。我的乖孙子轼儿在九岁那一年就说过：欧阳修又不是天人，以后长大了，我比他厉害！

苏家六个孙子，扭头去看冬瓜脑袋。

爷爷苏序停了停，起身走七步，俨然曹子建。老诗人口占一首打油诗：三种光啊三种光，照得苏家亮堂堂。老爹不行儿子上，肯定要上黄金榜！

苏洵顿时大激动，扑通一声给老父亲跪下了，叩谢如捣蒜。转忧为喜的程夫人含了热泪，寻思典当她的最后一只和田玉镯。

中国之有苏东坡，苏序、苏洵、程夫人，都有大功。

### 苏洵的暴脾气

苏家有女曰八娘，嫁到程家去，原本希望苏程两家亲上加亲，不料八娘受虐待，十八岁，死了。程夫人极悲痛。苏洵大悲且大怒，要冲到程家去讨还公道，棒打女婿程之才，痛骂程家恶婆婆。

程家富，苏家穷；程家傲慢，虐待苏家女儿八娘。

亲家变仇家，苏洵要出这口恶气。程夫人强忍悲痛劝几句，苏洵更是火冒三丈。他手持一根五色棒，把程家的聘礼打得稀巴烂，包括一对青花瓷瓶。打不烂的衣料绸缎就撕烂。折腾了大半夜，苏洵还在院子里跳，骂得十分难听，骂得眉山半个城的居民都想跑来听。

程夫人流泪念佛，手拿一卷《心经》。她夹在娘家与婆家之间，两头受气，还不能诉苦，于是苦上加苦。她哭道：我可怜的女儿啊，你那婆婆，你那丈夫，怎么能……

苏八娘在程家，干的是下人活，吃的是受气饭。

这一天，苏洵在苏家祠堂召集一百个族人开大会，控诉程家的罪恶，一桩桩一件件，罄竹难书。苏洵宣布：苏家与程家，永远断绝关系！

这一断就断了47年，直到程之才在广东惠州见到苏东坡……

老处士苏洵的暴脾气在眉山是出了名的，后来在汴京，他更是痛骂王安石，写下《辩奸论》，一直传到今。苏洵骂程家有道理，但他为什么不为程夫人的处境考虑呢？他大大出了一口恶气，程夫人却从此憋气，隐忍而操劳，伤了元气。

苏序，苏洵，苏东坡，这祖孙三代人若是走在眉山的下西街，那身形，那眼神，那步态，估计很相似，像一支受过相同训练的队伍。遗传力量之大，大到无法测量。苏东坡“绵历世事”，宦海沉浮，把基因中的暴脾气升华为浩然之气。所谓豪放东坡，奥妙在此。

刘小川，眉山市作家协会主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 苏坟山上祭三苏，清明节前拜先贤

清明前夕，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组织眉山苏学界代表前往苏氏墓地，祭祀三苏。

祭祀仪式由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主持。在庄严肃穆的苏洵墓前，有关方面代表敬献花篮，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恭诵祭文。随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向先贤三鞠躬并献上鲜花。因疫情防控需

要，不少苏学专家、苏学爱好者及市民未能亲临现场祭拜，但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三苏。

苏坟山，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原土地乡公益村西。是苏洵、程夫人、王弗墓和苏轼、苏辙衣冠冢。从古至今，眉山人都有清明祭扫三苏坟的传统。（唐雅兰）

## 《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捐赠仪式

4月8日上午，由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主编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11—2017）》一书捐赠仪式在眉山三苏祠内的东坡书院举行。乐山师范学院、眉山市文广旅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眉山市图书馆，以及部分苏学专家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捐赠仪式由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主持。乐山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本书顾问杨胜宽教授向来宾介绍了编辑本书的目的，分享了编辑过程中的困难和趣事，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随后杨胜宽教授和乐山师范学院原副校长杜学元、图书馆档案馆馆长任志萍等代表捐赠方郑重地向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眉山市图书馆，以及苏学专家代表捐赠图书。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方永江致答谢词，他表示：

“此书的出版是苏学界的一件大事，将为苏学研究提供巨大的助力，它不仅展现出苏学研究的累累硕果，更说明苏学研究薪火相传、文脉不断。”“受赠方将认真学习、充分用好这一苏学研究新成果。”

据悉，自2002年起，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文献优势，运用现代技术，对百年来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加以系统的搜集、整理和规范的分类、主题标注，建成能提供多种检索途径的“百年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并长期进行数据维护、补充和更新，本索引即在此数据库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在数据库建设和本索引编辑过程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与乐山师范学院曾以横向合作项目的形式为该项目提供部分资料和经费支持。（有愚）

## 重温东坡经典，弘扬东坡精神

2021年6月11日下午，端午前夕，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特邀眉山苏学专家、各机关单位苏学爱好者，四川工商学院、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眉山职业中学、苏洵小学等校师生近50人，在三苏祠消寒馆举行“东坡诗词赏读会”，以赏读的形式重温东坡经典。

本次活动既有年过花甲的老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苏学研究者、爱好者，还有尚在稚龄的孩童，体现了眉山人代代相传的文化情怀。会场上，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方永江，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馆长黄建分别致词后，大家或读、或

演、或唱、或讲，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表达对东坡诗词的理解，展现东坡诗词之美，气氛热烈而愉快。东坡诗词百读不厌，东坡诗词常读常新。眉山学者刘川眉指出：“东坡诗词文是东坡文化的精髓，学习东坡文化东坡诗词文是基础。”

为了更有力地推广和普及东坡文化，让更多的东坡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一直在不停地思考和尝试。本次活动以现场交流的形式为苏学专家和普通民众搭建桥梁，使东坡文化走出书斋，走向大众，更加可亲可近。（有愚）

## 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召开

6月19日，由徐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承办的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徐州矿业大学举行，国内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180余人围绕“弘扬苏轼文化，加强城市交流”主题深入进行学术研讨。大会收到论文132篇，约100余万字；收到11套苏学专著，并赠送与会专家学者。

此届年会是继1999年第11届、2009年第16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以来，徐州第3次主办苏轼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说：“徐州是一座光荣的历史文化名城，苏轼在徐州留下的政绩和诗文词，更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光彩。我们今天

在徐州纪念苏轼，研讨他豁达的人生观、高尚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流俗的艺术观念，为当下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资源。”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本刚介绍：“苏轼在徐州做知州的两年，是苏轼一生不多见的为官为文的一段明媚时光。徐州苏轼文化的丰富遗存是苏学研究的基础，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苏学研究成果丰硕，重点课题取得突破，社教活动也很丰富，苏轼文化获得了广泛的弘扬和传播。”

研讨会后，与会者集体考察了徐州市区的苏轼遗迹，包括黄楼公园的镇河铁牛、苏公行迹壁画，云龙山的黄茅冈、东坡石床、放鹤亭、饮鹤泉，云龙湖畔的圆梦园、苏公塔、苏轼纪念馆等。（有愚）